INTERNATIONAL THEOLOGICAL SEMINARY

中國貴州石門坎苗族教會歷史回顧和研究

By

Huayang Chen

A Dissertation (Thesis) Presented to the Faculty of the

International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Th.M

Los Angeles, California

June 2017

INTERNATIONAL THEOLOGICAL SEMINARY

Dissertation Approval

中國貴州石門坎苗族教會歷史回顧和研究

By

Huayang Chen

A Dissertation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Th.M

Approved:

Chairma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emb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emb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cademic Dea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os Angeles, California

June 2017

ABSTRACT

Chen, Huayang. The Hands of god in church History: A Reflection of Shi-Men-Kan (Stone Gateway) Church, the Miao Group, Guizhou, China----Its Founding, Development, Destruction, and Future Outlook(中國貴州石門坎苗族教會歷史回顧和研究), 2017.

International Theological Seminary, Th.M. pp.163.

This is a study of a well-known Mission endeavor a century ago, the Shi-Men-Kan (Stone Gateway) Church, a mission outpost in China, how was it miraculously founded, developed and latter oblitera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n recently rediscovered. A reflection on God’s hands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Church.

From the beginning of its founding, the hands of God has made the impossible possible, bringing a group of disarrayed Miao people to meet missionary and latter guided Mr. Samuel Pollard, a British Methodist missionary, to the Miao tribe in Guizhou, China, to become Apostle to the Miaos. There is nothing accidental in the China Miao Christianity; everything is but a sign of God’s hand in action.

This thesis presents the testimony of how God has act in bringing the Gospel to the Miao and how the seed of the Gospel germinated and

flourish to change and enrich the life and the culture of the Miao tribe making it the pride and the glory of the nation, wiping out illiteracy, disease, and poverty in less then 20 years..

It also describ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rst 50 glorious years, and the decline of the mission after the Communists took over the governmen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the obliteration of Christianity among the Miao.

It further analyzed in theological perspective, the cause, the process and the result of such a disaster, then presents the hope, observing recent happenings under God’s provision, then present bright outlook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Shi-Men-Kan， the Stone Gateway Church

The thesis concludes with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study on Shi-Men-Kan church suggesting practical actions needed to be taken should Christianity desires to stand high in world history proving that nothing is accidental, everything but an action of God’s hand strengthening our faith to exclaim together with Job: I have heard of thee by the hearing of the ear: but now mine eye seeth thee! Job (42：5).

Mentor’s Name: Joseph Tong, Ph. D Word Count: 83146

摘要

陳, 華揚. 中國貴州石門坎苗族教會歷史回顧和研究, 2017.

International Theological Seminary, Th.M. 页码 163.

本論文通過從石門坎苗族教會建立、發展、興盛的歷史回顧，較詳細、系統地將整個事件展開在讀者面前，目的在於呈明石門坎教會在 100 多年前的苗族大山中得以橫空出世，享譽海內外，成為中國西南文化中心，這絕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而是上帝整個救贖計劃中，親自介入，並在各項福音事工的作為最真實的果效。讓世人知道，世間萬事唯有上帝是其中的主宰。

論文的第一章，主要陳述本論文初創感想和思路，所要達到的目的，實盼望成為"拋磚引玉"之效，從而使石門坎教會成為神學界更多人關注、重視和研究的課題，讓今天的石門坎教會成為眾教會的見證，真正引起中國教會和海外教會或機構的重視，並得到實質性的幫助；

第二、三章，主要陳述整個石門坎教會前後的人文、歷史背景；海外宣教機構和柏格理及其他宣教士在這中間的工作和成績。其中特別對大花苗族的歷史，英國聖公會的歷史，偉大的英國宣教士柏格理等人的人格魅力，為神忠心竭力的獻身精神等進行了展開表述和評論，以及他們在石門坎這塊大花苗族人居住的地方作工的巨大成果，用敘述的方式進行梳理、陳述和再現。從遠古至近，讓讀者猶如身臨其境，有一個較為直觀、真實而清晰的脈絡。

第四章重點從神學的角度評估和分析。石門坎教會在神學上的貢獻和意義，它為神學提供的重要研究價值；在中國教會史上的經驗和教訓；對當時，今天和今後教會的發展有很重要的借鑒和指導作用。從神學的宣教和教會論等方面探究石門坎教會發展進程，這些神學的研究，都為突顯神在其中的作為和掌權。

第五章就石門坎教會興衰的歷史，舉出成功和失敗的有力證據，站在改革宗神學立場上，從應用的角度考量，筆者對石門坎教會提出了一些有建設性的提案。

整篇論文的意義在於：歷史是血，真實存留。石門坎也絕不是一個偶然發生的事件，而是神永恆計劃必然在祂鎖定的時代中，石門坎大花苗族人被救贖、參與

其中活生生的生命見證。也通過歷史的再現，讓信祂的不得不說：“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伯 42:5）祂的大愛無疆永不止息！

導師：唐崇懷，博士　　　　　　字數統計：83146

ENGLISH LANGUAGE DISCLAIMER

As a non-native speaker of English, I am aware that my writing may at times lack clarity, though I have attempted to write as clearly as possible. Please note that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is work is to acknowledge a theory and to apply it to a particular context. I appreciate the editorial assistance I have received from various individuals, but acknowledge that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work is entirely my own.

DEDICATION

獻給

感謝神，五年前是祂的呼召，得以進入神學院接受裝備，並為我預備了一切所需。是祂一路的帶領和攙扶，能夠讓我順利完成這個階段的學習。

本論文也敬獻給九泉之下的父母，感謝他們的養育之恩！

感謝我親愛的家人，特別是我的姐姐和妹妹、弟弟、姪女們，他們對我經濟上無私的支持、精神的安慰和關心。

本論文獻給默默愛我、支持我的教會、牧師和弟兄姐妹們！

感謝

謹以此論文獻給為我們人類創始成終的”三位一體”真神！

謹以此論文獻給為中國的福音全然擺上，捨身奉獻的所有宣教士們！

謹以此論文獻給今天繼續為神的國度事工的擴展、播種，在各個侍奉崗位上神忠心、良善的僕人們！

謹以此論文獻給石門坎大花苗族上帝的兒女們！

筆者從決定將石門坎、將柏格理及其他獻身石門坎福音的外國宣教士們的事蹟，作為畢業論文的內容寫作，從開始，到完成論文的整個過程，都被一種力量激勵和感動。特別是對於基督教信仰有了更深一步的認識，對筆者屬靈生命是一個新的提升。更是對接下來走向事奉工廠是一個預先的操練和學習。但願此文獻能成為自己今後致力於繼續神學研究探討的開始和方向。

因為石門坎，才有了這篇論文。雖然在論文寫作過程中，面對還有更多值得挖掘的東西，而無能為力， 留下了好多的遺憾。然而石門坎這個上帝深愛的地方

和那裏的大花苗族人民將成為一個基督徒再也放不下的眷念，將一生宣揚，為其呼喊效力！感謝我的苗族鄉親們！

特別感謝我屬靈的父親，敬愛的唐崇懷老師！我在美國 ITS 神學研究院的五年神學裝備中，他的博學、愛人如己、言傳身教、諄諄教誨，使人看到耶穌基督就活化在生活的現實中，他將成為榜樣，是我一生珍貴的財富學習和追求之。特別作為筆者論文的指導老師，他付出了辛勤勞動和心血。他對於學術的認真、嚴謹、訓誨，筆者深深感恩。

“悠悠寸草心，報得三春暉。”筆者任何獻上也難以報答，只能將餘生投入福音之事奉，為主而活，也是對老師最好的回報。同時也感謝指導老師溫以諾博士，在我論文的寫作中給予的誠懇指導、意見和修正。

謹將此論文，再次恭敬地獻給愛我的主耶穌基督，並祂寶血買贖的眾教會。讓讀者得以從中認知到，神籍著世代裏祂所差派的僕人，將救恩傳給世上每一個人。並且任何時候這個救恩的確據都不會落空。而我們在神的全備眷顧下，當一路追趕，不可緩行，因為在沒有坐穩天堂之前，任何人都有可能失去救恩。阿門！

TABLE OF CONTENTS

第一章

緒論

1.1. 寫作緣由

筆者知道石門坎這個地方，是六年前從深圳回到貴陽後，一位教會姊妹送給我一本由貴州學者、作家、基督徒王大偉作的《尋找那些靈魂》，讀後，內心深深被震撼了。貴州這樣一個到目前來說，仍處於全國邊遠貧困省份，竟然在 100 多年前，有一群外國傳教士為著福音的緣故，來到這裡。那些外國傳教士：柏格理、王樹德、甘鐸理、高志華等，特別是柏格理，當時帶著一顆傳播基督福音的敬虔、對未得之地、未得之民的負擔，帶著愛、帶著上帝託付的福音使命，來到災難深重，貧窮落後的中國，又是貴州這最貧窮的威寧縣，甚至威寧最貧窮的石門坎。在廣大中國的西南地區，為見證上帝“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提前 2:4），鞠躬盡瘁，獻上生命的代價，有的屍骨長眠於那片土地。然而，他們卻清楚地知道這一切都是上帝的作為，他們帶著福音的盼望，等待基督耶穌再來的那一天。因為他們相信神應許說：“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裡面，你們就要活了。我將你們安置在本地，你們就知道我耶和華如此說，也如此成就了。”（結 37:14） 石門坎作為神向今天我們啟示的真實歷史事件，讓不僅信徒，包括未信主的人們看到：只要上帝的光照亮在那裡，就是最黑暗的地方也會見光明！更讓人們看到和經歷到信奉神的門徒，

因著學效神兒子——耶穌基督的樣式，他們身體力行，擺上生命的事奉，克服難關，為得著“羊群”，而改變困境，改變人心，更重要的是讓人明白，人是有永恆生命盼望的。

為石門坎，自己從前沒有想過要做什麼，也沒有思考過能夠做些什麼。這段歷史、這一群傳教士的事蹟讓我感動、敬畏，也只是在腦海中存留著一個位置，遇事或提起時又拿出來感動一番，成為勵志榜樣的範本。真正決定石門坎這段歷史要作為我畢業論文的題目，並在神學上有所探討，是我去年四月有了石門坎“朝聖之旅”的親身經歷和感受而定的。

2016 年 4 月我特地拜望石門坎，在石門坎短暫的五天逗留，我沒有權力評說石門坎當前教會的情況，也不能完全判定今日信徒們的屬靈生命狀況。但我不得不誠實的說，看到那裡今天教會的光景和當地人民生活的實情，如今石門坎福音光景和人民生活的現況，實在讓人擔憂。一顆心就此不能放下。

在王大衛《尋找那些靈魂》一書中，這樣記載了傳教士柏格理到石門坎後，和後來陸續到達石門坎的傳教士他們福音宣教工作的成果。

在宣教士們到這之前，石門坎完全是一片茅塞未開的蠻荒村落，但伴隨著福音的傳入，這裡曾躍越為中國文化的先鋒：

> 柏格理自創了苗文，創辦了烏蒙山區第一所苗族小學，建立威寧地區第一所中學，培養出苗族歷史上第一位博士，在中國首倡和實踐雙語（漢語、苗語）教學，“開中國近代男女同校先河，建造中國西南地區第一個游泳池和第一個足球場，創建烏蒙山區第一所西醫醫院，使石門坎成了一個無比絢麗的文化聖地。他還創辦了中國

> 最早的麻風病院與孤兒院。此外，柏格理與他的同工和繼承者們先後在黔西北和滇東北地區創辦了80多所學校。[1]

中國解放後，因為政局原因，從 50 年代初期起，這裡勒令基督徒還俗，驅趕外國傳教士，對本土的傳教士，通過殺，關，管的方式嚴懲，幾乎讓這個宗教信仰體系崩潰。信仰體系的崩潰直接導致文化的退化，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停滯。到了 1989 年北京石門坎教育公益基金會發起人，陳浩武，曾經做過一次調查報導：

> 我們1979年就改革開放，1989年改革開放十年了，石門坎是什麼狀態呢？1989年的調查，這個地方十個人共一床棉被，兒童失學率達到88%，因為貧困而接受救濟的家庭達到98%，文盲達到80%，貧窮和落後是非常驚人的，石門坎重新被邊緣化。[2]

為什麼會出現如此強烈的反差？讓人很驚訝！根源在哪裡？這正是筆者想通過找尋歷史而得出的真實答案。

很清楚的, 石門坎的興衰直接與福音、與基督教宣教歷史有關，作為一個學神學的人來說，自己理當有這樣的一份責任, 認為石門坎的歷史在神學上的價值非常重要，筆者願意嘗試並為之努力。當然因為各種因素的限制，筆者的論文只能提供一個研究方向, 不可能完全的論證。它只是一個大膽的嘗試，盼望通過這樣的一個論題的探究，作為自己一次靈魂淨化的旅程。當我們用神的眼光看待這一切的時候，對於全備的福音來講，對於石門坎過去、現在發生的，和將來要發生的事聯繫起來看，這一切都是神整個救恩歷史的一部分。筆者相信神允許一些事的發生，深信神有祂的美意，是我們難以測度的。儘管今天我們看到的只是 100 多年前傳教士們工

---

[1]大為 王, 尋找那些靈魂, 2nd ed. (香港, 中國: 香港文匯出版社, 2008), 325.

[2]浩武 陳, “石門坎給今天中國教會和社會帶來什麼啟發？,” September 8, 2015, accessed July 1, 2017, http://www.chinaaid.net/2015/09/blog-post_92.html.

作留下的殘篬斷壁，但這段真實的歷史從此被刻在宇宙長歷史河中不能磨滅，它還會繼續往前，直到神的日子滿足。筆者只是在思考，神何為讓我作為貴州人, 又與石門坎相遇，祂要我看什麼，做什麼？

柏格理他們這樣的人和事，竟然發生在筆者的家鄉，對於一個在貴州生活到六十年的人，近日才知道其人其事。雖然，這於中國國情、官方的封鎖和諱言有很大關係，但作為生長在貴州的人，筆者還是非常慚愧。感謝神，十多年前, 讓筆者從一個無神論者皈依為基督徒，有幸認識這群對上帝敬虔的僕人。

基督教的信仰是生命影響生命的的信仰，從教會歷史中，從聖經的記載中，可以看到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的的信徒，他們效法耶穌基督的行蹤，去普天下傳講天國的福音，這是基督教信仰傳承的宗旨，也是上帝頒佈給基督徒的大使命。上帝既然在石門坎開了福音之門，播下了福音的種子，就必定要成就祂的旨意。當歷史走到今天，從聖經教導中，從神的命定中，我們相信石門坎 100 多年前有神親自的幹預，藉著傳教士實踐、開闢的信仰之路，是整個石門坎教會歷史的一部分；這之後所發生的社會形勢的變故，使得那裡的福音事工一度沉寂，教會和信徒受到逼迫，這與整個國家大環境有關，同樣這也是石門坎教會歷史的一部分；90 年代中期當國務院批准向外開放石門坎後，石門坎地區教會重新恢復了主日敬拜，各村聚會點也開始有了家庭聚會。雖然石門坎教會因為歷史的緣故由政府幹預以“三自”形式登記，但上帝的工作又以另一種方式開始了，這也要歸入石門坎整個教會歷史的延續。這條線今天繼續在延伸並沒有完結。近二十來年，不斷有國內外不同的福音機構，還有很多被石門坎感動的團體和信徒個人以各種方式對石門坎教會及信徒

開展福音事工，並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為改善對大花苗族人民的生活鼎力幫扶，因為上帝的工作從來不被攔阻。

柏格理和那些奉獻在那片土地上的十多位英國傳教士, 他們的行為壯舉，讓我動容，是他們的事奉和辛勤耕耘所留下的福音種子讓我想寫、要寫。真正觸動我內心的是希望通過這樣的一篇回顧和研究，從歷史、從神學上作一些探討性的評論，可以從上帝的整個救贖計畫策略中看到祂的真理和旨意，並通過從神學的角度，分析石門坎福音工作中的經驗教訓，看到神今天到底要我們從中明白什麼，從石門坎福音事工的衰亡教訓中總結經驗，我們要如何作，而重新恢復石門坎教會，使福音在那地再次被復興。這就是神給我對石門坎的感動，因著這個機會，也正是出於這樣的一個內在力量的推動，激發了這個命題要研究的動機緣由。但願這篇論文能給關心和致力於福音事工的組織、機構或信徒、會眾提供一些參考素材和資料，同時更是可以激勵自己在以後的事奉中，或可親自參與到石門坎教會的重建和復興。

1.2. 寫作目的

100 多年前，石門坎大花苗族人民信仰基督教，從理性或社會歷史條件來分析，如果沒有一個外在的力量，事情根本不可能發生。這個外力背後是什麼樣的一種力量呢？歷史學家會從社會進程的角度去尋找答案；人文學家會從文化的滲透視角來詮釋；其它學科的研究者也會用他們學科的觀點、眼光去解釋。無論出於什麼動機，背後都有其要達到的目的。或是從歷史的沉澱中，去追溯一種精神；或從文

化的影響改變中找到可以繼承發揚的東西，今天重新整理並投入構建；或從那段真實歷史事件中得著某些啟示，對今天的環境有所幫助。都是正面、良善的出發點和舉動。據筆者有限的瞭解，從九十年代中期時，為了宣傳石門坎，國內一些有良知的學者或志願者開始著文寫書向外界報導，石門坎再次走入人們的視線，逐漸成為被關注的焦點。一些企業家、慈善家，特別是國內外的一些基督教團體和機構，包括香港的一些基督教機構和信徒個人，紛紛來到石門坎，在親眼目睹了石門坎的現況後，他們坐不住了。也因此二十多年來，石門坎得到了各方面的支助，有外來資金的投入，有被感動的基督徒或大學生志願者，短期、長期的志願者，身體力行的獻身這個地方的脫貧、支教等工作。從人力物力的投入上，到目前為止沒有停止過。2014 年 6 月，由著名經濟學家、教授,陳浩武發起成立了"深圳市石門坎教育基金會"， 這個基金會的目標是專門針對苗族兒童的教育，旨在貫徹和推崇公平教育的理念，他們還和北京友成基金會在進行戰略合作，意在把北大附中和人大附中的課程，通過線上教育傳送到威寧縣地區和石門坎地區，讓當地的苗族兒童能享受到和北京一樣的課程。這個基金會還與上海的百特基金會也正進行戰略合作，內容是針對石門坎、威甯地區的教師進行大規模長期的正式訓練。2016 年 10 月 22、23 日，

石門坎教育公益基金會在北京舉行了第三屆石門坎與中國鄉村建設論壇會，真是鼓舞人心。

此後二十多年，石門坎到底發生了些什麼樣的改變，各種投資，（包括人力、物力、科技、教育等）帶來的果效如何，但凡明眼人實地一看就不難發現，變化的進度實在讓人不容樂觀。

> 如果你瞭解前段歷史，只要你到過那裡，你會非常震驚，這個被柏格理及宣教士們用幾十年的時間打造成的“海外天國”和“西南文化的聖地”，竟然今天找不到任何歷史的痕跡，貧窮、落後、沉寂還是那裡現今的常態，完全與外面突飛猛進的現代化的快速發展形成一種強烈的反差，這其中深層的問題到底在那裡？[3]

從以上所述，近來政府的努力也好，社會各方的支持也好，確實作了一些工作，但都如蜻蜓點水般，沒有實質性的改觀。這正是我感興趣想要找到答案的原因。根據自己所瞭解和所掌握的資料分析，可以說石門坎這段歷史直到今天所經歷的一切，它當年的成功也好，解放後相繼而來的失敗也罷，都與當時當地社會歷史背景、制度息息相關。在中國，可能這還是一個比較敏感的話題，但是聖經教導說：“我們既然蒙憐憫，受了這職分，就不喪膽，乃將那些暗昧可恥的事棄絕了，不行詭詐，

[3]紅 沈, 石門坎文化百年興衰 (瀋陽, 中國: 萬卷出版公司, 2006), 103.

不繆講神的道理，只將真理表明出來，好在神面前把自己薦與個人的良心。”（林後 4:1-2）

2015 年 10 月在“柏格理教育思想學術演討會”上，陳浩武說：“石門坎可以作為社會改造的一個重要的模式，借著信仰和內在的力量推動文明。”其實他們很清楚信仰是內在的力量，可惜的是，因為信仰並沒有與他們生命發生關係，一切的出發點當然還是脫離不了大環境的影響和個人的局限。或許因為政治大環境，他們也是無奈而為。還要承認，因為資訊來源的局限性，自己也沒有看到更多真正有價值的東西，但願這次的探討習作，能夠發現和找到這方面更多真實又有價值的實證。

基督教的信仰讓我們知道，每件事的發生都是上帝在祂永恆計畫中的工作。石門坎當初的改變，既然是上帝借著柏格理並其它傳教士工作的結果，就如筆者本節開始提到的，它背後一定有一種力量。這種力量，出於神，回歸的溯源也在神，因此用上帝恩典和聖靈的工作來解釋，才能完全說得通。而且它的最終回歸、復興也需要神的再次介入才得以完成。那麼這就要從神學，也只能從神學的上去探求，才能找到答案。對於石門坎基督教的歷史，從神學上去認識，從神學的那些方面去著手研究，這是必要的事。

早期，福音在石門坎為什麼能夠成功，使威甯縣一度成了"西南文化聖地"，石門坎被譽為中國西南的"耶路撒冷"；到了五十年代初，隨著傳教士的離開，政治大環境變化的影響等，牧者、信徒受逼迫，教會逐漸走向滅沒。今天石門坎教會雖然恢復了敬拜、聚會，但我們並沒有看到福音復興的火焰。這在教會歷史、神學認識論和神學的探討中，我們應當如何評價這種現象；此外，在神學上，石門坎教會的經歷為我們留下什麼寶貴的經驗教訓；它在教會歷史上有什麼重要地位和意義。這實在是神學值得研究意義重大的課題。

筆者的目的：在於通過對石門坎這段歷史的回顧和研究，支持論點：從歷史再現的陳述中，證明石門坎教會的建立、發展、復興是上帝在歷史、空間中的親自介入，是上帝愛世人，在祂設計整體藍圖中不可缺失的一筆。這一切的作為，是藉著英國聖公會所差派的以柏格理為代表的宣教士們，遵行神的旨意，在石門坎與當地培養起來的漢、苗族同工合力，通過近五十年的不懈努力，克服千難萬險所完成的壯舉。到新中國建立後，政權對宗教的管理和限制，石門坎教會又是如何走向衰亡的歷史記錄中，看到真理在人們踐行中所要經歷環境各種的試煉，所必須要走過的路程。最終突出，上帝是掌管人類歷史的主宰，今天石門坎教會被重新恢復敬拜及其他的活動，就是上帝祂自己最完美的明證。從歷史、從神學上舉證，從聖經中

找到根據。為復興石門坎教會，恢復福音在石門砍的重新復興，提供神學上的論據。希望可為神的兒女預備一些鋪路的小石子，來體現神國度在石門坎的"再次降臨"，是為至慰。

1.3. 寫作方法和步驟

這個論題要完成，對於我來說，確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主觀方面，希望能夠寫出一篇有學術水準，對社會、對教會、對人有實用參考價值的學術評論，更重要的是能榮神益人；客觀來講，由於筆者實在能力有限，無論是學識、歷史、通識等方面都還待長進，在神學的專研上更有欠缺，這是困難之一；另外，在資訊方面，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國外，與石門坎有關的史料，保留下來的，包括研究性的學術資料少而又少，要查到的史料也是不太容易，這是困難之二。然而我對石門坎的感動和責任確實是大大超過這些的困難。保羅說："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立比書 4:13）所以不是我可以做什麼，而是祂與我們同在！

筆者將秉承尊重歷史，認真、嚴謹的態度，就已經學到的神學知識，以敬畏的心，按著石門坎教會歷史前後演變的順序，用敘述、紀實的方法，通過所掌握、並被證實的真實歷史來介紹，還原石門坎過去和今天真實面貌和光景；同時從教會

歷史這條線索追溯當時海外宣教大背景下的形勢和機遇，以及當時石門坎大花苗族人民的生存狀態。福音的進入，對於當時石門坎來說，是一種什麼樣的改變，這中間是什麼因素促成“福音進了石門坎”；在神學上，在神的整個永恆計畫中，石門坎的地位和意義是什麼？

筆者將重點從神學中的宣教神學的知識，用微觀的視角、多角度具體進行評介、評估基督教宣教活動在中國一個局部地區，西南少數民族——石門坎教會的建立、發展、變異、消亡的興衰過程；將系統收集、鑒別、查考到的史料，深入實地考察、走訪掌握的第一手資料，論證大花苗族人民皈依基督教的原因；重點從文化教育、福音兩條線切入，分析和比較以兩種不同角度為出發點，在石門坎教會歷史進程中的作用和經驗教訓；還將探究政治與宗教的關係，基督教在石門坎地區的傳播歷史中，這種關係所帶來的衝突和影響；針對石門坎教會歷史的演變，為什麼會出現當初的復興和後來的衰亡，展開深入分析，從聖經記載中的教導依據，通過論證評估，讓我們可以看到上帝話語的權威和真理；論文還將涉及福音與民族性關係的分析，納入本論文的討論，是想力圖發現並挖掘神學與傳統性、民族性的融合，困難和問題在那裡，石門坎教會宣教的失敗原因與福音超越民族性觀念有沒有關係，

聖經中宣教歷史初期使徒時代是如何教導和處理的，有什麼經驗教訓可以從石門坎教會歷史中學習和借鑒。

在分析和評估石門坎教會歷史的過程的寫作中，主要參考並啟用相關的神學專著及文獻資料，用來對自己在論證過程中的論據。最後是筆者對重建石門坎教會的前瞻性認識和一些建議；對於今天的中國教會，包括今天的石門坎教會，特別有感而發，就當前基督教在中國所面臨的嚴峻形勢和挑戰，基督徒的態度和立場；在宣教和福音的策略上，教會要如何尋求一條智慧並通達的路徑，從社會學、神學上本人也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觀點。整篇論文可以從分析、論證中看到筆者在神學上改革宗的觀點和立場。

1. 4.　寫作的範圍

這篇論文從醞釀到題目的確定，內容的組織、結構，取材的增減等等，包括所有參考書目的查閱，相關的史料、旁證材料、實地考證資料的獲得，到最後寫成，定稿，最終得以呈現給大家，這中間的時間只有短短的一年。這對於一個在美國神學院讀書，而所寫的內容，人物和事件、時間地點等等卻都發生在遙遠的中國，這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從研究的時間、精力的投入上來說都是不夠的。

材料準備和採集方面，特別是實地考證方面的材料也是有限的，使得論文的學術價值的份量和完成的品質上存在先天的不足。根據這些存在的問題和具體情況，本人在寫作上就不可能涉及到神學以外更多的學科，並一一加以論證。

因此神學方面，研究範圍就集中在宣教神學及聖經神學福音部分進行展開分析，最大限度的去挖掘和深入探究那段歷史，並它所帶出來在神學思想和思考，它對神學發展的貢獻是什麼？教訓是什麼？至於未完善的研究部分和範圍，在此“拋磚引玉”，期待也有此負擔的人今後更加深入、詳實地去探究。

第二章

石門坎的歷史背景及歷史沿革

2.1. 柏格理生平；英國聖公會，循道會，衞斯理宗及宣教策略

2.1.1. 柏格理其人

柏格理，英文名"撒母耳.波拉德"（Rev.Samuel Pollard,1864-1915），英格蘭人，出身於英國西南部的康沃爾.卡梅歐福特小鎮。康沃爾的居民大多是清教徒，因此無論你走到那裡，到處都能看到古樸、典雅的基督教小教堂。柏格理的父親原本是一個制繩工人，母親身上有法國血統。柏格理的父母都是虔誠的基督徒。父親因為上帝的感動成為一名巡迴傳教士，爺爺也是一位巡迴傳教士。1864 年 4 月 20 日，柏格理就出生在這個小鎮，一個底層社會的基督教世家。柏格理是家中的長子。他的母親從一懷上他就不斷地向上帝禱告，希望這個孩子能夠成為上帝的僕人。他們給孩子取名撒母耳，寓意是：這個孩子是從上帝那裡求來的，也要把他終身獻給上帝。

柏格理9歲時，跟隨父親的佈道事奉去到韋斯列小學讀書，13歲轉入教會辦的希博爾公學。在學校裡，他是品學兼優、敏銳善辯、熱愛體育運動的學生，他尤其在數學方面具有特別天賦。1875年，1月12日，柏格理受洗成為一名基督徒。家庭的薰

> 陶，讓撒母耳成為了一個熱心而虔誠的基督徒。他最大的理想就是長大以後，也能像自己的父輩一樣成為傳教士。在他的日記裡寫道："他受洗的第二天，一整天都是跪在好友奇帕斯蒂德的小屋裡，向上帝祈禱，盼望自己能夠成為合神心意的人。"[1]（撒上1：19-20）

在學校他一直是家人、老師、同學的驕傲，1879 年，在牛津地區的會考中他獲得最優異成績；在教會的生活中，也追求屬靈生命的不斷長進。

在柏格理的成長過程中，他也看到現實的殘酷，屬靈生命雖然是有神的帶領和信心，但因著人性的軟弱，信心也時有起起落落的時候。父輩每天風雨兼程的傳道，不分白天黑夜的探訪信徒，也保證不了家庭最起碼的衣食飽足，仍然過著貧寒的生活。這些對於他理想為神做事的信心產生了動搖。雖然他仍然愛上帝，這個時候他還是決定不選擇他家幾代人所從事的牧師職業。作為長子，他決心靠自己的努力讓父母和弟弟妹妹們過上富裕的生活。1881 年，柏格理參加了英國公務員考試，名列全英國第三名。於是這個全身充滿熱情、朝氣的年輕人躊躇滿志地離開了家鄉，來到了首都倫敦。因為他在數學方面的天賦，在英國郵政銀行做了一名公務員，成天坐著數點鈔票。柏格理這時很快對自己定下了人生的目標，決心在最短的時間內，使自己的年薪達到一個理想的數字。

---

[1]信 阿, 用生命愛中國 (鄭州, 中國: 大象出版社, 2009), 6-8.

柏格理還在母腹中，媽媽就求上帝，盼望將來孩子成為祂的僕人，並將一生獻給上帝使用。就像聖經中神親自揀選哈拿的兒子撒母耳一樣。神的話是信實的，從柏格理進入社會工作起，他的媽媽就不喜歡兒子的選擇。因此從來也沒有停止為兒子恒切的禱告，而回轉"將身體獻上當成活祭。"柏格理在銀行工作了一段時間後，上帝垂聽了他母親的禱告，因為柏格理越來越討厭工作的按部就班、平靜舒適的生活，他描述自己就像困在籠子裡的獅子。他越來越熱心參加教會活動，也經常來到上帝面前禱告，尋求上帝的心意，希望全能的上帝能解開心中的迷律，為他開事奉的道路。

1885 年，英國傳教士李文斯頓深入非洲傳教的傳奇經歷直接感動了柏格理。李文斯頓一直對中國宣教情有獨鍾，他在極端貧困的環境中靠著頑強的毅力完成了醫學院的學習。1840 年，正當李文斯頓要出發去中國宣教時，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前往中國傳福音的門暫時關上了，而上帝為他打開了另一扇門。上帝感動他去非洲，而且他的目標是宣教士從來沒有到達的地方。他三次探險，深入"黑暗大陸"非洲三萬裡，經歷萬死千難，他用生命愛非洲人民，用他的醫術救了無數人，他也是終止在非洲販賣奴隸的關鍵性人物。1873 年，他在第三次深入非洲內陸時，途中因積勞成疾，"壯志未酬身先死"，榮歸天家。李文斯頓的傳奇經歷讓年輕的柏格理激動

不已，這也成為他放下世界，接受神呼召的有力動力。郵政銀行狹窄的空間再也容不下這位年輕人的淩雲壯志，上帝的靈深深地觸摸著他，他越來越相信他的使命就是成為上帝的器皿和工人。當即他下決心要像李文斯頓那樣，到沒有傳教士去的地方，並立志在上帝的指引下，向未得之地之民傳福音。

柏格理在 21 歲時日記中寫到：

> “相信這是我們天父的意願，要我帶領人皈依基督。我決心像我父親那樣，不僅僅限於口頭禱告，還要投身實際的拯救工作。但願全能的上帝指引我以正確的方向。抑或懷著對基督的熱愛而鞠躬盡瘁，抑或得到聖靈的智慧而昇華。”[2]

上帝的話像舊約記載呼召臨到哈拿的兒子一樣臨到了柏格理，他母親的禱告應驗了。[3]現在就等待上帝向柏格理髮出指令，要他去那裡？

1886 年 11 月，一天柏格理參加一次海外宣教會議，演講的嘉賓是中國內地會創始人，並剛從中國回來的戴德生博士，講述了他和他的同工們在中國傳教的艱辛歷程，並有感於中國四萬萬靈魂需要上帝的拯救，戴德生在演講中被聖靈感動，對大家說：主感動他，就在今天，在座的諸位中間，主要親自興起一位工人，為他

---

[2]信 阿, 用生命愛中國 (鄭州, 中國: 大象出版社, 2009), 6-8.

[3]格理 柏 et al., 在未知的中國, trans. 人達 東 and 旻 東 (昆明, 中國: 雲南民族出版社, 2002), 458.

做工。他繼續說：“主已經為這位年輕人預備了一條最美最美的道路，時候到了，請站出來，把身體獻上，當做活祭！”

此刻一個有著一雙美麗大眼睛的年輕人，早已淚流滿面，他站了出來。戴德生問：“可愛的年輕人，上帝忠實的僕人，你叫什麼名字？我奉上帝的名，按手為你禱告。”年輕人回答：“我叫撒母耳. 波拉德。”[4]

1887 年 1 月 27 日，24 歲的柏格理，與自己希博爾公學的同學，弗蘭克（中文名：邰慕廉），懷抱著大使命，傳福音，拯救中國失喪靈魂的雄心壯志，從荷蘭南部的提爾堡上船，經過一個多月的海上漂流，於 3 月 14 日抵達上海的吳淞口。在上海，他們接受了半年多的語言和相關的知識培訓後，1887 年 11 月 12 日，柏格理和邰慕廉立即被派往到當時西南人跡罕至的烏蒙山腹地，地處滇、黔、川邊的雲南昭通，開始了他 28 年中國西南，雲南的昭通和貴州石門坎傳奇的生命豐盛傳教工作。

---

[4]信 阿, 用生命愛中國 (鄭州, 中國: 大象出版社, 2009), 10-11.

2.1.2. 英國聖公會、循道會及宣教策略

循道公會即衛斯理宗，也稱英國循道公會。它的產生與英國歷史有關。本宗創始人為衛斯理.約翰（John Wesley）。1703 年 6 月 17 日衛斯理.約翰出生於英格蘭北部厄普衛司鎮。原系英國安立甘教會（現今稱聖公會）牧師。1738 年，受聖靈感動，心靈變化而更新。在經歷了得救重生的改變後，他決心以"全世界都是我的牧區"為教會觀。這不單影響了衛斯理一生，也影響了全世界，此後他經常舉行戶外佈道，開始了英國十八世紀的宗教復興，並積極推動衛斯理的"救靈運動、聖潔運動及社會工作運動"。一時聖靈的風吹遍英國，帶動心靈與道德的重整，免除了國家一場可能流血的革命。

為使社會廣大平民階層得聞福音，1739 年 4 月 2 日衛斯理約翰第一次舉行露天佈道，以後將福音帶到荒野、礦場、貧民區、工廠、監獄等廣大的群眾當中。此一做法激起了國教安立甘會普遍激烈的反對、譭謗、恐嚇，甚至拒絕衛斯理.約翰進入教堂講道。衛斯理.約翰從未有意脫離安立甘會而別創教會，但情況演變至此，加上衛斯理的佈道工作如日中天，靈性饑渴的廣大民眾，排山倒海而來跟隨衛斯理.約翰，他們需要屬靈供應的地方，他們需要關心牧養他們靈魂的牧人，他們需要一

個有完全歸屬感的教會，所以在這樣的形勢推動下，很自然的一個新的教會，衛理公會就漸漸成形並脫穎而出了。

衛理宗佈道與建堂工作繼續發展，它由英格蘭至愛爾蘭，再傳至美國。衛斯理. 約翰和他的團隊 1784 年 12 月 24 日，衛理宗的牧師及會友在馬利蘭州巴爾的摩舉行會議時，正式決議組成美國衛理公會。選出亞斯理為會督，教會命名為循道監督會。在美國衛理宗的發展中，也曾有兩次顯著的分裂。1828 年有虔誠聖潔的會友多人，主要由於堅持會友代表權的緣故而分離，另行組織美普會。1844 年又為蓄奴問題或總議會與會督之許可權問題而分裂，在美南的稱監理會，在美北的稱美以美會。但上述三教會終於在 1939 年 5 月 10 日在密蘇裡州坎薩斯城召開的聯合大會中合而為一，稱為衛理公會。

> 十八世紀中期，英國開始了產業革命，新的工業城市不斷建立，產業工人階級由此誕生。但當時居於統治地位的的英國國教已不能有效的適應新形勢，失去了對社會下層的吸引力，國家社會出現了信仰危機。在這種情況下，約翰. 衛斯理與其弟查理. 衛斯理力圖挽救危機，復興基督徒教信仰。約翰. 衛斯理潛心研究聖經和新教各派的宗教思想，提出循道宗的主張：他認為只有提高每個基督徒的靈性修養，和道德水準，建立嚴密組織，改變陳舊的佈道方式，才能挽救危機；[5]

衛斯理宗（循道公會）繼承馬丁. 路德所主張的"因信稱義"原則，重視內心的宗教體驗，強調信徒憑藉信仰就可以直接交流並得救，而無需包括主教、神父的教

---

[5]和平 秦, 基督宗教在西南少數民族中的傳播史 (成都, 中國: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3), 123.

階制度作仲介；主張基督普遍的愛，強調自由意志。認為個人可憑對上帝純潔的愛而戰勝罪的誘惑，榮恩而成聖。他們在國內傳教的同時，非常注重開拓海外傳教事業，其宣教活動先展開於西非、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亞、美國等地。

1840 年，自爆發鴉片戰爭後，循道公會開始陸續向中國差派傳教士傳揚福音。英國、美國和加拿大差會分別派傳教士來華，並將在中國的差傳工作分為七個教區：包括溫州、寧波、西南（雲南、和貴州威甯石門坎一帶）、華北（山東樂陵、惠民和天津一帶）、湖北、湖南、華南（兩廣）。總部設在漢口。

循道公會在信仰上多受到聖公宗、加爾文宗的影響，在組織制度方面又具有自身的特點。聖經、傳統、經驗和理性是形成他們神學的四大基本原理；神學的核心是救贖輪，馬丁. 路德的救贖輪中心是因信稱義，而衛理宗不僅是稱義，連成聖也納入他們神學的救贖中心，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更強調成聖。

在宣教的策略上，循道公會的宣教模式，除了根據於法規建制，更重要的是衛理宗的思想傳統。“聯結觀”是這一思想獨特的思想理念，這也成為衛理宗實踐基督信仰的主要依據。他的“聯結觀”遠超過現代社會當中的組織、機構、或是層層分級的概念，它更包含著牧養的視野、宣教的原則、守約等重要的神學意涵。

> 在約翰. 衛斯理的用法當中，“聯結”包含三層意思：會友、會社、與牧職人員或宣教者的“聯結”。也就是將神的兒女緊密的“聯結”起來。而這種“連結”絕非僅僅是組織上的結合，更蘊含著是一種教會觀；其次，“連結”是源于宣教與傳道上的需要，旨在建立會友、會社、與牧者間的聯繫。這是一種人際間的聯繫，而非組織上的聯繫。其目的都在於使人與人之間能夠面對面，產生實質的互動；再有，他的人際關係的“連結”，要超越“在地化”的局限。約翰. 衛斯理強調“全世界的信徒都是一體”，信徒間的“連結”沒有界限，籍著福音的聯繫，所有組織上的潘蘺都應當被跨越；第四，透過“連結”實踐信仰的責任，以及與上帝立約的承諾。一切的目的不在社會情感的維繫，而是要避免靈性與信仰上的疏誤，籍著信仰關係的“連結”，幫助彼此在信念、禱告、順服等等的功課上，不斷的見證並宣揚神的福音。他親切的比喻為一種“團契”的關係。[6]

循道公會的教牧人員，不論是牧師或會友，都是受任於整個教會的，他們被差往不同的聯區，而不是受命於某群特定的會眾。把"普世教會"帶到"這裡"，而不是昂首眺望的"那兒"。組成一個大家庭，相互配搭，宗旨是在基督裡合一。神職人員奉獻自己接受詢問後，毫無保留的接受上級的調派及服務。

柏格理具有悲天情愫，上帝感動帶給他的願望及心志與循道公會的宣教理念正好與他思想不謀而合，由此他義無反顧地，為了上帝的緣故，甘願放下豐厚待遇的工作，向福音未開墾的最低處行進。

---

[6] 君華 龐, “從衛理宗的連結觀（connectionalism）反省當前開拓的事工,” https://bible.fhl.net/, October 12, 2003, accessed July 1, 2017, http://bible.fhl.net/gbdoc/wf/wf5.html.

2.2. 烏蒙山區苗族發源歷史及社會文化背景

苗族，在中國五十六個民族中，人們普遍印象裡總是與邊遠、落後、貧苦、野蠻等詞彙聯繫在一起，因為這個民族大多至今仍生活在西南邊陲的大山深處。生存環境比起開放的城市和鄉村還是有很大差距。當我們走進歷史，追尋苗族這支族群的整個發展演變過程，他們孤星淚血、悲壯、可歌可泣的生存抗爭的經歷讓我們有著一種厚重，沉甸甸的情感。

> 苗族本不在貴州，是由於不斷的遷徙才逐步穩定在以貴州為主的地區，而且大部分深居貴州已有千年以上的歷史。苗族遷居貴州以後都還在不斷的流動之中，雖說到了清代已基本穩定下來，但仍有少部分不斷地遷徙至周邊的泰國、老撾、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和地區。[7]

苗族這一概念，其源流同與中華民族源流形成的過程相類似。她是緣故多種部落群體的組合、分化、逐步演變而成的，不是單一的，一直就是今天的苗族那樣。

> 古書中記載的"三苗、九黎、有苗"，是今天苗民最早的部落群體。《三海經. 大荒水經》、《周書. 呂刑》、《漢書. 地理志》等這些書籍都有對這個族群的記載。這些書的說法，再結合苗族故事，就形成了今天對苗族源流的看法。因為苗族文字很少，可以說是無文字，記事靠故事、古歌等。如此，很難通過苗族自己的傳記準確地考證苗族自身的族源關係。幸好有漢文化記載的"苗事"頗多，且歷代差不多都有文字依據可尋，所以上述說法較為站得住腳。[8]

---

[7]建西 遊, 近代貴州苗族社會的文化變遷 (貴陽, 中國: 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7), 26.

[8]建西 遊, 近代貴州苗族社會的文化變遷 (貴陽, 中國: 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7), 27.

這個民族實際上是中國歷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之一，當黃河流域出現人類文明之初，便有了苗族的遠祖。他們與其它古代氏族部落一起，共同創造了最早的東方文明。

苗族的遠祖本是東方文明史上的重要角色，他們最初居住在長江以北，黃河以南的廣闊而肥沃的土地上。憑藉天時地利，最早進入農耕，較早發明鐵器，率先運用法律。苗族的遷徙從遠古至清以前，歷代均有，且路徑相當複雜。在最早的部落戰爭中，他們也是常常打勝仗。無論從那個角度評判，苗族遠祖都是當時的”望族和先進民族”。可惜在不斷的戰爭中，最終不敵皇帝部落，苗族遠祖的頭領蚩尤被俘並英勇就義，他們悲壯的故事，一起流傳後世，震撼人心。

> 不斷的戰爭破壞了苗族先民的社會組織，摧毀了他們的經濟基礎，有一部分被迫淪落為奴，而大多數則逃到夏王朝勢力還難以控制的南方深山叢林中。到了光武帝，又逐步向西南遷徙，至西晉隋唐，大量集中於貴州。苗族到貴州後，又發生了四次大的遷徙，這就是明初、明中葉和清幹嘉、咸同剿苗後的遷徙。方向是雲南、廣西、海南等省，部分的從這幾個省區又去了東南亞和北美等地，以後便基本穩定下來，形成近代至現代苗族的狀況。[9]

從北向南，從平原到丘陵，從丘陵到深山。從強盛到衰弱，從聚族到零散。從他們悲涼的《古歌》中，能看到這段悲慘經歷形成的心理積澱。[10]

---

[9]建西 遊, 近代貴州苗族社會的文化變遷 (貴陽, 中國: 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7), 32.

[10]兵 田, ed., 苗族古歌 (貴陽, 中國: 貴州人民出版社, 1985).

在這個苦難的民族中，際遇最悲慘的，又數流落在烏蒙山區俗稱為“大花苗”的一支系。這一支苗族約數十萬人，操川黔滇東北次方言苗語，主要集中居住在貴州威甯和雲南昭通、彝良、鎮雄、大關等縣，武定、祿勸、昆明、紫雲、郎岱等地的烏蒙山區，也有部分散居。烏蒙山由雲南呈北向東伸延至黔西北威寧縣境，最高峰西涼山，高達 2854 米，西北向山脈最高峰韭菜坪高 2900 米。有“高原屋脊”之稱。由於隆升強，切割深，相對高度常達 500—700 米，造成山勢磅礴，莽莽森森；山形陡峭，通天絕地；峽穀深遂，河流湍急。在這艱苦的自然環境和殘酷的壓迫剝削下，苗族人民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11]

十分悲慘的是，千百年來，苗民們因戰爭所逼，遷徙無恒，苗民們隱居深山，以樹木為伴，化仇為愛，繁衍子孫，在貧瘠的大山生生不息，頑強的存在。正是崇山峻嶺的貴州接納了他們，險峻的苗嶺，磅礴的烏蒙成為他們的家園。但就是這片荒涼貧瘠的土地，也並不為苗族所有。這個逃避殺戮而寄人籬下的苦難民族，只有以苗族佃農的身份，在近代烏蒙山區還殘存著帶有奴隸制度性質的封建領主制下，強烈地依附於彝族土目地主，以“為人牛馬，任人驅使”來作為生存的代價。

[11]坦 張, 窄門前的石門坎 (貴陽, 中國: 貴州大學出版社, 2009), 13-19.

從清朝同曆起，似乎對"苗患"用力最多的。"清廷防苗之嚴，可謂盡至......把苗民四圍封禁起來，任其在小小部落中滋生繁衍，好像猛獸一般，把他們關在囿中，四周用人看守，而又不給食物，因此為亂之事自不能免了。"[12]為什麼會這樣，原因很多，其中一種原因是地理關係方面的。清室系北方滿族，與西南少數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絕少聯繫，故同苗族有一種天然的隔膜感。但對苗族採取強烈的排斥態度和看作異類的文化態度，其深層原因還是政治文化方面的。清室入主中原，引領主流社會在受到儒家文化影響後，漢化傾向濃厚，在皇權自尊思想和漢文化中心主義的雙重意識下，以華夷之分的觀點看待苗族；再一種潛意識是，由於清室自身是少數民族，且又深受"夷夏之辨"的影響，故思想政權的"合法性"和"正統性"，因此在對待苗族這一歷史上就定論異類。

文化上，苗族社會習俗向來尚神，而信鬼，可以概括為一種巫文化。他們在歷史的演進中創造了自己這種獨特的一種文化。

這種巫文化的表現形式和內容是：苗族社會中巫師是其中很特殊和重要的角色，他就具有多種職能，也是巫文化的代表者。他們威信極高，並掌握一定的巫術，

[12]貽澤 餘, 清代苗民問題 (臺北, 中華民國: 臺灣學生書局,).

所以巫師可以說是苗族社會、政治經濟、軍事等一切活動中不可缺少的人物。苗族人的生活方方面面都跟巫術分不開。因為歷史原因，苗族社會總的巫術活動，營造了苗族巫文化的宗教氛圍，這不僅使苗族人有精神寄託，而且使生活、生產變得有意義和有目的。巫文化的另一重要內容是信仰崇拜，他們崇拜的物件大多是樹、雷公、龍、蝴蝶等。[13]

一百多年前，生活在莽莽荒原，烏蒙山區的大苗人被朝廷視為“生番”。（俗稱文明發展程度較低的人，多指少數民族或外族；或兇殘野蠻的人）就是這樣一個民族，據歷史記載，到 1860 年 5 月，花苗在近代最後一次被征剿中，苗民起義失敗後，清廷對苗民採用的手段更加惡劣，不僅沒收其田產，而且將苗民當奴隸賣給漢人和其它少數民族，大部分花苗不僅失去了個人活動限制，而且活動區域亦受到嚴格限制，官府不僅在政策上對苗民打擊限制，同時又挑撥其它民族欺淩苗族。因此，當時花苗，在政治上的欺壓和文化上的被排斥交互作用。100 多年前，在柏格理宣教士到達之前，在他們的生存環境中，他們不在國家和民族的政治範疇之內，國家不向他們徵稅，也不承擔對他們的教化義務，社會將他們置於自生自滅的處境，他們長期處在一種蠻荒的生存狀態，他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苗族的歷史，悠久而

[13]建西 遊, 近代貴州苗族社會的文化變遷 (貴陽, 中國: 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7), 51-56.

深沉，悲催而悲壯。筆者深知他們同被一位創造主所造，"神愛世人"的福音"聖光"，耶穌基督救恩必定要臨到這群長久在黑暗中的民族，這扇光明之門及將向他們敞開，然而，是什麼時候呢？

2.3. 石門坎福音的源起

上帝的時間到了。在遙遠的地球另一端，在大英帝國，上帝此刻預備了柏格理，他將成為上帝使用的器皿，走進這個無人問津、無人知曉村寨的碎石小徑，要將那大好的消息傳遞到烏蒙山區深處這個叫石門坎的村寨。

石門坎，今天，這個在中國五十萬分之一地圖上都沒有標注的地名，如果不是因為她那段石破天驚的輝煌歷史，如果不是因為道成肉身的基督，不是因著基督徒這層身份的緣故，她還將沉靜、悄然無聲，被人遺忘的地方。而對於一個生長在與她距離不遠，同一省份的我輩，也只是近在咫尺，遠在天邊，老死不相往來。

神的作為在祂整個的歷史進程的時間和空間中不斷向我們啟示並顯現，他不會停止。在上帝整個救恩歷史中，石門坎教會過去、今天和未來都是上帝整個計畫的一部分。石門坎教會及經歷的變遷和發展，無論在任何時候，都是教會歷史、中國教會歷史一筆寶貴的財富。她其中所反映出的信仰理念、神學思想等，值得我們

研究和探討，其中的教訓和經驗對於我們更清楚的認識神的救恩歷史、教會歷史、宣教歷史等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和意義。

石門坎與柏格理這兩個名字在中國教會歷史中從來不可能分開而論，無論單論其中一個，都無法道明。因為這是上帝整個救贖創造歷史的生命的見證，柏格理為石門坎而生！

就在這貴州與雲南邊界的雲霧山中，有一塊突入雲南重圍的地盤，在這荒涼貧瘠的四圍屏嶂之中，有一個居住著十幾戶人家的苗族村寨，因為寨前通向澗底的一些破損石階，取名叫做“石門坎”。在生態版圖上，這個社區原本是邊緣洪荒之地，其西部、北部靠近雲南省昭通市和彝良縣。石門坎生態惡劣，稼穡艱難，貧病交加，生計難；大霧陰雨、溝壑縱深，行路難。石門坎地理狀況複雜，山勢坡陡土地貧瘠，自然條件惡劣。海拔落差大，地貌多樣，形成涼山、半涼山和河谷之分。[14]

從前這裡隸屬雲南，後來在歷史的變遷中，最後劃歸貴州威甯縣管署。這個被喻為“拉屎不長蛆”的地方，除了種植土豆、蕎麥、包穀外，蔬菜、小麥很難存活，吃稻米都成了“二輩子”事了。悲慘的經歷，艱苦的環境，殘酷的壓迫，非人的生活，使這個忍受了數千年奴役和迫害的民族處於麻木、聽命、任由擺佈的境地。絕望已

---

[14]紅 沈, 石門坎文化百年興衰 (瀋陽, 中國: 萬卷出版公司, 2006), 117-118.

成了這一種族的特性，他們把貧窮與悲痛、疾病與死亡視為自己所無法避免的世襲命運。　但是在他們無意識的底蘊中，仍強烈地渴望著出現一個可改變其命運的救星。

1903 的一天，一群長辮盤頭，身披蓑衣、衣衫襤褸、、腳穿草鞋、背弩掛箭的人，遇到了詹姆斯. 亞當，即党居仁牧師，他是中國內地會的傳教士，事奉工廠在貴州安順。從這些人的裝束上，有人告訴說他們屬於苗族。得知他們靠著四處流浪，以打獵、幫工為生，沒有土地耕種，是苗族中最貧苦的一支，於是党居仁用自己的飯食招待正在饑餓而疲乏的這幾個苗民。並承諾如果再有什麼困難，可以隨時找他，盡可能地幫助他們。就在這以後不久，他們果然遇見一件事來找到党居仁。他們在安順當地打獵得到的一隻野豬，被當地的人搶走。於是憤然不平來找党居仁。党居仁聽完他們的委屈和遭遇後，立即給他們起草了一份訴狀，並親自與幾個苗民一起連夜策馬去找到安順的官府，於是官府派人隨党居仁星夜趕往處理此事。但當地人硬說是他們獵取的，党居仁非常智慧的問了雙方如何獵取的方法，當地人說是用亂棍打死的，苗民說是用弩箭射中的。在爭執不下中，當場驗了獵物，得以證實野豬身上有被射中的血漬和傷口。最終官府把野豬判給了苗人。他們抬著野豬回去，並把所經歷的事告訴了族人。族人們整個震驚了，原來會寫字、有文化能帶來這麼

大的改變，這讓當地人自認誠服。這件事，讓苗民非常感激，但當牧師告訴他們：你們要謝就要謝真正幫助你們的是耶穌。接著向他們用明白又易懂的語言講述了耶穌基督的故事，以及耶穌如何尋找並拯救迷途的失喪的人。這群人便問：“祂也要尋找我們嗎？”得到肯定的答覆後，對於這些苗族漢子來說，真是莫大的震驚和感動。這個世界上竟然還有人熱愛並關懷苗族，這完全是從未聽聞的新鮮事。他們帶著這個驚人的消息返回到自己的村寨——石門坎，訴說党居仁這個外國人所講述的，有一個叫耶穌的熱愛苗民。很快，接下來的幾個月，石門坎前往安順的探訪者越來越多。

> 我們知道，當時從石門坎到達安順的徒步要走十餘天，這對一群渴慕拯救的苗民實在是極其艱難的，但因著基督的愛，党居仁還是一樣接待他們。突然到來的這群人，因為不斷的需要各種說明，党居仁也變得難以應付。恰在此時，他瞭解到對於這些苗族人來說，昭通要比安順近得多。於是他為他們寫了一封信，讓他們帶著信去昭通找他的朋友柏格理。[15]

前面已經說到，此刻的柏格理與郃慕廉已經在昭通 16 年了。1904 年夏季的一天（7 月 12 日），首批四位被苗族人推出的代表跨進了昭通城循道公會傳教團的院落。來到柏格理家中的 4 個人分別叫羅但以理、羅彼得、張朝書、張朝相，他

---

[15]格理 柏 et al., 在未知的中國, trans. 人達 東 and 旻 東 (昆明, 中國: 雲南民族出版社, 2002), 403-404.

們的名字是牧師党居仁起的。柏格理禮貌、謙恭、熱情地接待了他們。他們將党居仁寫的信交給了伯格理，並表明來的目的是要想讀書識字。在幾天的相處裡，柏格理非常清楚，這群人更需要的是認識愛他們的救主耶穌。柏格理將他們當作自己的親兄弟相待，並充分瞭解他們的難處，處處為他們著想，這讓 4 位苗族人感到平生第一次活得像一個人，有尊嚴有人格。柏格理在當天的日記中寫到：

> 他們請求我的第一件事，是讓我們教他們讀書。他們想要讀書的願望非常迫切。他們隨身攜帶著小袋食物，主要是燕麥炒麵。我讓他們歇在舊教室裡。我真誠地希望，從這開始能給他們揭示一個新的天地。願上帝拯救他們。[16]

柏格理他們在教他們識字的同時，也講述上帝愛世人的故事。他的人格魅力，合情合理的言辭，用恰讓對方得以領會的深度，向他們傳播上帝愛的資訊。他們聽了，竟管還是有很多的不明白，但是柏格理他們信仰的行為，贏得了苗民的心。他們的感動無法用語言表達，他們帶著找到了一位救星的確定，返回到石門坎。這效果就像電掣風馳一般，好消息傳遍了石門坎及附近的村村寨寨，憧憬新的希望的情感激蕩著每一個人的心靈。打這以後，便有川流不息的苗族人朝聖般的前往尋找這位白人老師柏格理，絡繹不絕。苗族人尋求解放枷鎖的渴望，正是柏格理他們領受

[16]信 阿, 用生命愛中國 (鄭州, 中國: 大象出版社, 2009), 65.

神聖使命，經過了十多年來流淚撒種所求、禱告神開路的應許。雖然苗族語言起初成為彼此交流的最大障礙，但是柏格理憑著他語言方面的天賦，只經過短短幾個禮拜的突擊學習，他竟然可以面對苗民，發表較短的演講了。

從認識党居仁到柏格理接待苗民的這段經歷，他們親眼看到並認識到一個深刻不變的道理，知識和文化可以改變祖祖輩輩受欺壓的人生命運。

> 所以到了1904年底，去昭通求學求教的苗民越來越多。如此一來，引起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猜忌和恐慌，同時彝族土目（地主）也擔心苗族人信教後不再忍受他們的欺壓，團結起來反抗他們，所以想盡一切辦法打擊並阻止苗民到昭通探訪柏格理他們。更有人造謠並報告官府說：有一幫心懷叵測的外國人正煽動苗民造反。在這種嚴峻形勢下，柏格理決心進入苗區追查謠言根源，並親自見證上帝的作為，讓謠言不攻自破。雖然同伴勸阻，也想到這一去的兇險，但他對邰慕廉說："我們來中國多久了，一晃17年過去了……我永遠不會忘記剛到中國，剛到昭通，我們所經歷的一切，當你從死裡復活的那一刻起，主就給了我這樣一個信心，不管我們遇到什麼，無論我們將要面對什麼樣的環境，神都與我們同在。"[17]

1904 年 9 月 5 日一大早，柏格理與漢族同工王玉潔、鐘煥然一道出發，目的地：120 公里以外的貴州威寧。這是柏格理第一次踏上貴州的土地，道路的崎嶇比想像的還要艱難，第三天（9 月 7 日）的傍晚，他們才趕到了威寧州城。第二天就與官府派出的兩個差役一同趕往同屬威寧的羊街，向當地人宣講傳教的宗旨並政府的通告，當即解救了被當地團守關押並被拷打的苗民。並於 9 月 13 日到達狗街，在趕集的人群中宣講他來到中國的目的和苗族人信教的真實情況，並十分謙和的回

[17]信 阿, 用生命愛中國 (鄭州, 中國: 大象出版社, 2009), 71.

答每一個人提出的問題。當他講明實情後，大多數聽眾態度發生了 180 度的轉變。當天伯格理他們又趕了幾十裡路，抹黑抵達大官寨城堡，來到了曾在昭通來見過他的彝族土目安榮之家。

安榮之是威寧最大一家土目，他親手管轄著這一帶 60 多個苗族村寨，柏格理深知此人的態度對他非常重要。有了他的說明，他此行的目標就完成了一大半。好在安榮之是一個比較開明的土目，而且在昭通時，柏格理禮節周到的接待了他，彼此留下了了良好的印象。安榮之從小就開始學習漢語，後來參加了科舉考試，成為當地人見人敬的舉人。柏格理仔細地解釋自己的立場和耶穌基督的道理，並請求安榮之向他祖先學習開明的精神（安榮之祖輩曾得到大明朝帝朱元璋的讚賞和嘉獎），允許自己領地裡的苗族人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安榮之爽快地點頭答應了。之後他又到了龍街，解救了一位被土司捆綁吊梁 18 天的苗族小夥。這一切讓苗族人看到一個真正為他們爭取權利，並願意付上代價活的生命。於是他們不顧失去土地和安全的危險，大膽地接待柏格理。那一天好幾百人將柏格理小小的住處圍得水泄不通，柏格理便將耶穌生平的幻燈片放給他們看，宣講耶穌救恩的福音。耶穌的事蹟深深地觸動了每一個苗族人民的心。接著柏格理親自查清了“苗民放毒”引發的謠言，完全是因為苗民生活衛生習慣所致。風波止息了，也讓柏格理從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

看到，上帝開始在這群人中作工了，苗族因此開始團結。柏格理更清楚知道，基督教的福音在苗族人心中產生了很大作用。這也為在少數民族中奠定了建立教會的基礎，樹立基督十字架的標杆。

隨著來昭通的苗民越來越多，也產生了一些接待和牧養方面的問題，特別在同工內部也產生一些不滿情緒。昭通福音堂並沒有在苗族中傳播福音的計畫和任務，也沒有執行這項任務的經費來源。加之昭通教會在漢族中傳教工作剛剛打開局面，柏格理作為主要的負責人，他們認為應該把工作的重心放在昭通。真的要放棄這群渴慕真理的苗民，請求他們不要前來？柏格理也祈求上帝, 自己應該怎麼做。神不斷地感召柏格理不能放棄苗族人，他此心已決。1905 年 3 月 7 日（陰曆正月 16），柏格理和幾個漢族同工離開昭通，走進烏蒙山深處，他們的目的，盼望在烏蒙山深處找到一小塊地皮，為苗家人建立教堂。

經過多方實地考察，柏格理與當地土目安榮之達成協議，最後安同意送給柏格理一塊作為建立教堂和學校的土地，位址最後選定石門坎。這段經歷，傳說還有一個非常美妙傳奇的故事，至今還成為當地苗族人佳話。辦教堂和學校需要土地，柏格理手裡並沒有買地的錢，當時安榮之出於自己私利的考慮，同意在當地建立教堂和學校。當安榮之問要多大地方時，柏格理神秘而又認真的回答說，僅要一張牛

皮大的一塊地。財大氣粗的安榮生覺得這洋人有意思，傳教辦學只要牛皮大一塊地，當即表示送柏格理牛皮大的一塊地。有備而來的柏格理為了這牛皮大小的地還和安榮之簽訂了一份協議。於是柏格理將牛皮進行處理，把牛皮分成絲，牛毛結成線，用繩子丈量皮絲和毛線的長度，再用繩子圍圈了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約 2.6 平方英畝左右）。因為已經答應了，說出去的話不好收回，安榮之只好就範。柏格理從小就天資聰穎，數學才華出眾，他以這種方式取得土地，完全符合他才華的可能。

1905 年 5 月 14 日，石門坎教堂開始了第一次的主日敬拜。 從此開始了柏格理另一段宣教使命的生命歷程，這是一段淒美、盪氣迴腸的生命見證，也是他生命最豐盛最輝煌的時期。上帝透過柏格理，使福音之光在這個時候必然與苗族族群發生關係。

2.4. 文獻探討和評估

在此筆者先做些文獻性的交代。從石門坎回來，筆者著手查找相關第一手資料，或是學者們對石門坎的學術評論及專題調查報告等，查找的結果:在中國，這方面的文獻，不是資料、資料很有限，就是從客觀歷史評論方面的書籍、學術著文很少，甚至絕少找到從神學方面去研究的著書。雖然從學者張坦、沈紅、王大衛等

的書籍中有史料的記載，但也不詳盡和完整。有的欲言又止，有的乾脆回避了，有的甚至可以明顯看出受到主旋律格調影響。說良心話，以他們的身份和他們所處的大環境，他們已經為石門坎做了他們該做的，筆者非常理解。但是，筆者想知道更多的真相，想挖掘更多有關石門坎有價值的東西。

2.4.1. 研究文獻的來源

非常慶倖的是，柏格理在中國宣教時期，留下了幾部紀實性著作。將他和他的同行者們在中國的經歷，用文字如實的記錄了下來：

由柏格理寫的《中國歷險記》，1908 年在倫敦出版。以記敘文的方式記錄了他和郜幕廉，從離開英國到達中國雲南的各種經歷。講述了他們從 1887 年 1 月 27 日，從提爾堡搭乘舟山號輪船啟程，在上海頓陸，又經長江南下到重慶，然後走陸路。路途跋涉了整整一年，於 1888 年 2 月到達昭通。其中記錄了他們所遇到的各種艱難和生命危險，終於到達被差派之地。書中讓人看到一個充滿著樂觀主義的情懷、勇敢、坦誠的人格。

1915 年，柏格理又完成了另一部書《在未知的中國》的寫作，1922 年在倫敦出版。也是在完成這部書寫作的同年 9 月，他為福音事工心身憔悴，為救孩子染上傷

寒，于石門坎以身殉職。在這部書中，柏格理詳細的記錄了近代西南彝、漢、苗等民族歷史、經濟、文化、習俗等情況，以及他在雲南和石門坎整個福音事工的經歷，他和他整個宣教團隊在石門坎因福音工作的而產生出的果效。

1909 年，由柏格理撰書，邰幕廉寫結語的《苗族紀實》，於 1919 年也在英國倫敦出版。在這部著作中，記述了從 1904——1908 年間，近代苗族文化"復興的聖地"石門坎教會建立和發展的過程以及當地民族、社會、教育、文化等歷史背景狀況。記錄了柏格理和他的同工們和苗族信徒們所做的工作。作為宣教士，柏格理在書中處處體現出信仰的理念；所傳達出的"上帝的愛"始終是他書中的主題。他鮮明光彩的個性也在書中表現出一種強烈的感染力，使讀者產生深刻的影響和感召力。

另外還有一部由甘鐸理編輯的《柏格理日記》，也於1954年在倫敦得以出版面世。是柏格理從到達雲南至石門坎 27 年事奉日記中精選出來的一部分。這份第一手資料，可以說是 19 世紀、20 世紀初中國西南苗疆的縮影。在甘鐸理的前言裡，他寫道："如果把柏格理本人的日記排除在外，這些記敘無論如何也不是完美的。"

[18]這些日記的記載更能進一步地證實這段歷史的真實，成為一本非常珍貴的歷史性文獻留給後人。

除了柏格理的著書，曾在石門坎與柏格理一起事奉過、以及後來在石門坎事奉的王樹德、甘鐸理、張紹喬、張繼喬（張道惠兩個兒子），也先後寫了《石門坎與花苗》（1937 年倫敦出版）、《在雲的那一邊——柏格理傳記》（1948 年倫敦出版）、《張道惠夫婦在石門坎》（2000 年撰寫）等書和文章。

以上一套 7 卷書，由重慶三峽學院民族學系教授、系主任東人達和女兒東旻翻譯並注釋。筆者雖然沒有查找到他們的宗教背景，但還是非常感謝這對父女，使筆者得到了最有參考價值的歷史真實文獻，它填補了筆者史料方面的一大空白。這也是國內翻譯出版的第一部有分量的西方傳教士的紀實性著作。從這 7 本書中，筆者觀察到，所有書的作者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曾經長期在滇、黔、川毗鄰的廣大地域內從事少數民族宣教、教育及改革社會工作，是那個歷史中的實踐者，也是歷史事件的記錄者。書中的作者都是基督徒，是有神論者，自然在書中處處是帶著基督教的思想和語言。比如柏格理 1913 年 9 月 1 日的日記：“難道從來就是這樣嗎？

[18]格理 柏 et al., 在未知的中國, trans. 人達 東 and 旻 東 (昆明, 中國: 雲南民族出版社, 2002), 604.

難道這個世界上就沒有這些人的希望了嗎？如果我宣講在天國裡沒有財主的位置，群眾可能嘲笑我們像是在另一個世界裡講話，而他們在人世間到底有什麼機遇呢？”所以在筆者論文中多處據證引用到這些書中的內容和事件等的判定。

2.4.2. 研究文獻的實證

國內對於石門坎研究方面的書籍，筆者也盡力尋找，為的是能夠從中國自己的學者們和信徒裡的研究文獻中實證其中的歷史和真理，進一步支援上面 7 本書史料，使之成為彼此有關聯的鎖定證據。筆者並不看好在一個有制度限制的政權中可以找到更多公開信仰方面的學術評論文獻。 但還是可以看了一些有關石門坎的文章和報導，也看了一些學者發表的學術評論和書籍。只是大多數書籍內容僅從歷史和文化的影響、人本主義等方面作出他們的評論，多注重在人性精神層面的宣揚。筆者也看到有幾位學者及投入到石門坎公益項目負責人，在他們的著作和文章中提到基督教對石門坎的影響。而從神學上來探討石門坎歷史興衰的文章或學術評論、書籍等卻少之又少。然而還是可以從一些文化學者、歷史學者、民族學家等的研究著作和文章中找到歷史的證據。

感謝神，這中間還是找到幾部由基督徒學者、作家所撰寫的書籍。學者、作家以阿信筆名撰寫的紀實性文學，大象出版社出版的《用生命愛中國》、由貴州省原宗教局官員、現為自由撰稿人的張坦所著的，貴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窄門前的石門坎》、由貴州日報文藝部主任記者楊大德，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長篇小說《中國石門坎》等。

這些著作都是作者經過幾年或十多年實地考察、查找、收集國內外大量有關歷史資料，尋訪了中國和英國的許多當事人及後代，用心寫成的描寫柏格理及石門坎歷史的書籍。書中用感人肺腑的事蹟作了一個客觀、公正、詳實的記錄。通過人物或者事例揭示了人物命運和西方傳教活動在華建立教會發展、復興和失敗的深層原因，其中包含了對宗教、革命和理想主義等問題的思考。作者都從不同角度介紹了石門坎事蹟的源起，並不是今天人們想的那麼簡單。他們都在書中表達了，柏格理背後真正力量的源泉是來自於上帝的計畫，是通過柏格理這些作為上帝的僕人們把福音帶到中國，帶到石門坎，並復興了石門坎教會。

每一部書裡，都具有虔誠信仰和獻身精神的柏格理和後來在石門坎繼續宣教工作的宣教士們一個個生動、形象、豐滿的身影。由遠而近，又平凡而深刻地赫然屹立在筆者心中。這著實為筆者寫成論文增加了信心，同時也成為筆者論文重要的

參考資料之一。比如在楊大德的《中國石門坎》一書裡介紹了基督教對於苗族倫理文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破除迷信和不酗酒等生活習性的改變上。在宣教策略上，柏格理是如何運用"文化處境化"很好地將福音與當地的傳統文化習俗結合，從而改變苗族人民離開了幾千年的"從巫尚鬼"的傳統。比如：

> 柏格理在向苗族人宣教教義，講到摩西十誡時，寨老說'苗民從古一來就有十誡，每年新春時節，都要擇日舉行一個苗族的聚會。在會上宣佈規約：不准強姦婦女、不准偷盜他人財物、不准損害農作物、保護山林……，這些規約群眾都很擁護、嚴格執行。'他摸著翳白的山羊鬍子，肯定說，'對頭的！聖經中說的好多都合我們苗家的生活習俗。'老人激動得哽咽起來，渾濁的淚水溢出眼角，柏牧師說：'《聖經》是我們的祖先書，戰亂中散失到了海外，今天上帝派他又給我們送了回來。我看這話是真的。'楊雅各舞著手說，'合的，上帝是人類的祖先神，也是我們苗家的祖先神！'[19]

但柏格理去世後到解放前（1915—1949），留下的歷史文獻還是有限。這方面筆者著力查考了部分研究性的書籍。其中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歷史學家東人達撰寫的《滇黔川基督教傳播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民族歷史學家秦和平撰寫的《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區的傳播史》、雲南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錢寧主編的《基督教少數民族社會文化變遷》、萬卷出版公司出版的，教育學家，華中科技大學教科院副院長沈紅撰寫的《石門坎文化百年興衰》等十多部著作。都有從不同

---

[19]大德 楊, 中國石門坎 (北京, 中國: 人民日報出版社, 2005), under "第八章," accessed July 4, 2017, http://www.shimenkan.org/book/c/.

角度的、不同研究學科對石門坎一百多年前歷史有一個基本的認可。在他們的著書中，都有提到基督教在石門坎所引發出的深刻變革，基督教在石門坎苗族地區開“文化之先河”的不爭事實。他們也是想在本學科中找到有研究的價值。這些書籍雖然不是直接研究基督教神學的，但是其中歷史方面的實證，當時社會制度的狀況，及文化、經濟、文化等背景都是筆者可以參考的文獻資料。從這些文獻中找到與前面柏格理等宣教士們所著 7 卷書有關聯和歷史相合的地方加以考證。比如在《滇、黔、川邊基督教傳播研究》中這樣記載：“面對柏格理離開人世，苗族信徒情緒落潮，王樹德、張道惠、布萊恩、美論義（邁歐內）等傳教士，在堅定執著的苗族、彝族、漢族佈道員的幫助下，繼續堅持開展石門坎教區的各項活動。有步驟地在各地新建教堂與學校，在 1918 年以後的 2 次大災荒中主辦賑災活動，在石門坎擴建校舍、麻風病院、平民醫院、孤兒院、推廣部等，繼續選派優秀的畢業生到成都、武昌、南京的大學深造。繼續印刷發行苗文《聖經》等等。”　這些資料一是筆者對柏格理去世後到解放前歷史的重要參考文獻，同時也是對上面介紹的宣教士們著書中歷史事件、內容的加固和夯實。

2.4.3. 研究文獻的神學訴求

在神學評論方面，參考的書籍和文獻很多。如何從眾多的書籍中取捨？並與論文研究的神學相關？筆者以為，針對本論文是歷史回顧性的，所以在查找文獻和使用書籍中，主要與教會歷史、教會論、宣教學等有關的參考書籍和專業神學辭典等。並且注意區分與改革宗神學立場相關神學家和學者論著。其中參考的文獻有：由宣道出版社出版的，基督教神學家，作家章力生所著的《教會論》、基督使者協會出版的，由哲學博士、牧師庄祖鯤撰寫的《宣教與文化》、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出版的，由神學家 herman bavinck(赫爾曼.巴文克)所著的《基督教神學》、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出版的，由神學家 david j. bosch(大衛.博世)所著的《更新變化的宣教》、校園書房出版社出版的，由祁伯爾撰寫的《歷史的軌跡》及其他神學專著和文獻。宣教神學是透過系統神學及聖經神學來瞭解聖經，但是宣教神學乃是要在聖經真理與宣教士所事奉的工廠的社會、文化及歷史的背景之間，搭起一座橋樑。因為宣教的工作，是要將福音傳遞給人並應用在現代人身上。因此筆者盡力從神學中的教會歷史、宣教學 歷史等應用方面參考有幫助的書籍。這些書籍，神學的立場上，內容大多照改革宗神學的觀念，就是基督籍著聖靈的運行，把祂自己和世人聯合起來，賦予世人真實、純正的信仰，從而組成教會，就是祂的身體。強調耶穌

基督救贖的恩典和功效。宣教學方面這些書籍在幫助筆者在聯繫石門坎的宣教歷史，宣教神學、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等方面都有支持論文的立場和觀點。比如在《宣教與文化》一書中論到文化與福音的關係時：

> 首先‘福音’應與‘文化’作明確的區分，否則容易陷入‘神在文化之內’模式的錯誤。其次，福音無可避免地必須以文化的形式來表達。文化是傳福音的工具。有時候福音需要從一個文化傳譯到另一個文化，而這種傳譯的過程稱為‘本土化’或‘處境化’。最後，福音呼籲所有的文化都需要被更新。因為人罪性的緣故，所有文化都免不了在結構和運作上摻雜了邪惡的成份。例如奴隸制度、種族隔離、經濟壓迫和戰爭等。因此，所有的基督徒都應該肯定各個文化中的優良成份，但也應該明確指出其中的缺點，並設法改正，使文化得以被更新。”[20]

在筆者的論文中也涉及到文化與福音的關係，本書的立場作為筆者在討論中支持的觀點。

總之，參考的書籍和資料都是用來支援論文在論證過程中的論點依據。雖然文獻方面還是不夠充足，筆者也只能盡力為之。從僅有的文獻中，還是能夠得到可靠的真實史料，將整個事件呈現清晰。通過綜合分析和梳理、論述，最終獲得結論。

2.5. 神學評判

上帝選擇救贖，而不是遺棄或者毀滅祂的創造。並且祂選擇在歷史當中，從呼召亞伯拉罕開始，直到基督再臨，透過這個期間許多人物與事件的運作進行，來

---

[20]祖鯤 莊, 宣教與文化 (Paradise, PA: 基督使者協會, 2004), 19-20.

完成祂的救贖計畫。[21]從聖經來看，你會看到整本聖經的真理彰顯都是通過所發生的事和人物，在一次一次人的選擇過程中，對事物的態度和行為中被實現的，這與創造、人的罪性、救贖息息相關。苗族人的歷史和進程，石門坎福音百年來的歷史變遷，當然也就是上帝救贖歷史的一部分。不容置疑，石門坎是組成整個中國教會歷史的重要部分，乃至在整個世界教會歷史中也必然有其位置。我們從所得知關於石門坎教會的文獻和記載、參考書籍等，因為歷史的原因，還有一些客觀的原因，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在進行神學方面定義和思想的分析和探討中，只能根據現有的所得到的資料進行評估。因此不免不足和偏頗。

雖然從上世紀 90 年代初，中國逐步開放，一些外國福音機構、基督徒和那些曾在這塊土地奉獻宣教先輩的後人們不斷造訪，石門坎才被越來越多的人發現、瞭解和認識。從 90 年代中期，國內已經有一群人自發的有感于石門坎這段歷史的企業家和學者等，為石門坎在公益和慈善方面做了大量的宣傳和投資，特別是為著改變石門坎現實狀態，至今他們繼續或長期在投入此項公益。同時也有世界各地的一

[21] Christopher J. H. Wright, 上帝子民的宣教使命, trans. 元尉 鄧 and 遇 祈 (臺北, 中華民國: 橄欖出版有限公司, 2011), 66.

些福音機構和基督徒個人，因著基督信仰的感動，身體力行，實現基督"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的教導，默默無聞的奉獻。然而，石門坎那段可歌可泣真實事蹟，還是因著諸多國家政治和宗教制度的限制，使得對於那段歷史至今國人鮮有人知。說來笑話，今天知道石門坎的，西方外國人比國人更多。

近來國內也看到一些關於石門坎 100 多年文化、教育變遷的一些的學術上的研究論文和探討文章，但實在太少。而且大多的討論是從倫理道德、教育、文化等方面去梳理宗源。這也難怪，因為這些學者或公益人士大多沒有基督教的背景，他們也只能這樣做。然而我發現也有個別的基督徒學者，比如說張坦、沈紅、王大衛等，從他們的書籍和文章中可以明顯看到他們基督徒立場和觀點。但每當涉及與信仰有關立場的時候，探討往往就止步了。我想這也是他們不得已而為之的苦衷，不得不避開政權制度的無奈，使得他們的一些想法和觀點可以公開發表於世，為此應該感謝他們所做的。也就理解為什麼至今很難看到公開展開和明確地闡述、挖掘石門坎上帝救贖歷史神學方面的文章和學術論文等的討論。

在本章上幾節中，我們從歷史的角度回顧並再現石門坎歷史背景的發展過程，其走向的來龍去脈十分清晰。但是石門坎的歷史變遷，一定是神的介入和作為。正因為如此，無論從那個層面、什麼方向和論題去論證石門坎現象，都不可能找到根

本影響的終極原因。任何的探討也只能局限於某個局部和片面的一個側面。所以必須從神學上來討論，才能完整地揭示石門坎百年的基督教、及文化教育的歷史變遷，因為這涉及到上帝整個的救贖歷史。從基督教改革宗預定論觀點：

> 我們知道神的論旨永不改變，至高無上，彰顯神的聖潔與智能。這論旨不單管轄自然界，也掌管人間從創造到審判的每一件事；不但如此，這論旨還上達天上的聖徒與天使、下至地獄裡的惡人與魔鬼，它們一切的活動都在這與論旨之下、它統轄的範圍包括亙古到永遠的一切受造物，任何已經發生或尚未發生的事，無論是它們的原因、條件、彼此的輪替和關係，都在這論旨之中。22

這一神學教義看出人類的墮落與救贖的計畫，必須在預定有神論的前提下來探討人類的演進。“我們在他裡面得了基業，這原是那位隨己意行作萬事，照著他旨意所預定的。”（弗 1：11）

柏格理精神的核心是信仰改變社會，信仰改變人的價值觀。而教育和文化是在認知的真理過程中具體的方法和途徑。基督教的觀點：人人皆罪人，罪性的問題不解決，文化和教育終究也不能保證引人向善。今天我們聽到、看到的、社會所宣傳的，大多強調文化和教育是開啟石門坎文明的金鑰匙。不可否認，文化和教育的推行、實施是帶給石門坎社會的改變，苗民的覺醒，但這些並不代表他們就認識了

---

[22] Loraine Boettner, 基督教預定論, trans. 中輝 趙 (臺北, 中華民國: 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 2000), 18.

真理，而只是懂得一些知識，提升了生活、社會活動能力等而已。前面講到苗族人與內地會英國傳教士党居仁牧師初見面認識的背景，到他們到昭通找到伯格理後所發生的變化，從宣教神學來看，是一個因果關係的必然結果。

從舊約到新約，很清楚看到神的救贖計畫對象一直都是"普世性"的，並非僅僅只針對以色列這個特定民族或國家。在基督教裡常說這樣一句話："人的盡頭，就是神的開頭。"苗族人長期受到外族的壓迫，生活在深重災難之中，他們忍受著貧窮和屈辱，幾千年不改變而變得麻木。他們渴望得以喘息，而苦於找不到途徑。遇到党居仁、伯格理，他們感受到了從未有過的被尊重，嘗到有生來被人愛的滋味。這種心靈上的巨大衝擊必然帶來思想上的轉換，這是為什麼？這正是柏格理他們來到中國"宣教"的原因。基督無條件的愛、和接納，是基督教最核心的誡命，神透過宣教士親自踐行在這群人生命中。同時柏格理所屬循道公會他們的主張及宣教使命，他們神學核心是救贖論，強調基督普遍的愛，秉性"因信稱義"的原則。在宣教的策略上，"聯結觀"的思想是實踐基督信仰的主要依據。正是這樣的神學思想和宣教策略，讓我們處處可以看到一個按照循道公會奉行的宣教原則所行的僕人形象，同時更看到一個"行動者"走在神的宣教道路上。從柏格理生命成長經歷中，一個順服聖靈帶領、並全心投入的"宣教人"非常立體地展現在我們眼前。所以我們可以說，改

變人心的首先是神的救贖和祂的愛。而在具體實踐"宣教"過程中，又是通過文化和教育體現出來的。

文字，是上帝最奇妙的創造之一。它的形成也是在不斷總結經驗教訓中漸進發展而成的。人類認識神、文明和進步直接跟文字有觀。它突破時間的限制，人可以通過文字認識創造、認識造物主，瞭解歷史、記錄歷史，保留歷史中我們可用的精髓。後人可以通過文字瞭解前人已取得之成就。人類的思想、文化不會失傳中斷。文字使文明得以延續，發揚光大，文化得以累積；也可以突破空間的限制，不同地域的人可通過文字系統，傳譯資訊，得以交流和進步。如此一來，文字使歷史和現實中的人和事發生關聯，脫離了口傳身授的階段，得以記錄歷史，步入文明、進入現代。文字在歷史中發展演進成為系統的語言，使人與禽獸分離。文明的進步從文字開始，文化宣教是當時外國人向中國傳教的主要方式之一。

在《用生命愛中國》一書中有一段這樣的記載：

> 當苗族人的野豬被當地人搶走，第一次去找到當時在貴州安順的英國傳教士党居仁，党居仁讓官府來判案，並當場有理有據，用智能來證實野豬確為苗族人所獵。這件事讓苗族人最直接的反映，第一次看到是宣教策略中知識文化運用的重要性，對於苗族人來說，這個時候還不可能知道什麼神的救贖論。只知道原來貧困和愚昧的原因是由於缺乏知識所致；23

---

[23]信 阿, 用生命愛中國 (鄭州, 中國: 大象出版社, 2009), 61-62.

之後，苗民拿著党居仁的信找到柏格理，唯一要求柏格理的，就是教會他們識字讀書。從柏格理接受這些苗族人，並教他們識字的過程中，不斷有人來討教，人數也不斷增加。在《在未知的中國—柏格理日記》這樣記載：

> 有幾位苗族人，確切說是四個人，從鄉下來到這裡，一直待到禮拜六早上……第一件事就是：他們非常迫切地想要讀書。他們隨身攜帶著小袋食物，主要是燕麥炒麵。我讓他們歇在舊教室裡。我真誠地希望，就此能夠揭示出一個新的天地。願上帝把他們都拯救。我們這裡的人為這件事情而震動了。[24]

所以，在柏格理的宣教策略中，同樣是通過知識和文化的滲透，使得福音的工作向前推進，就如決了堤的洪水一般，從此打開了苗族人思想的閘門，他們看到並開始懂得了還有一個不一樣的世界。新的觀念必然鑿開幾千年來的傳統和舊習，他們開始明白他們的命運在神的介入下，通過文化和教育等方式是可以改變的。

中國教會歷史上，近代自從第一位新教傳教士馬禮遜 1807 年進入中國後，不斷有外國差會的傳教士被差遣來到中國。因為政局的考慮，當時他們進來的身份多以援華開公司、建醫院、辨教育等方式進行傳教。我們知道柏格理就是一個非常醫術高超的醫生， 在昭通的 17 年裡，他很多時候一邊為人醫病，一邊播種福音好消息。

---

[24]格理 柏 et al., 在未知的中國, trans. 人達 東 and 旻 東 (昆明, 中國: 雲南民族出版社, 2002), 687.

從神學的觀點分析，無論是馬禮遜、戴德生、党居仁還是柏格理，作為宣教士，他們十分清楚"宣教"的使命，然而在當時中國展開傳教事工，也必須有掩護其傳教的另外一個職業。所以在柏格理的《在未知的中國 苗族紀實》一書中，這樣記載說：

> 我們所有人都熱情接待來訪者，送給他們書並開始認真的教他們……以便在教的過程中，他們聽到關於"愛穌"（苗族稱的耶穌）。我們還很快發現，要教授這些新來者必須從基本的起點開始。我們不知道如何將知識傳給他們。他們對外界瞭解的如此之少，有時候竟然將外國傳教士當成上帝。他們既不知道基督十字架受難像，也不知道"歐幾裡德幾何學"。我們便開始盡可能簡單地向他們講述《聖經》故事。在學習文化、識字的同時，將上帝如何愛人的道理介紹給他們。[25]

以上分析，可以知道，貧困不是結果，而是一個現象，造成貧困現象的真正原因是信仰意識和觀念落後，由此必然導致行為的落後。一個人，一個地區、乃至一個民族，如果沒有一個正確的信仰，正確的意識，落後是不可避免的。柏格理得著苗族人的心，最重要的並不是通過輸入財富和資源來改造他們，而是通過信仰的理念，通過文化層面的改造來改變他們的價值觀、人生觀。我們也不否認物質基礎的作用，但出發點是信仰的傳輸。"教育"應該這樣解釋："教" 是知識與技能的傳授，這很必要。沒有知識人就愚昧；"育"是育人，是品德、是信仰。但是沒有正確的信

[25]格理 柏 et al., 在未知的中國, trans. 人達 東 and 旻 東 (昆明, 中國: 雲南民族出版社, 2002), 95-96.

仰和品德，會喪失文明的基礎，就失去了教育的意義。從柏格理他們所做的，動因為著福音大使命，並非金錢、物質等因素的參雜，而是將信仰作為根基，有的是上帝護理、愛世人的體現。這其中的源頭必定由神而發。貧困的根本原因並非文化、教育起主導，乃是信仰的力量。無論是党居仁還是柏格理，我們都可以看到一個宣教策略上的運用。在接下來的章節，探討石門坎教會的建立、發展，興衰等歷史中，我們還會看到石門坎教會是否植根在信仰上。他們在宣教的策略中，如何通過文化、教育諸多方面具體的運用在其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及意義。

第三章

石門坎教會的歷史

3.1. 石門坎教會的初建

今天的石門坎正在被國內外更多人知道。然而石門坎的變遷歷史，在中國的大多學術界和探討所得出的結論，大都已經被定性為文化滲透的直接影響，使得文明、進步得以實現。這樣的說法和解釋容易被國人接受，這種論點當然很大程度受到中國現行制度和國情影響。這種解釋本就較為主觀和片面。本著歷史的還原和尊重歷史的態度，學術的觀點和考證的評說，都應該對後人負責。這也是神學上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是關乎神本還是人本的神學問題。

宣道是一個跨文化的傳播和溝通，這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00 多年前中國還處在一個既落後又排斥一切外來勢力的形勢下，柏格理他們的宣道事工更是難上加難。從神學的宣道觀來說，宣教士們來到中國的目的，就是按照所屬差會的宣道異象和策略，將福音好消息向人們傳播。我們不論是從柏格理的日記及其它宣教士的書和日記中，還是現今地方檔案館藏文獻，以及近幾十年來的學術論文和文章記錄的真實歷史中，石門坎的歷史就確立了它在神學上的主導地位。 從人性的觀點

看，自古以來，人類發展歷史被推動的目的，總是為著自身利益的改善，擴張勢力，以強勝弱獲取所得；而當人承認罪，站在"神本觀"來認識和看待世界和事物，我們眼前的世界不再局限和狹小，一切的存在都賦予了美好並意義重大。

從柏格理進入石門坎的那天開始，近代教會歷史中，"石門坎教會"這個名字就必然不可磨滅地記載在教會歷史的史冊上。宣道的使命和運作一直是柏格理和他後面團隊接力的十多位宣教士的重心工作。為著這福音的中心主題一直延續下去，使其石門坎教會工作一直在不斷擴大、增長、穩步向前。直到一九五零年後因政府的幹預，宣教士們整個從中國被迫撤出為止。

溯本清源，我們必須還歷史本來面貌，從所發生的真實事件中，梳理出其中的因果，給歷史以公正，給信仰以確據。從《在未知的中國》中，記錄了柏格理與同工從昭通到石門坎建立教會的初衷：他寫道：

> 那麼我們該如何對待前來的群眾呢？我們可以告訴他們不要前去。但那是一場不停息的復興運動。即使我們能夠阻止它，我們也不想那樣做。然而有一件事情，我們能夠做，並且也做了。我們把面臨的困難，提交給創造出復興運動的主，請求他予以解決。當然，他應承了。[1]

---

[1]格理 柏 et al., 在未知的中國, trans. 人達 東 and 旻 東 (昆明, 中國: 雲南民族出版社, 2002), 116.

對於"石門坎現象"，是上帝福音工作為源起，還是現在普遍學者和研究者們所說"文化滲透" 為起點，我們從柏格理及其後宣教士們在那裡從籌建教會開始，到教會的成長發展過程的回顧，就能找到和還原事實的真相。

其實，在 1905 年初，柏格理第一次踏入石門坎前，與他一起同被英國循道公會派到雲南昭通的傳教士、同學郃幕廉等人，已經在那片土地整整傳教 17 年，儘管他們為此付出代價不輕，然福音事工還是果效甚微。他們只能在艱難的尋求和苦苦的等待中渡過。是繼續留下來，還是忍耐和等待上帝福音之門打開的時刻。這時候差會同工內部包括郃幕廉在內的人提議離開中國，回國另做打算。柏格理也曾猶豫動搖過。這種無果實的勞碌，不知還要等待多久的日子煎熬。這確實對人是極大的信心挑戰。在這過程中，柏格理仍然選擇仰望上帝的帶領和心意。最後上帝的感動讓他決定留下來。很快他就遇到了大花苗族的四個苗民（詳情參閱第二章第一節）。此後開啟了他一生奉獻上帝、服務苗族人、改變人心、改變當地社會、環境面貌的輝煌人生。

隨著每天來到昭通柏格理住所的大花苗民不斷增加，最多時每天達到一百多人。上帝的感召和苗民渴望改變命運的願望，讓柏格理感動並信心滿滿，他心裡知道上帝已經為他指明了道路。大花苗族人民認識上帝，接受福音後的生命改變，讓

他們如饑似渴地不斷湧入昭通柏格理家中。從最先到的四個苗民開始，短短幾個月中，已經有近四千多名的苗族人來到昭通柏格理駐地訪問，使得柏格理也不得不思想接下來的具體工作當如何進行，上帝的帶領是如何？於是他靜下心來，恒切地禱告上帝，求神給予他更明確的旨意。在這過程中，神清楚的告訴他：苗族是祂深愛的兒女，跟你一樣是我選召的，你要去牧養他們。緊接著，柏格理決定親自深入苗區，考察調研，為建立苗區第一個教會掌握第一手資料。

> 考慮到進到苗區的各種困難和生命危險，一起的同工並不贊成柏格理進入苗區，但是上帝的感動讓他毅然決然作了決斷，進到大花苗人腹地為苗族人建立教會。他們一行五人，漢族基督徒王先生、教會學校的鐘先生，還有兩位幫工，上路了。[2]

我們可從《柏格理日記》中，看到他對這段經歷的詳細的記錄，從 1904 年 11 月到 1905 年的 3 月的幾個月中，他們經過實地與當地苗民和土目們的親身接觸，全面的考察，同時經歷了太多的生死考險。他們與當地苗民同甘共苦，體察民情。深入虎穴，靈巧應對，讓柏格理所見所聞，無不為之動容和感慨。這裡實在太需要神的光照，因為實在讓柏格理他們看到的景象是：“絕望已成了這一種族的特性，他們把貧窮與悲痛、疾病與死亡視為自己無法避免的世襲命運。”當福音臨到他們

[2]格理 柏 et al., 在未知的中國, trans. 人達 東 and 旻 東 (昆明, 中國: 雲南民族出版社, 2002), 105.

的時候，讓柏格理在考察中也親眼見證到苗民為了信仰而不惜被當地的土目嚴刑逼迫，付上生命的代價也在所不惜的心志。

再次返回昭通，上帝的呼召和感動變成了行動。1905 年 3 月，柏格理安排並交代了昭通教會的工作，與幾個漢族同工王玉潔、傅正中、李司提反、劉申五、鐘煥然等昭通的漢族信徒，毅然踏上了烏蒙大山的深處。這次去的目的，非常明確，要在苗區建立大花苗民自己的第一個教會：在尋找建堂地址過程中，就如前章提到，經過多方努力，在與當地土目安榮之多次交涉中，最終雙方達成了協定，並將位址選定在石門坎。這讓柏格理及苗區的苗民們無不歡欣鼓舞。

> 因為這將變成苗族人蜂擁而至的通往盼望的新世界的“入口”，柏格理立刻抓住了這個當地的名稱，將它生硬地譯成“Stone Gateway”（石頭門）；從此，“Stone Gateway”一詞誕生了。這個名稱代表了中國一個民族的人民新生活；對柏格理來說，則代表著福音在這裡原來被關閉的大門被突破打開。他還感受到，當他跨過苗族這道門坎的時候，也正在進入一個嶄新而奇妙的世界，也的確是一道通向一種新境界的門坎。3

土地有了，教堂就可以破土動工了。但這時候，另一個更大的困難出現了，建堂的資金還不知道在那裡。當時柏格理所在的差會社團並沒有在苗區的工作經費。但是柏格理知道既然是上帝帶領和感動讓他來到石門坎創建教會，上帝必然會預備。柏格理如實地將情況告訴了苗族的信徒們，得知這一情況，當即苗族信徒們表示自

---

[3]格理 柏 et al., 在未知的中國, trans. 人達 東 and 旻 東 (昆明, 中國: 雲南民族出版社, 2002), 549.

籌金費，並動員每個家庭的每個成員捐出一百文錢。照當時的情形，苗民的生活狀況非常貧窮，有很多人家全部家當連五先令都不足。衣不裹身，食不飽腹，悲慘貧寒。然而最後就是從這些窮苦苗民中間，收集到的款項數額竟然達到了一百萬文錢，這些錢大約合當時 10 兩白銀，或者今天的人民幣 2 萬元。何等不可思議，從這件事上可以清楚看到，苗族人是如此期盼上帝的福音在這塊處女地上生根開花。這正是上帝愛人在苗民身上回應上帝的熱切行動。[4]在修建教堂的整個過程中，苗族信徒們不但奉獻出自己所有，而且也身體力行，親自投入到教堂每項建設的工作中，一木一石、一磚一瓦都留下了他們辛勤創造的汗水。保羅在林後 8:2 說：“就是他們在患難中受大試煉的時候，仍有滿足的快樂；在極窮之間，還格外顯出他們樂捐的厚恩。”

1905 年 5 月 14 日，柏格理在他的日記中這樣寫到：

---

[4]格理 柏 et al., 在未知的中國, trans. 人達 東 and 旻 東 (昆明, 中國: 雲南民族出版社, 2002), 118–119.

“在一所稻草頂的房屋裡，我們舉行了石門坎的第一次禮拜式。我教他們《十誡》。第二次禮拜有 150 位男子和 60 名婦女及姑娘參加。”[5]

石門坎的大花苗信徒在這座尚未完工的教堂有了第一次的禮拜。也從這一天起石門坎教會開始了它濃墨重彩，且驚天動地的輝煌歷史進程。

3.2. 為石門坎教會的建立和發展，帶出當地社會和環境天翻地覆的巨變

耶穌在新約的開始，馬太福音 16:18 中，首先提到祂要在世上建立教會："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柏格理從被呼召到石門坎第一個教會的建立，這段經歷中，讓我們看到一個合神心意的生命在行動。每一步的邁出都不是單憑個人的感動行事。尋求、禱告、印證、計畫、安排和充分的準備，石門坎教會在柏格理先行者及整個宣道團隊事奉期間，使得福音工作，通過他們的手，在石門坎這塊荒遠窮山、不毛之地，猶如破竹一般變換了模樣，成為神工作在地上美好的見證。正因為有上帝的帶領和參與，聖經中神的應許必然成就。"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 1:8）

[5]格理 柏 et al., 在未知的中國, trans. 人達 東 and 旻 東 (昆明, 中國: 雲南民族出版社, 2002), 707.

回顧柏格理和他們團隊接下來的工作，你會看到石門坎教會的發展和興盛。我們知道柏格理屬英國循道公會差會，他們的守則極度重視信仰的統一性，普世的大愛，注重因信稱義，更強調信徒聖潔生活。柏格理心裡非常明白他在石門坎上帝託付的使命，當一場搶救靈魂的爭戰開始時，柏格理已經將生命度之以外。在柏格理獻身石門坎教會事奉的十一年，直到他為了石門坎苗族人獻上生命，他以極大的熱情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力量，為石門坎福音的開江撒播、穩固、興旺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他的感召和犧牲精神影響下，帶出了一支後來繼續傳承和接力的宣導團隊，使得石門坎教會在當時成為了中國西南的“文化聖地”，柏格理功不可抹。

> 石門坎小教堂建立起來之後，柏格理和苗族信徒們接著又蓋了三套共九間房屋，作為傳教士、教師及學生的宿舍，同時也可以接待從遠處趕來做禮拜的兄弟姐妹。石門坎這個從一個只有十幾戶人家的小村落一下子變得熱鬧起來了。苗族人知道柏格理還有一個心願，就是希望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好將留在昭通的妻子艾瑪和兩個兒子孩子接到石門坎一起生活。妻子艾瑪也是他非常得力的同工。苗族村民自告奮勇出錢出力為柏格理在教堂不遠處修建了一所房子，專做柏格理家起居房屋，因修建耗資約五英鎊，柏格理親切稱它為“五磅小屋。[6]

有了固定的聚會場所，整個福音的工作在順利的進行中，每個人都激發出從未有過的熱情和參與。

1905 年 11 月 5 日，星期天，是烏蒙山苗族人民又一個難以忘記的日子，石門坎小教堂全部竣工。

> 這一天，遠鄉八寨的人們一齊湧向石門坎，有的人甚至走了幾天的路程趕來，儘管天氣寒冷，但每個人心裡火熱，笑顏逐開，他們等待著受浸和歡慶的時刻。這天共

[6]信 阿, 用生命愛中國 (鄭州, 中國: 大象出版社, 2009), 90.

> 有2000多人參加，場面宏偉、沸騰，士氣高漲。苗族教會這一天正式成立了；同時中國苗族歷史上第一所學校，“石門坎光華小學”也於同一天正式成立。[7]

它是我國近代最早的男女合校的學校，也是我們少數民族地區最早採取雙語教育的學校。1943 年，光華小學擴建為中學，名稱“西南邊疆威甯石門坎初級中學，這也是中國西南第一所中學” 。[8]

宣道工作在石門坎風生水起，有條不紊地開展，同工中李司提反（李約翰之弟，原名李國鎮，昭通最早的教徒之一）、楊雅各、張約翰擔任翻譯工作。致力於把《聖經》、《詩歌》等翻譯成苗語；傅正中以及一批苗族中選拔出來的佈道員，則到各村寨遊走佈道。鐘煥然組織漢字班教學和準備研究苗文字拼音方法；柏格理的夫人艾瑪則應診治病；柏格理本人，除宣講福音外，主要精力放在巡迴各村，瞭解民情，以便於傳教工作的進一步開展。讓柏格理他們沒有想到、且興奮的是，願意信教的大花苗人仍以幾何數在增長，很多人不辭跋涉一百多公里的路程來參加禮拜，一些遙遠的苗寨整村整寨都自稱為耶穌的“信徒” ，形成了一種典型的“社會互動效應” 。[9]

擺在柏格理面前的問題也出現了，首先語言成為當時交流的最大障礙。因為除了柏格理當時能懂少許苗語外（柏格理之前已經有預備學過一些簡單的苗族對話用語），宣教士連一句苗語也不懂。人們渴慕真理，教者希望能將全備的信仰，核

---

[7]信 阿, 用生命愛中國 (鄭州, 中國: 大象出版社, 2009), 93-94.

[8]紅 沈, 石門坎文化百年興衰 (瀋陽, 中國: 萬卷出版公司, 2006), 126.

[9]坦 張, 窄門前的石門坎 (貴陽, 中國: 貴州大學出版社, 2009), 56.

心真理向信者、聽者陳述得清楚和明白；而聽者同樣盼望從所信的得著真諦。然而，苗族絕大多數人為文盲，他們用祖輩傳下來的苗語與人交流，但卻沒有自己的文字，文字早在千年前遷徙途中丟失。在大山深處，他們從未接受過教育。而此時他們最大的願望就是讀書，他們想通過讀書瞭解外面，認識自我，改變處境。最初柏格理他們只能用漢語進行教導，在聖經的學習上，主要帶領尋訪者們學習《馬可福音》。但隨著越來越多的大花苗人渴慕知識，認識神的願望，語言和文字成了向苗族傳揚福音的巨大障礙，柏格理深知其中的重要所在。因此早在未到達石門坎前他就對創造苗文有了負擔。在他 1904 年 10 月 12 日的日記中，已經有了很明確的記載：

> 這些日子我是一邊教一邊學，每得到一個詞語，就馬上把它記下來。但是他們來來往往相當頻繁，我還沒有找到機會向任何人實踐一下。
>
> 為了給苗族人創作一種文字性的語言，今天，我進行了一次試驗——用我自己的輔音和母音去配他們的發音。到目前為止，進展還算順利，但是我怎樣才能設法區別出不同的聲調呢？[10]

在學者東人達所作的《滇黔川邊基督教傳播研究》一書中，也記錄了柏格理創造苗文的事蹟：

“柏格理同傳道員漢族李司提反、鐘煥然、苗族張約翰、楊雅閣、王道元合作，研究苗語的音位，參考漢字筆劃和苗族衣裙的花紋圖案，創造苗文聲母，用拉丁字母作韻母，一個聲母和一個韻母拼成為一個音節。聲母 21，韻母 12（30 年代增為聲母 30，韻母 31），寫作是以韻母位置的高低表示‘平、上、去、入’四個

[10]格理 柏 et al., 在未知的中國, trans. 人達 東 and 旻 東 (昆明, 中國: 雲南民族出版社, 2002), 697.

聲調……而柏格理發揮了主導和組織的作用，在與苗族尋訪者接觸之後，他很快就產生了創制苗文的念頭，並且付諸行動。

> 老苗文問世後，迅速傳播，其推廣範圍很快就超出了滇黔川邊一帶，其使用族群也超出了苗族。苗文《聖經》的翻譯和出版，還促進了基督教的本土化，加大了苗族在國內外的影響。
>
> 苗文不僅使學校的雙語教學成為可能，還促進了滇黔川邊苗族的大眾化教育。隨著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老苗文又進一步成為苗族進步青年宣傳民主與革命思想的有力工具。[11]

這套文字的創制獲得了極大成功，最後被教會命名為“柏格理苗字（又被稱為柏格理注音字母）”。因為它的文字創造系統，簡單易學，很適合苗族人口味。到 1906 年，柏格理、楊雅閣等人完成了老苗文的創制後，立即著手將《新約聖經》翻譯成苗文並分冊付印，隨後他又翻譯了《新約全書》的其它部分，在短短的幾年時間中，它就被成千上萬的人所掌握。給福音的傳播帶來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和作用。

創制苗文，這是柏格理為苗族人所奉上的最了不起的貢獻之一，僅此就足以使他名冊千史。 中國第一個用雙語教學的學校，“石門坎光華小學”開學了！

“我必將大衛家的鑰匙放在他的肩頭上，他開，無人能關，他關，無人能開。”（賽 22:22）石門坎教會在柏格理的帶領下，繼續創造著一個又一個中國第一。

聖經被翻譯成苗文，對教會的發展和傳播非常重要，因為人們通過文字就可以打開思想的閘門，認識世界，認識真理，認識創造的主。由此開啟了苗族走向教育的現代文明、追求信仰的大道，改變了苗族人千年來舊的、落後的思想觀念，也

---

[11] 人達 東, 滇黔川邊基督教傳播研究 (北京, 中國: 人民出版社, 2004), 229.

使他們擺脫了貧困的生活。所帶來的是整個社會和環境的改變，使得石門坎在最興盛的時候，被“國外基督教人士贊譽為‘海外天國’。”[12]

在石門坎教會的宣道策略中，柏格理很好的將傳播基督教的信仰和開辦教育結合起來。實際上我們看到在石門坎，宣教和教育是同步進行的。在與苗民的接觸中，他深知苗族人的需要。所以在整個對石門坎教會的建立和宣道策略的考慮和計畫上，在方式的運用中，他將重點放在以文化教育上，以此為突破口。使得石門坎的教育水準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普遍提高。

> 1946年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曾做過人口普查，石門坎當時漢族大學生1.9人；苗族大學生10人。整體教育水準遠高於當時的全國平均水準。1928年，石門坎培養出了苗族第一個醫學博士生——吳性純。1944年，又有一位石門坎苗族人張超倫，獲得醫學博士從華西醫學院畢業。並首任貴州省醫療衛生最高行政領導——貴州省人民政府衛生廳廳長。[13]

另還有一位苗族人民的優秀兒子，名叫朱煥章，到 16 歲才讀小學。但他品學兼優，後來由石門坎教會資助就讀于成都華西大學教育科。畢業後回到石門坎開辦了第一所中學，並擔任校長。

循道公會是一個強調“教育傳教”的宗派，而柏格理以自身其貧寒失學的親身經歷，特別熱衷於興學，他認為“教育是打開傳教這把鎖的有效鑰匙”，面對烏蒙山區苗族的文化狀況，他提出了“哪裡有教堂，哪裡就有學校”的著名政策，以教會為依託創辦學校。

---

[12]人達 東, 滇黔川邊基督教傳播研究 (北京, 中國: 人民出版社, 2004), 51.

[13] 豐 劉, 啟偉 葉, and 勝利 高, “海外天國走出來的醫學博士,” http://www.shimenkan.org/, accessed July 5, 2017, http://www.shimenkan.org/book/zcl/.

1905 年，柏格理偕同苗、漢族傳教人員在石門坎修建教堂的同時，也開始修建學校。在修建學校的同時，又讓朱彼得、楊雅各、王道元等信徒遊說各寨，宣傳“讀書識字不會被別族欺侮”。當時，柏格理到苗區去傳教未得到循道公會的承認，辦學校更沒有經費來源。但是，由於柏格理的宣傳，苗族對辦學校表現了極大的熱情，苗民們親自出力並籌資積極地投入修建。石門坎光華小學就是在教會成立時開始招生授課的。學生從 6 歲起招，最大年齡的學生 56 歲。成為第一所苗民小學，它是今天石門民族學校的前身。福音的工作和教育的普及向每一個人開放，石門坎的環境隨著這一切在發生著驚人的變化。“在最盛時，以石門坎為中心的方圓幾百公里的範圍之內，循道公會共建立起了幾十座教堂，小學 120 多所。[14]

> 民國期間，還在華西大學讀書的朱煥章還用苗文編寫了《烏蒙山區平民識字課本》，系統的在這個地區開展掃盲運動。這個平民識字課本涵蓋了所有苗族生活的地區。到了後期的時候，整個烏蒙山區的風氣開始崇尚信仰、崇尚文化、崇尚知識。[15]

例如：

> 在柏格理還沒有進入石門坎時，苗人長期以來在性關係上非常混亂。在每一個苗寨，村頭的地方都有一處公共的場所，苗族人稱之為“花擦房。女孩子十三、四歲以後，就可以進入這個房間，可以跟其它男人發生性關係。這種性關係的混亂，是基督教看為不恥，絕對的不許可。也是導致疾病和貧窮的重要原因之一。柏格理到來之後，按照聖經的教導，說明他們認識並剷除。並規定每一個受洗的基督徒，男性要22歲、女性要20歲才能結婚。每進一個村寨，就讓苗人將花擦房燒掉。讓他們回歸到正確的婚姻觀，講文明、講衛生、注重家庭的關係、注重道德倫理。[16]

---

[14] 人達 東, 滇黔川邊基督教傳播研究 (北京, 中國: 人民出版社, 2004), 222.

[15] 紅 沈, 石門坎文化百年興衰 (瀋陽, 中國: 萬卷出版公司, 2006), 140.

[16] 浩武 陳, “石門坎給今天中國教會和社會帶來什麼啟發？,” September 8, 2015, accessed July 1, 2017, http://www.chinaaid.net/2015/09/blog-post_92.html.

為幫助苗民過上一種現代的文明生活，柏格理還帶領苗民開展各種體育運動。他自己從小就非常酷愛體育運動，他認為一個人的身體健康不僅能帶給人體魄的強健，也可操練人的靈性和意志。1914 年，在中國大多數人還不知道足球為何物時，他就在石門坎組建了一支足球隊，而且訓練有素，有較高的競技水準，成為貴州省“足球的搖籃”。新中國成立組建的第一支國家足球隊，其中就有兩名隊員來自石門坎。除足球外，其它體育項目如體操、游泳、田徑、爬山、賽馬和射箭，包括其它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活動，石門坎都蓬勃而積極地進行著。每年的端午節期間，以石門坎教會出面組織每年一次大型民族運動會，大多運動形式與當地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內容，豐富多彩。

為了教會苗族人講衛生的習慣，更為稱奇的是，柏格理還在石門坎建起了一座室外游泳池，且男女各分池，這也是中國有男女之分的第一座室外游泳池。

柏格理在石門坎教會擴展和傳福音的工作中，同時也非常體恤苗族人的生命和健康。他效法耶穌在宣道事奉過程中，為需要的人醫病趕鬼，使人的心身靈都得到完全的醫治。苗族人長期以來屈服於命運，或迷信求助鬼神驅病。柏格理早年也學習過醫學，在昭通的日子，經常為人治病，而且是一位非常有名望的牙科醫生。特別是他的妻子艾瑪原本就是專業的護理人士被差到中國來的。出於愛人的緣故，他們就在石門坎自己家中，開始了簡易的治療室和藥房，這裡成了他們主要為當地人看病醫病的主要工作場所，於是石門坎，也是中國西南的第一所西醫院由此誕生了。

如此一來，自然來教會的人增多了，而祭鬼請巫的人減少了。苗族中的疾病也隨之減少了。到 1926 年，這所西醫院正式擴建成為“石門坎平民醫院”，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苗族人自己擔任醫護人員、完全面向苗族群眾服務的苗族醫院，極大的方便了苗族群眾。平民醫院的建立，標誌著苗族已能運用科學觀念的手段，自我起來同疾病作鬥爭的勝利，更是柏格理在尋求教會發展和宣道策略上的成功範例。

在當時，烏蒙山區還流傳著一種可怕的疾病，“麻風病”，那個時候不但是一個不治之症，而且還是一個棘手的社會問題。人一旦患上了這種傳染病，只能離家出走，淪為乞丐，被社會厭惡和拋棄。柏格理非常同情他們的不幸遭遇，通過教會積極幫助他們。按月發給流落荒野的麻風病者糧食和生活急需。在救濟的同時，也對他們進行管理：首先不允許他們到處乞討，以免病菌傳染；另外繼續接濟他們生活和給予治療。柏格理在世時，一直想為他們建一所“麻風醫院”，苦於當時找不到合適的建院地址，到他去世前也沒能實現。1919 年，他的繼任宣道士，牧師張道惠和幾位苗漢傳道士為繼承和了卻柏格理的心願，在石門坎一片荒地上，建成了石門坎麻風病院，這也是中國歷史上建成的第一所“麻風病院”。

1951 年 12 月，人民政府接辦該院，接交時該院尚有病員 51 人，職工 2 人。[17]

[17] 坦 張, 窄門前的石門坎 (貴陽, 中國: 貴州大學出版社, 2009), 217.

中國第一所漢苗雙語學校、中國第一所開創男女同校先河的少數民族學校、第一所苗族貧民苗族醫院、中國烏蒙山區第一所西醫院、中國最早的麻風病和孤兒院、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第一座露天足球場和露天游泳池等等，這些若干個第一，使 100 多年前的石門坎，這個中國西南地區最偏僻、最貧困，尚處於農奴社會的苗族山寨，成為當時享譽中外的“中國西南基督教文化聖地。”

石門坎教會從建立到發展、成熟、穩步的前進，能稱之為中國教會史中在那個年代的標杆。從神學的教會論來看，他們在教會的管理中首先用真道作衡量，將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很好的結合，可謂雙翅齊飛。在石門坎教會事工的實踐中看到文化使命所帶出的福音使命，是非常成功的教會建造範例。它成為石門坎大花苗人價值觀的改變和信仰力量的“金鑰匙”，我們在後面章節的神學分析中會更詳盡的解讀其中的內因外果。

3.3. 透過教會、福音工作，苗民接受基督教信仰，帶出內在生命的翻轉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 3:23）人類社會從我們所認識和知道的整個歷史，清楚地記載並向我們一再證明瞭《聖經》所說的話，千真萬確。如果不認識神，沒有神的救恩，人類就只能是苟且偷生，虛度一生，毫無意義。

石門坎大花苗族人生命的重生，人生價值再塑造，這後面是“神愛世人”對無助的弱者最真切的愛。透過祂的“道”，由一群跟隨並效法祂行為準則的忠實實踐者，在這片貧瘠荒蠻的大山深處彰顯出神的榮耀。這是對每一個苗族同胞心底那

份愛的喚醒。就是今天依然可以在石門坎，從人們的記憶和留下來的歷史遺物中，感受到這種愛的氣息和溫度。

其實二十世紀初，石門坎這個從物質角度和精神層面看，幾乎處於煉獄般的地方，之所以異軍突起，成為川、滇、黔信仰和文化的中心，也是中國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區，除了柏格理外，還有他的追隨者們和那些被信仰改變的當地漢、苗、彝族等信徒，他們一起合力為福音獻身，點亮了數萬人生命之燈，將這片千年黑暗之地變得遍地火紅。

石門坎教會的經驗中，從柏格理開始，到後來追隨他的傳教士們，在教會增長上，對門徒的訓練，特別是對本地本民族信徒的造就、裝備等，都被視為事工重要的環節之一。這種工作所帶出的果效是令人振奮的。福音的好消息迅速、成倍的向人們廣傳開來。同工訓練是基督教事工重要的一項工作，早在前往石門坎前，柏格理就有預備：他挑選苗族優秀人才在昭通舉辦教牧人員訓練班，為他深入苗區傳教、辦學及建立教會作人才準備。其中王道元、楊雅各等人，成為他在石門坎建立教會和傳揚福音的最得力同工。[18]

同時因為老苗文的創制，幫助並助推了基督教穿越石門，抵達廣大苗區。老苗文簡明、易接受、應用廣，上的教堂，進得學堂、下得草房。連苗族老人、婦女們都能用苗文朗誦讚美詩和讀聖經，更多的苗族群眾接受了福音。

---

[18] 信 阿, 用生命愛中國 (鄭州, 中國: 大象出版社, 2009), 68.

> 1908年，由張道惠牧師主持，先後又辦了兩期苗文訓練班，受訓人數達四百餘人。到1917年，苗文版《新約全書》四福音出版。使得這個文字深入苗族生活，真正本土化，成為本民族自己的語言文字。[19]

循道公會將福音傳播和文化傳播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同時身體力行，傳教士們為融入苗族人，“改著苗裝，學習苗語，與苗族一起吃飯一起睡覺，生活全盤苗化。”而教會所裝備的受訓同工又大多為本地苗族信徒，他們經過門訓後與傳教士們一起，再回到各自村寨，以石門坎為中心，在黔、滇、川毗鄰幾十個縣的廣大少數民族地區活動。

> 建教堂、建學校，十餘年中便“擁有信徒六萬之眾。”直到新中國成立前，“英國中華基督循道公會西南教區”都有委派其它傳教士如王樹德、張義惠、高志華、顧華文、幕博裡等傳教士來繼承宣道事業，而且教堂和學校數目不斷增加。[20]

聖經使徒行傳中，當耶穌升天後，聖靈降下，神的眾兒女得享祂在基督裡的喜樂生命，神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教會，這就是初代教會福音大大復興的情形。當時的石門坎教會也如同使徒行傳描繪一般，皈依基督教的信徒天天有增無減。

> 由於接受基督教，教徒個人能與上帝直接交流，思想上感受上帝、基督賜予的慈愛與恩眷。與上帝、基督同在的意識，成為信徒的精神支柱，支配信仰的言行；為上帝作見證的觀念，鼓勵信徒的行動……於是，無論言談舉止、服飾裝束，還是思想境界、人生追求等，教徒與非教徒就是不一樣，單從外表就能加以判斷。如，威寧等地‘自清末英籍牧師柏格理來石門坎建立教堂，設學校，苗、彝民族多入其教，受其教感化，勤於畜牧、農業、衣服裝俗多改舊觀，民族性最純，多皆自食其力，不為盜不為乞丐、少吸煙，誠系難能可貴也。[21]

> 由於選拔了苗族自己的佈道員，語言上感情上完全吻合，於是佈道效率更高，教徒人數更為增多，禮拜天做禮拜就有幾千人。相繼又選了二十多個佈道員，現在全部

---

[19] 紅 沈, 石門坎文化百年興衰 (瀋陽, 中國: 萬卷出版公司, 2006), 130-132.

[20] 建西 遊, 近代貴州苗族社會的文化變遷 (貴陽, 中國: 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7), 104-105.

[21] 和平 秦, 基督宗教在西南少數民族中的傳播史 (成都, 中國: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3), 458.

> 已有四十多個佈道員，這就大大加快了教會工作的發展，隨著就進入了教會的興盛時期。”[22]

信仰的改變是人心靈的釋放和潔淨，由此帶來了苗族人思想觀念的轉變，使人心靈深處所擁有的信、望、愛。這種效應的反映是生活方式有了新生樣式。未信主前，男女每天吃完飯後，在一起唱調彈琴，喝酒；到了深夜，各人領著各人的物件，回到自己家裡或在外面去同睡。信主後，讀聖經，唱讚美詩，祈禱，信仰的追求佔據了他們空閒的時間。教會活動和生活充實著內心世界，形成了新的精神生活需要，反映出屬靈的生命追求。性關係的隨便等行為得到了杜絕，由此引生的家庭糾紛、社會問題等基本上消失。而在日常的生活中，信徒間的相互關懷，互助生產，守望恪守，患難相恤，團結互助等現象，較之非信徒更加突出、更加廣泛，更有成效。

沒有人親眼見過神，苗族人一樣。但是當福音的“道”被地上信祂、遵行祂旨意的人實行出來後，他們真正在人的身上看到了真實的上帝就在他們中間。而且給了他們一個全新的生命。不可否認，接受基督教的信仰，改變傳統的信仰，拋棄先前的神祇，對於個體來說，並非易事。而對於遠古以來就拜鬼神的石門坎苗民來說，還要接受一個從西方帶進來的信仰，相信上帝、相信耶穌，這種生命的重新塑造和改變，決不是人可以做到了，乃是神祂自己做的。

沒有一個人、一個民族甘願幾千年不變地遭受欺淩、壓榨，過著牛馬不如的悲慘生活，寧願命運的隨意擺弄。翻開歷史縱橫的書卷，記載著的是一部苗族人民

---

[22] 人達 東, 滇黔川邊基督教傳播研究 (北京, 中國: 人民出版社, 2004), 216.

奮鬥辛酸的苦難史。在保衛家園、捍衛自尊的蹉跎歲月裡，他們並不是懦夫。他們反抗過、他們抗爭過。在那些腥風血雨的日子，在一次一次在交戰中，他們經歷生命的消亡，是意志的虧損，是家園的淪陷。為了保存這個民族的根系，他們只得退卻，不斷地在戰亂中向後遷徙，只退到今天中國西南的邊陲。然而他們卻為我們中華民族的大家庭，存留下了這個民族的餘種。他們雖然沉睡了千年，苦於找不到一條出路。這並不說明他們永遠悲泣、軟弱。上帝的憐憫和愛，在上世紀的二十年代初，如一盞明燈，終於光照到這片土地和他們的心靈，敲開了那道遠久黑暗的門，點燃了他們生命的火。從信仰的層面講，也唯有上帝能夠拯救人心。

石門坎包括整個烏蒙山區的苗族，絕大多數人，在短短的時間中，義無反顧地信奉了上帝，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難以置信。從各種文獻和資料的記載裡，我們處處可以發現，不是因為基督教核心的價值觀，“愛人如己”的最大誡命，這件事不可能發生。只有相信有一種來自天上愛的傳遞、一種愛的給予，才能夠使人以命相托。在新約中，耶穌的首要工作就是改變人心。祂改變了尼哥底母，告訴他，人必須重生；祂改變彼得，使他成為教會的“磐石”；祂改變逼迫基督徒的掃羅，使他變成偉大的使徒保羅。石門坎教會人所經歷的天地人心巨大的生命翻轉，教會的增長和復興，不也如同使徒行傳時期初代教會一樣嗎！“除祂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徒 4:12）

3.4. 石門坎教會的變遷、枯竭、消亡的演進

石門坎教會從 1905 年開始，到 2016 年，經過了 111 年的歲月，呈現的線型走向是起伏趨下的圖像。從整個發展到衰退演變的過程，我們可將它分為三個階段：

3.4.1. 綜述

第一個階段：1904——1915 年，是循道公會基督教傳入滇黔川邊，並取得大發展的階段；

第二階段：以 1915 年柏格理入黔到去世為標誌，這個地區的教會發展進入了一個長期的緩慢發展時期，這一時期延至到 1949 年，至宣教士被迫撤離中國、或被驅逐出境為止；

第三階段：以 1949 年始，到 2016 年，是新政權（中國共產黨掌權）執政時期。政府對宗教的態度一直持“明開放、自由，”實際是暗打壓和禁止的行動作為。直到今天還是沒有鬆綁的徵兆，只是外麵包裝更華麗而已。這是第三階段。

這段近、現代中國教會歷史，時間離我們並不遙遠，如果認真的進行研究和發掘，是可以通過現存有的一些文獻、歷史資料、研究論著等查詢和考證，尋到教會發展變遷的來龍去脈，為今天教會增長、信徒屬靈生命的建造提供寶貴經驗和教訓。

看起來好像真相並不難揭示，但是因為政治原因的限制、輿論導向的封鎖、人為的一些限定等，特別在國內的出版物及刊物中，很少能看到有關基督教方面的

文獻。在歷史記錄的文獻中也非常有限和稀少，很難找到有關的最原始資料。所以就是現有的一些研究報告或評論，也不可能完全公平、公正的來評價這段歷史。然上帝的作為記錄在了歷史中，定鏗鏘落地般的鑲嵌於祂的疆界。其實在英國和一些歐美國家，早有一些介紹和評價石門坎教會和宣教士方面事蹟的書籍和研究專著，只是在中國內地我們無法看到。但是今天石門坎這個地方仍在，那些至今尚存老舊的“教堂、長房子、學生宿舍、牧師樓、游泳池、足球場……”還殘簷斷壁地躺在那裡，這一切都無聲的在講述和見證著那段真實而美好的歷史。

3. 4. 1. 1. 第一階段

在本章的一、二節中，較詳細的敘述了石門坎教會從初建到發展、復興的過程，我們把這段時間稱為石門坎教會第一階段。以柏格理為代表的一群同道人在這個階段，借著傳上帝的福音為使命，以石門坎為基點，推行了一系列的社會經濟等的改革：建立教會、學校、創制苗文、翻譯聖經新約等，同時創立貧民醫院及改革社會風俗等，帶動了石門坎苗族人的信仰、教育和文化的改變和發展。在二十年代初，使當時的石門坎成為了中國西南邊陲“文化聖地”及外國人口中的“海外天國”。[23]

---

[23]慧真 張, “教育與民族認同: 貴州石門坎苗族基督教族群的個案研究″ (PhD diss., 香港中文大學, 1999), 1, accessed July 11, 2017, http://docsplayer.com/28700231-Umi-number-copyright-1999-by-cheung-wai-chun-allrfqhtsreserved-u-m-t-umi-microform-copyright-2000-by-bell-howe-information-and-lea.html.

1915 年 9 月 16 日，柏格理為救治苗族兒童染上傷寒病，終於卸下了世上的勞苦，辭別了他深愛著的這片土地，去到了一個更美好的天家，並且被苗族人民厚葬于石門坎學校後面小山上的橡樹林中，並永遠守護著他深愛著的中國苗族人的家園，時年才 51 歲。柏格理在中國宣道、特別是在石門坎十一年宣道經歷和事蹟，在英國和其它一些歐美國家家喻戶曉，當時基督教衛斯理宗，將他列為包括約翰.衛斯理在內的五大使徒之一。他獻身中國宣道的感人事蹟極大地鼓舞了當時的英國和一些歐美國家的牧者和信徒。

3.4.1.2. 第二階段

繼柏格理去世後，直到 1949 年，又先後有十餘位英國的傳教士來到石門坎佈道和教學。

> 他們是：韓素音（韓孝禎）：柏格理夫人，1905——1915；張道惠：1906——1926年，因病回國；布萊恩：張道惠夫人，1906——1926年；王樹德：1910——1936年；高志華：1924——1938年，被土匪殺于石門坎；易理凡：1925——1931年；穆博禮：1935——1939年；石崇德：1938——1949年；邵泰清：1940——1948年；張繼喬：張道惠之子，1947——1949年。加之從柏格理起就有在本地區培養出的漢、苗族牧師及其它同工，如張柏猷（苗族）、李正邦（苗族）、楊明清（苗族）、鐘煥然（漢族）、吳忠烈（苗族）、李正文（苗族）等一大批熱血信奉基督，並帶著上帝使命的託付，繼續在烏蒙山區拓荒、耕耘。[24]

使石門坎教會和福音的宣道事工星火相傳。

也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石門坎教會的發展進入到了一個緩慢、漸進期，再也不能出現如 20 世紀初那樣的迅猛擴展和高漲的勢頭。這有當時中國社會整體形勢

[24]人達 東, 滇黔川邊基督教傳播研究 (北京, 中國: 人民出版社, 2004), 52.

因素所致，也有因為柏格理的離開對教會和民心造成的影響，這個時候教會的運作和方式也發生了變化。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教會已經與柏格理時期截然不同：

外部，20 世紀初，中國政局不斷發生巨大的變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滇黔川邊各民族。他們積極參與當時的護國運動、新文化運動等。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期間，石門坎人也積極參與其中；國外，有強權外部勢力的威脅及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的不斷挑釁和進犯。石門坎也不再是從前封閉與外界隔絕的境況。各種思想和運動不斷湧入並影響、衝擊著受到宗教、文化教育的苗族人，他們中必然有人投身於這股潮流中。這種形勢下，人們對信仰也產生動搖，有不少苗族村寨的人就此放棄了信仰，還有的人又回到原來的自然崇拜中，猶如大海落潮一般。

內部，教會形式格局和傳統的社會格局也發生了變化。此後的傳教士大多住在遠離教區村寨的昭通城，而少住教區村寨。他們也不通苗語，與群眾接觸不多。常常是按照例行形式，到各支堂巡視，沒有了老一輩傳教士那樣與信徒的深厚感情。這使得一些首批追隨老一代傳教士的、在當地苗族信徒中有一定威望的佈道員，也是曾為石門坎教會初創做出貢獻的功臣們，先後紛紛離職。這對教會的穩定和發展受到很大的影響，群眾的信任度與信心大為減小。

另外，在民國時期，軍閥混戰，政府也沒有更多精力對邊疆投入管理，雖然多數苗民信仰基督教，然而因為周邊盤踞著更大如彝族、漢族等族群，形勢複雜，土匪橫行，石門坎地處偏遠，經常發生盜匪攔路搶竊，甚至有時還偷竊石門坎教會和學校。1938 年 3 月 5 日，為保護石門坎教會學校財產和學生教師的生命安全，英

籍牧師高志華，被土匪殺死。[25] 由於沒有安全切實的保障，也使得石門坎教會進一步走向衰退。

> 面對這種複雜情況，王樹德、張道惠、布萊恩、美論義等傳教士，還是堅定執著地與堅持信仰的苗族、彝族、漢族佈道員們一同，繼續堅持開展石門坎教區的各種教會事工。有步驟地在各地新建教堂和學校；在石門坎擴建校舍、麻風病院、平民醫院、孤兒院、推廣部等；繼續選派優秀的畢業生到成都、武昌、南京等地的大學深造；繼續印刷苗文《聖經》等等，使得教會在緩慢中發展。[26]

在這階段裡，最主要的宣教士是張道惠夫婦。從柏格理去世後，當初與他一起同工的傳教士張道惠夫婦一家，成為繼任者來到石門坎，繼續福音在石門坎及周邊的各項事工。掃盲班、麻風病院、孤兒院等都是那時他們主持建立的。同時他們還走訪過川苗廣大地區，建立了很多教堂和學校，並親自用苗文翻譯了新約《馬可福音》。這期間他們的工作量極大，又常受到生命安全的威脅。但他們從來不言苦，而是為神做工的喜悅一直存留心中，直到 1926 年他們回國休假。當他們再次申請返回石門坎時，因為身體的原因，最終醫生拒絕他們返回，他們在石門坎教區工作了整整二十二年。而他們的兩個兒子張紹喬、張繼喬繼續在石門坎和烏蒙山苗區堅守宣道，直到 1949 年被迫離開才回國。

在王樹德的《在未知的中國 石門坎與花苗》一書裡，也有很詳盡的記載：

> 我們的工作業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對於將來可能發生的事情則無法予以描述。在今天的苗地，有將近四十個有組織的教會，擁有8300名教徒和詢問教義者，開設學校三十餘所，享受津貼的在校生1400名……今後五年時間的目標是，發展2500名新教徒，使基督教社團增至5000個。作為規劃的一個部分，要實現每天晚上有每兩家人合為一體進行祈禱，使每一戶都有一部《新約全書》與讚美詩詩篇。計畫使我們

---

[25]人達 東, 滇黔川邊基督教傳播研究 (北京, 中國: 人民出版社, 2004), 235.

[26]人達 東, 滇黔川邊基督教傳播研究 (北京, 中國: 人民出版社, 2004), 232.

學校的在校生達到3000人。要使更多的漢族人與諾蘇人（彝族）聽到對福音的宣講，計畫還包括建立若干有護士負責的石門坎小醫院下屬的醫藥分點。[27]

這個時期的教會活動外部形勢雖不利，當時國民黨政府處於外要抗擊倭寇、內要反共的雙重壓力下，而為了地方的安定，政府雖有設難，終未禁止教會的活動。

3.4.1.3. 第三階段

從五十年代初起，中國共產黨掌權後，對宗教特別是基督教實行管制政策，大批宣教士被迫撤離或被驅逐出境，中國基督教歷史實際進入了一個非常艱難、複雜多變的階段（第三階段）。這個階段又可分為幾個時期：

1、解放初期：基督教大迫害時期

新中國成立至 1956 年前，也被稱為“基督教大迫害”時期：此時，中國政府強行要求教會歸入由政府管理的“三自”體制中。石門坎教會也未倖免受到衝擊，因為前面幾十年接受基督教抹不掉的歷史，石門坎被視為“外國文化殖民侵略地”，被扣上了“小香港、小臺灣”的帽子。到 1952 年，外籍傳教士已經被全部驅逐出石門坎，新政權接管了所有石門坎教會學校。這期間中國教會有相當部分因堅持信仰的真道，其中以倪柝聲、王明道、吳維尊、林獻羔、袁相忱等為代表的牧者或信徒被關押、判刑、為主殉道。據資料統計，當時全國被關押、受迫害的基督徒有六萬人之多。石門坎及周邊教區也直接受到這個大環境的衝擊，只要從石門坎幾個人

---

[27]格理 柏 et al., 在未知的中國, trans. 人達 東 and 旻 東 (昆明, 中國: 雲南民族出版社, 2002), 435-436.

物的遭遇中就可以知道。他們成為共產黨肅清運動的打擊對象，他們的遭遇，不僅僅是他們個人的悲劇，更是時代的一個嘲諷。

在這階段裡，我們不能不提到朱煥章。 他是當時石門坎初級中學校長，虔誠的苗族基督徒。曾就讀于石門坎光華小學，中學就讀于雲南昭通宣道中學，畢業後回到光華小學任教。後由石門坎教會資助，繼續就讀成都華西大學教育學，學成後回到石門坎創辦了第一所苗族中學——西南邊疆私立石門坎初級中學，任校長。他還被選為國民黨國大代表。當年蔣介石曾兩次欲重用他，都被他辭謝拒絕。他為石門坎興辦教育嘔心瀝血，不問富足。這樣一個紮根家鄉的教育家，1954 年，被“上調”到貴州省教育廳，做了一個小小的民族教育科副科長。肅反運動期間，有人多次嚴厲地逼迫他寫黑材料，揭發教育廳某領導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他作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不願意害人，但那些人又不放過他，他只能選擇自殺。不僅如此，在以後的幾十年中，他的家人在各項運動中因此被株連、迫害。至今我們不得而知因何故他上“調”貴陽，又很快自殺身亡（1955 年）。但從他曾兩次拒絕到國民政府最高權利機構工作，及他獻身石門坎教會和教育的經歷中，我們對他的死不得不生出許多疑問。據他女兒朱玉華回憶，他父親寫有一份遺書，她看見過這份遺書，上面寫有“我寧願選擇沉默，也不能說假話，更不能陷害他人”等內容。1981 年，朱煥章得以平反。

張文明，曾為光華等教會學校的學生，初中畢業後，成為了石門坎教會學校的老師。因為曾就讀教會學校，被說成與帝國主義有著分割不斷的連絡人，當然不可倖免。在其 50 多歲時被打成右派。到了“文革”，又被揪出來批鬥，寫交代、

寫檢查。因為父親是右派，孩子小學畢業僅讀了兩個月初中後，就被剝奪了讀書的資格。

> 朱煥章的後代，在以後的幾十年中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命運淒涼。女兒朱玉華因為父親平反問題後來被迫從省城回到威寧，生活拮据。她兩個兒子：大兒子曾考取大學，卻名額被人頂替。後來又有機會參軍，體檢合格，又因為沒有社會關係，而被淘汰。到後來又經歷下崗。可悲的是，2006年得了癌症去世；二兒子命運也同樣可伶，患上了石門坎流行的肺結核，也因無錢治療，只得在家等死。[28]

讓我們倍感可歎的是，吳性純　　、朱煥章、張文明等這些敬虔的基督徒，他們的後代，今天都已不再是基督徒了。神呀，求你憐憫他們！

2、“反右運動”到“文革”前的時期

1957 年，反右風狂戳中華大地。石門坎，這個畢業了四千多名小學生，數百名高初中及中專生，三十多名大學畢業生，四位碩士和博士，曾經的宗教文化“聖地”，當時也成了威寧的反右重鎮。[29]　基督教信仰及活動也隨著政治運動的影響處於停滯萎縮狀態。就是老苗文，也不幸背上了“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黑鍋，從五十年代以後從鄉村學校教育中退出。同時人民公社運動和“大躍進”運動，對農村教會衝擊很大，信徒人數更直線下降，進入六十年代後，先後又有許多支堂因參加宗教活動的人太少, 開不起禮拜，停止了宗教生活。1963—1964 年左右，石門坎

---

[28]元龍 李, “朝 聖 石 門 坎,” http://www.3miao.net/, October 2, 2011, accessed July 5, 2017, http://bbs.3miao.net/thread-90248-1-1.html.

[29]元龍 李, “朝 聖 石 門 坎,” http://www.3miao.net/, October 2, 2011, accessed July 5, 2017, http://bbs.3miao.net/thread-90248-1-1.html.

中心教堂也不再開放禮拜，有組織的宗教生活終於被迫停止。那轟轟烈烈的曾有數萬教徒的教會系統，處於門庭蕭條的淒涼情景。

3、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時期

與前兩個時期相比，這時期的民族宗教政策更趨於極左，宗教自由政策遭到了徹底的否定，任何宗教場所及活動都停止。石門坎教會也完全處於一種癱瘓狀態。

> 一些苗族基督徒在政治運動中受到衝擊，信徒群眾被稱為“牛鬼蛇神”、“帝國主義別動隊、走狗”。有的還被抓進“管訓班”強迫退教，教堂被挪為他用，《聖經》及教會用品被焚毀。這在苗族人民心中造成了很深的傷害。雖然還是有少數信徒仍然偷偷地將敬拜上帝的聚會活動轉入地下，更多的苗族群眾放棄了基督教的信仰。這個時期的石門坎教會，又退回到了原點。[30]

在此應當提述另一位滇黔川西南教區信仰烈士：苗族牧師——王志明。

1998 年，以基督教“威斯敏斯特信條”而聞名全球的英國皇家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確定了二十世紀十個偉大的殉道者，其中有一位中國人，他就是中國西南邊疆灑普山教會（此地曾得到柏格理時期及後來石門坎教區派人佈道、並建立教會的幫助）的苗族牧師——王志明。[31] 他的塑像與另外九位殉道者一同樹立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外的西門。這位在“文革”中因堅持基督信仰，不向專制者低頭的敬虔牧師，在“文革”中受盡了百般折磨，最後被槍決。槍決前幾天，為了不讓他口中發出讚美聲，讀聖經，向信徒傳講真理的聲音，專制者硬是用尖刀在他口中將他舌頭絞碎，使得他昏厥，滿口血肉模糊，終不能說話。就這樣，1973 年 12 月 29 日，這位主的忠心僕人，倒在了“專制者”窮凶極惡的槍口下。當時自發在場的信徒無不

---

[30]紅 沈, 石門坎文化百年興衰 (瀋陽, 中國: 萬卷出版公司, 2006), 103.

[31]人達 東, 滇黔川邊基督教傳播研究 (北京, 中國: 人民出版社, 2004), 218-219.

痛心絕望。他真正實踐了聖經所說："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而來往世界各種膚色的人，無不駐足於英國皇家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前，讀著他的簡介潸然淚下。

雖然王志明已經長眠於苗族大地，但"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上帝的兒子，他的事蹟，今天繼續激勵和感動並影響著千千萬萬的中國基督徒。如今他的後代，繼承他的遺志，繼續在他獻身的苗族山區傳講上帝的福音。作為這時期的代表，王志明，及在那個年代，同樣遭受到迫害、打擊、喪失生命的石門坎教會的信徒們，在"順服上帝、而不順服人"的生命經歷中，更凸顯了那個時代的荒唐、混亂、艱難和黑暗。

4、改革開放時期

再來看從"四人幫"被粉碎後，到今天改革開放這段時期：這也是中國教會進入一個發展、增長、復興的時期，然而又是一個伴隨著挑戰、形勢複雜多變的時期。這個時期各地教會先後開始恢復了活動。石門坎苗族信徒也在這個大環境下，經過幾十年沉寂後，山村又傳來了眾人敬拜上帝的讚美聲。

> 在歷次運動中，一些繼續持守信仰的苗族基督徒，他們從地下聚會轉入公開的聚會。石門坎下面的蘇科寨早在解禁前的六十年代就自發以家庭教會的形式存在了。[32]

---

[32]紅 沈, 石門坎文化百年興衰 (瀋陽, 中國: 萬卷出版公司, 2006), 155.

石門坎教會幾乎在渡過了四十年的黑暗期後，到 1988 年後，石門坎中心村、蘇科寨等十多個村寨相繼建立了教會，恢復了聚會。然而因為政府的幹預，包括石門坎在內的，已經公開聚會的教會，都被納入到了“三自”的體系。很多時候還是被限制在政府的管理之下。

1995 年，石門坎得以向外開放，隨著柏格理及其它宣教士的後人及信徒不斷造訪石門坎，這裡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在近 20 多年的時間裡，石門坎得到了多方的援助和支持。一波又一波的人來人往，國際國內也不斷有金錢、物質的贊助和投入，但還是留不住願意為石門坎教會全心獻身石門坎人。直到今天這裡與全國發展形勢相比，差距很大，貧困和落後還是非常驚人的，你仍然看不到福音復興的跡象。個中有多種深層次因素，這與大環境和中國現今制度有關，更與人們對基督教真理、信仰的認識有關。可以這樣說，一個信仰體系的崩潰直接會導致文化的退步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停滯。

根據 2004 年的一份資料統計，

> 石門坎的兒童失學率達到88%，中學女生不到男生的三分之一，從初中三年級起，學生只有到百里之外的地方去讀。因貧困接受救濟的家庭達到98%，文盲達到80%，政府統計的人均純收入1090元；多數農戶依然住的是茅草房；80%的人畜缺水；烤土豆、吃玉米麵依然是90%苗族人的主食；90%的村民都有不同程度的氟中毒。石門坎重新被邊緣化。[33]

---

[33]浩武 陳, “石門坎給今天中國教會和社會帶來什麼啟發？,” September 8, 2015, accessed July 1, 2017, http://www.chinaaid.net/2015/09/blog-post_92.html.

地理位置的邊緣，經濟地位的邊緣，在 21 世紀的今天，石門坎還是重點扶貧開發縣威寧縣最貧困的鄉之一。時至今天，畢節地區，威寧縣政府、香港樂施會、深圳市石門坎教育公益基金會等民間組織長期在石門坎實施了多項扶貧計畫。

去年的 4 月清明，我們一行到了石門坎。流入我們眼簾的一切，時而讓我們心情沉重，時而心中激蕩，雖然石門坎看起來還是那樣貧瘠，仿佛 100 多年前的美麗壯境無痕，但內心一直被什麼東西在牽扯著。所以對石門坎教會當前的光景我們一行都憂心忡忡。幾天跟苗族信徒的接觸，特別是當站立在柏格理和高志華墓前的剎那，我突然明白了：這裡從 1905 年福音照亮開始的那一天起到現在，上帝從來就沒有離開過石門坎。雖然現在教會的形式、信徒人數有待增長，信徒的靈命需要長進，但是教會的敬拜仍然在榮耀著祂的作為。從苗族信徒的眼神中你看到一種渴望，他們需要復興。主日敬拜完畢，負責接待我們的吳弟兄（教會執事）告訴說，晚上他們村還有查經聚會。我們曉有興致地提出參加。這是什麼一種形式的查經聚會呢？當聚會開始時，是在一間不大，燈光有些昏暗的村民家的堂屋裡進行，男女信徒大概 30 多人。村民們開始唱讚美詩，然後是一段經文的學習，又是一次的讚美詩，又進入一段經文的學習，如此的交替，不同的弟兄起來帶領查經。雖然查經的內容很淺顯，但每個人都很認真、投入，他們的虔誠，盡心，感染著我們，我們真實的感到上帝的同在。讚美詩的頌唱如天籟之聲，同聲讚美時，才發現我們每個人已經淚流滿面。這時候，內心一個聲音告訴說，這裡復興的時日不久一定會到來。

3.5. 本章概述

鬥轉星移，100 多年過去了，當這段歷史被翻開，走進去開始梳理時，越進入越被深深吸引。更感到一種筆短詞窮的慚愧和自責。帶著一種朝聖般的心緒，也不能窮盡上帝在這塊地方施行愛的作為。從史料中，從石門坎後人，還有今天尚存在石門坎土地上的斷壁殘簷，每個階段都能找到出處。1905 年柏格理及他的同伴們不是憑著血氣，更不為自己在世上留下什麼光輝業績，只為著上帝榮耀在地上的彰顯，在石門坎成功的進行了開疆建基的福音事工。這一步的邁出，從此使石門坎千年不變的歷史被改寫。在 20 世紀初的十幾年中，柏格理和他的團隊，所經歷的萬苦千難，只要其中摻雜著一絲血氣，每一步都很難踐行。無論是選址建堂，還是開辦學校、創制苗文、還是向外擴展福音，進行一系列的社會和經濟的改革，都傾注了他們全部的生命擺上。他們將福音迅猛擴展到滇東北、滇北、黔西北、川南等幾十個地、縣，形成了當時具有相當國內外影響的基督教新教的傳教區域。[34] 上帝的公義和慈愛，也在石門坎這個地方，在這裡的苗族人身上看到了脫胎換骨的巨

[34] 人達 東, 滇黔川邊基督教傳播研究 (北京, 中國: 人民出版社, 2004), 218.

變；特別是通過學校的建立，苗文的創制，使得福音工作比翼雙飛，更快更多的人皈依基督教。也帶來了石門坎整個地域和人文精神面貌的改觀；

1915 年後，到 1949 年末，石門坎教會進入到了一個起伏、緩慢的發展時期。隨著柏格理的去世和當時社會環境的亂象，雖然福音工作還在繼續，但再也看不到那種高漲、火熱的場面。這段時期繼續有受感召的宣教士接過柏格理的擔子，奮戰在石門坎這片疆土。但國內外形勢，客觀上對福音事工的阻擾，外部局勢對已經開放的苗族群眾思想的影響，使得信徒信心產生動搖，加之教會內部在管理和參與事工，人事上的變化，已經不再如當初柏格理時的情形。一些當地培養的同工也很多離開了服侍的崗位。儘管如此，上帝的工作沒有停止，留下來的宣教士們還在盡本份地工作。在很不利的環境和局勢下，也取得了斐人的業績。所留存並記錄下的資料可以證明他們的勞動，烏蒙山苗疆的大片土地留下他們宣道的足跡可昭示天下。

1948 年，石門坎發生了一次六級以上大地震，石門坎一大一小兩處教堂，頃刻化為廢墟。 這仿佛向石門坎苗族信徒發出一個信號，教會從此要經歷一段黑暗的日子。這個日子真的在共產黨接管政權後"兌現"了。1952 年外國傳教士從石門坎全部撤離後，一切都開始發生了變化。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沒完沒了。石門坎的信徒和知識份子朱煥章、張文明、王建明、王建光、楊榮新、楊榮先、朱正良等

陸續遭到迫害，基督教循道公會在石門坎及周邊區域教會活動煙消雲散，銷聲匿跡。儘管有極個別教會轉為地下聚會，也有少數信徒個人私下堅持信仰，但整個的形勢如黑雲籠罩，毫無生機。直到改革開放的近三十來年，石門坎苗族信徒才開始有了公開聚會，教會也恢復了其它活動。但是經過了幾十年政治鬥爭的折騰，信徒元氣大傷，真正的復興還沒有到來。

今天石門坎的狀況，誰應該認責，上帝終有一日有審判。而教會呢，反思在我們的信仰裡，對這段歷史的回顧，上帝要告訴我們的是什麼？教會在其中的經驗是什麼，過錯在那裡？我們必須正視，因為這關係到上帝整個救贖和恩典的計畫。祂需要人的合作，這些成敗也必須從神學的角度加以分析和評估，找出正確的途徑。

第四章

石門坎教會的神學分析--經驗教訓的總結

本章依據前三章的歷史陳述，從神學的角度觀察，考慮這段歷史應該怎樣評估和分析？它在中國教會歷史上有些什麼經驗，對當時和今天教會的發展有些什麼借鑒和貢獻，其價值和意義在那裡？根據前面所陳述的歷史，有很多值得深思和學習的。而神學本身研究的範圍和方向，有不同的分類，涉及內容廣泛，不可能一一涉獵。這裡我們重點從教會論和宣教神學初探對石門坎教會歷史進行總結和歸納。

4.1. 石門坎教會成長、發展、興旺的緣由

4.1.1. 神的時機神的時機

誰曾想過，一個世代靠守獵、農耕而生、草莽苟且而活的民族，千百年處於受剝削、壓迫處境的大花苗族，在遠離塵世的邊遠深山靜處的石門坎，有一天上帝會垂顧。從神學觀點看，上帝的“救恩”是關乎萬國萬族萬民的。從舊約到新約，這個主題都一直貫穿在整本聖經中，更重要的是，這些真實發生在歷史中的故事，從古至今一直延續著上帝拯救世人的美好見證。而上帝又是借著使用地上完全屬祂的人，與神合作而完成的福音大功。就前幾章的歷史再現，可以清楚的看到，石門坎教會的建立、發展完全是神的工作和帶領。石門坎事工開始前的十七年裡，柏格理作為英國循道公會差派到雲南昭通的宣道士，宣道事工實際上沉積了很長一段時

間，雖然建了為數不多的幾個教堂，但在 17 年裡只有少許幾個諾蘇人（彝族）和幾個漢人皈依基督外，其它福音事工並沒有什麼成效。柏格理及同伴在身心靈疲憊軟弱近於灰心放棄之際，直到遇到四個大花苗族人，使得他們被神光照，看到神奇妙的作為和介入。

這四位突然造訪在昭通柏格理的四位大花苗族人，乃是因為遇到在安順內地會英國傳教士党居仁，為解決四位苗族人的危難，党居仁為其寫訴狀到官府，使得他們的問題得到解決。這事喚起了苗人對文字魅力的驚盼，從而一心尋求並渴慕文字的學習。

因為客觀上地域的限制，党居仁將四為苗族人介紹離苗人居住更近的柏格理，這才有了柏格理的參與。

這整件事看起來，仿佛是大花苗族人偶然一次地接觸到了宣教士，才有了後來石門坎教會發展。但站在聖經和神學的觀點看，柏格理與大花苗族人偶然的相遇，本就是神必然時間的鎖定。

柏格理在當時的困境和堅持，與當時苗族人所面臨的環境和所期盼要改變的願望恰好在那個時間點上不謀而合，一拍即合。真是神定時的到來和時候滿足的標誌。

4.1.2. 柏格理的裝備和順服

聖經中多處講到為熬煉人的信心這種情況是常見的原因。人要得神的悅納或差遣唯一的原因就是“信”。而信心必須經過試驗才寶貴。事實上，連柏格理他自

己都不知道神在石門坎已經為他預備了禾場，但他懂得順服、等候神的旨意。石門坎教會這項事工並不是一般信徒或宣教士就能勝任的，那將是一個完全倒空自己，全然獻上的生命才能得著的。“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雅1:3）“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彼前 1:7）

17 年對於柏格理他們來說，在一種艱難的環境中，時間是很漫長的。但是從聖經中不難看出，這是神要預備忠心、順服的僕人一種考驗。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柏格理他們在昭通 17 年的日子，所有遇到的困難、事工上的無果等等，其中必定有神要裝備他後來在石門坎帶領大花苗族人，在各方面預備的心意。所以當苗族人走進昭通他們中間時，柏格理自然就明白了上帝要量給他的疆界和心意。在《用生命愛中國》中，很清楚地紀錄上帝對他帶領的明證：

> 柏格理看著這些和他風雨同舟的夥伴，久久地不說話，然後突然地，柏格理哭了，淚流滿面：“弗蘭克（部幕廉），我自己也不想去。但昨天夜裡，主找到我，他問：‘當我的羊群被擊打的時候，孩子，你在那裡……在中國，我們從一個少年人成長為一個成熟的中年人，我們都在這裡娶妻生子，但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們剛到中國，剛到昭通，你染上天花的那些歲月。弗蘭克，當你從死裡復活的那一刻起，主就給了我這樣一個信心：不管我們遇到什麼，無論我們將要面對什麼樣的環境，神都與我們同在。弗蘭克，你說我說的對嗎？’
> 柏格理說到這裡，突然跳起來，跑過去把門打開，高聲唱起一首讚美詩：
>
> 但那誠實愛主的人，
>
> 禍福都不問。
>
> 就是他們寶貴心血，
>
> 甘願為主舍。
>
> 求主給我這樣心志，

摯忠忘生死。”[1]

亞伯拉罕有過信心的軟弱，等候的失敗。他等候了十年，還是在沒有等候到神最好結果給他之前，用人的方法娶了埃及女子夏甲。所以才有了後面很多問題的出現。大衛同樣也經歷了很多神的熬煉，他是一個很會等候神的人。我們在大衛詩篇裡看到很多關於忍耐等候的內心表達。其實任何困難對神來說，沒有困難與容易的區別，都一樣的容易。但是對我們人來說，如果覺得容易的事情，就算有神的幫助，我們也是將榮耀歸給自己。所以有的時候，神就是讓我們到一個地步，當我們處理不了了，再伸手幫助我們，讓我們要徹底地降服在神的主權之下，才知道離了神我們什麼也做不了，自然就更加的感恩。

“我的心哪，你當默默無聲，轉等候神，因為我的盼望是從祂而來。”（詩62:5）應該說在昭通的 17 年，是神給柏格理以信心和等候神的功課學習。這一切從神學上分析，都是神的工作，也是福音進入石門坎最佳時機的成熟。

4.1.3. 神在大花苗族的動工

任何事物的出現都是多種原因合力作用的結果。今天來看一百多年前石門坎苗族這場大規模的信仰基督教運動，無可置疑，是神在其中的動工。

在前三章對石門坎歷史溯源的陳述中，石門坎的大花苗族是在遷徙中由平原遷到層巒疊嶂、連綿起伏、深溝險壑的大山——烏蒙山中。而一次一次的爭戰、失

---

[1]信 阿, 用生命愛中國 (鄭州, 中國: 大象出版社, 2009), 70-71.

敗已經磨平了苗族人的鬥志。生存的現實中，他們可以勇於同自然大山中的財狼虎豹爭鬥，卻又甘於為人做牛做馬。他們的思想、意識已經麻痹。人一旦麻痹，意識就遲鈍、模糊，結果必遭受苦難、消沉。而朝代的更替，社會的變化、進步，並沒有使這個苦難的民族翻身。這除了社會原因，也有自身因素, 不在話下。然而從神學的觀點來說，苦難的背後是上帝的祝福。福音既然是普世性的好消息，上帝“愛世人”是祂最大誡命之一。所以在清末民初時，一群被神感召、並對中國有負擔的宣教士，紛紛踏入中國。柏格理就是英國循道公會所差派的宣教士其中一位。從柏格理與苗族人相遇的經歷中，這其中主要搭橋牽線的“媒人”就是這位無所不知的上帝。因為神的屬性決定了祂必定要搭救這個族群，而柏格理和他在一起的宣教士正是要踐行上帝的旨意，他們承擔著福音的使命。當大花苗族人正在尋求改變命運的當下，他們初心並不是為著尋找生命的改變，但是神會用祂救恩的方法帶領前面的道路。總之在這個時刻，神借著柏格理對上帝旨意的領受，在大花苗族人心中動了善工。柏格理毅然回應了上帝的差遣。“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腓 1:6）

4.1.4. 小結

從本節各點中可以看出，當神的時候一到，必然會有奇妙的機遇，產生一種動力，並帶出一個極大的突破。柏格理在苦苦等待中，終於釋放了自己。筆者在想，當苗族人到達柏格理那裡的一刻，他那長久不解，上帝為什麼緘默不語，沒有開路的心結，豁然解開時，柏格理定是感恩又感恩。因實在知道自己的有限，人的軟弱。

也更明白神在他生命中各種時候和環境的帶領，都是為著這個時候，從而能承擔神偉大使命的擔子。這中間有生命和靈性的在裝備、信心的考驗、等候和順服的操練，使得柏格理成為神重新被造就，再次更新、改變、神隨時使用的器皿。而石門坎的大花苗族也在神的計畫中，通過四位大花苗族人一次遇到難處時，偶然中將他們帶到了柏格理身邊。這看似偶然所發生的事，但在神的眼裡絕非偶然。這是神整個救恩計畫的一部分。大花苗族上千年的受苦為奴的生活，每天都在發生和經歷著不公正的欺壓，難道他們習慣了這樣一種生存狀態？當然長期被辱的生活使得他們為了活命而忍氣吞聲。但這不可能是永遠的常態，因這不能顯出上帝的公義、憐憫。也正在這個時候，神選擇了四位大花苗族人首先站出來，配合了神的工作。

這其中所要學習的是：一個清楚侍奉崗位的傳道人，任何時候當守住自己的本分。時刻警醒禱告、等候，不因環境而改變初衷。只要是從神來的感動，就要立定心志，殷勤作工，一旦時機成熟，神必開通達之路。

4.2. 早期宣教士，柏格理及同工們的宣教心態和策略

4.2.1. 道成肉身的宣教模式

宣教工作的出發點是根據聖經的真理，因為只有聖經“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提後 3:15）不只是認識到救恩是有基督而來這個道理，而是要知道世人都需要這個救恩，這是宣教最基本的原因。如果離開了神的道，宣教工作就毫無意義和價值。柏格理正是效法這信仰的真道，一開始就採取效法耶穌基督

“道成肉身”的策略，決定住在大花苗族人中間。他不惜放棄安穩的生活，自甘辛勞，竭盡心志。為著神國福音的廣傳，多次深入採訪調查大花苗族人，並進入到烏蒙山廣大苗族地區，最後主動放棄了原有相對好的佈道場所（昭通），定居石門坎。這一切都是為了要說明宣教要訣之意義。為了在苗區建立教會，他親自與同工日夜奔波。從石門坎教會的籌建、選址、籌款、破土動工，柏格理都在行動上付諸行動。

在石門坎教會建立之前，英國循道公會宣教工場重點放在滇黔川邊疆地區。當初他們的宣教策略，主要是面向城鎮和當地漢人。但是從前面三章的陳述，我們看到這個地區的整個宣教工作並不順利，舉步艱難。究其原因，這直接跟他們不瞭解中國國情民情有關。中國是一個幾千年來受佛教影響極深的民族，同時儒家傳統倫理道德觀在人們頭腦中根深蒂固。還有其它如道教、藏傳佛教、伊斯蘭教等，都不同程度影響著中國人的價值觀、人生觀。所以當一個新的宗教進入中國，特別是在城鎮人們的觀念中，認定這是外來侵入的一個西方宗教，很難接受。這裡面有很深的文化與宗教之間，錯綜複雜的矛盾關係。所以人們固守自己傳統宗教，倫理價值觀不足為奇。當上帝打開了心門，宣教策略及時轉向農村、邊遠鄉村。對於大花苗族人來說，雖然他們同屬中華民族，但是幾千年來，遠離漢人和其它民族居住，文化的缺失，文明的落後，被巫文化所侵蝕，信奉多神。當一種傳入的宗教能夠幫助他們擺脫眼前困境時，很自然的，他們就接受了。這就是當時柏格理及其它宣教士的遇到的情景。神也奇妙的預備了他們的心態，讓他們有正確的策略反應。

4.2.2. 信仰與文化、教育的結合

在聖經中，我們看到神使用文化，目的是通過文化向各處各方的人顯明自己。在我們的信仰中，教會的使命是傳福音，擴展神的國度。石門坎教會建立後，柏格理和他的同工團隊同樣面對教會要增長和各項福音事工的擴展。筆者知道一切工作的物件是人，每個人都生活在當地文化背景中，不可能脫離自己的文化背景。這就是說宣教是一個“跨文化”的工作。 他們首先要面對的就是當地的文化和風俗。柏格理和其它傳教士們很好地將“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結合在石門坎教會的發展和各項事工中。

一開始苗族人找到柏格理，也是希望通過學習文字改變命運。柏格理也正好利用這種形式，通過教他們識字，而將聖經真理向他們傳講。從聖經中明白救恩，苗族人在學習中明白真道，成為基督徒。

> 傳教士們深知文化教育對苗族人的重要性，因為知識讓人明事理，這是通往智慧，實現美好人生的途徑。在這過程中，從柏格理開始到後來的傳教士，他們都使用聖經作為課本，教苗族人識字。解決了他們的渴求和生活急難，但最終竟然是讓他們信仰真神，讓上帝的國在石門坎得以建立，達到了神的最終目的。[2]

4.2.2.1. 發現語言文字的功能，創造苗文、學習苗文

傳教士不懂苗語，不能與苗人直接交談，初期的時候他們教苗人識字都是先將英文的聖經翻譯成漢字，再由懂漢語的同工來教苗人聖經。因為苗族絕大多數人沒有接受過教育，也不懂漢文，所以老師教起來不容易，苗族人學起來更難。柏格

---

[2]格理 柏 et al., 在未知的中國, trans. 人達 東 and 旻 東 (昆明, 中國: 雲南民族出版社, 2002), 112.

理初到石門坎時，就遇到了語言上的障礙。於是他拜苗族楊雅各和張武為師，認真學習苗語。白天黑夜不斷地跟著他的苗文老師，形影不離。 就這樣，在很短的時間就精通了苗語。

柏格理早就發現語言文字功能的重要性，當他還在昭通的日子，他利用自己的醫術，在給人醫治病患等簡單的醫療服務時，接觸到周邊的苗民和彝族人。 他發現苗族人不懂漢語，更不懂英文，使得因為語言的障礙，彼此無法表達意願，造成很多麻煩和困難。[3] 作為被差派來到中國的宣教士，柏格理非常清楚，要完成“宣教”的事工，除了遵循聖經教導，在宣教的具體行動中，也要有策略，不是僅憑一腔熱血。

傳福音的一個重要的媒介工具是文字和語言，要將所傳講的真理讓人明白，就需要通過與人的溝通和講解，這是最起碼的前提。這也是宣教人需具備的能力，應對不同環境和文化的保證。個人的裝備其中包括了生命的預備和技能、恩賜、負擔等多方面的考慮。柏格理先從學習苗文開始親近大花苗人，正是一個宣教人應有的積極態度。

---

[3]格理 柏 et al., 在未知的中國, trans. 人達 東 and 旻 東 (昆明, 中國: 雲南民族出版社, 2002), 477-478.

4.2.2.2. 研究和創造苗文

石門坎教會建立後，更多的苗族人蜂擁踏至，他們大多的心裡是為了學習文字和文化。文字知識的學習讓他們看到了可以改變生存環境和命運的希望。宣教士既然是背負上帝託付的使命，要將救恩的福音向他們傳遞。雖然從人的角度看，苗族人最初的目的並不是需要福音，但是上帝就是借著一些事，讓人最終歸在祂的名下。所以在宣教的事工中，要從處境化中找到突破點的策略。而柏格理，考慮到當地的實際需要，根據自己親身體會，就致力要為苗族人創造苗族文字，中心目的乃為著宣教的需要。這也是他們在石門坎宣教的策略之一。

苗族原來是有文字的。但經過千年的戰亂和不斷遷徙，最終文字失落了。柏格理自己經過學習苗人語言，能流利地與苗族人家長裡短地溝通，處理事情。但是沒有文字，意味著不能記錄下歷史，傳統不能傳承等等。而更重要的，考慮到福音如果通過苗族人，不僅是用聽得懂的語言，也通過看得懂的文字來表達，能更快更多的向人展示和傳遞。

> 於是柏格理和漢族知識份子李司提反、鐘煥然、苗族知識份子張約翰、王道元、王勝模等人經過認真研究，幾經失敗，最後終於採用拉丁字母為基礎，為苗族創立了基本可行、簡明易學的拼音文字。在研究這套文字時，他們還借鑒了大花苗族婦女花衣花裙上的花紋和娥贊時的符號，模仿創制了一些符號。在民間稱這套文字為“老苗文。”在西方文獻上稱之為“坡拉字母”或“波拉德文字”。4

苗文的創制，是當年柏格理叩擊石門、開闢石門坎教會的一把利器。它的誕生幫助基督教穿越石門，抵達烏蒙山廣大的苗區。

> 在後面的幾十年中，苗文又經過了多次的修改、轉換和變通。因為創制的過程，很多地方將當地苗族的傳統和文化融進文字中，使得苗文當時很容易被苗族人所接受

[4]紅 沈, 石門坎文化百年興衰 (瀋陽, 中國: 萬卷出版公司, 2006), 40.

。他們用了三年時間，用苗文翻譯了《新約全書》。由上海聖書公會出版，現在這個版本仍然在民間廣為流傳。5

老苗文簡明、易接受、應用廣。牧師們和當地傳道人翻譯苗文聖經和讚美詩；學校用苗文來編寫教材，發行苗文報，傳播科學知識。苗族學會用它通信記帳等。通過鄉村系統，在滇東北苗語方言區內得到普及，逐漸成為風氣。不僅學生，大多數苗族老人、婦女也能用苗族文字朗誦讚美詩和念聖經。苗族學者用苗文記錄大量苗族古歌、民間故事、詩歌、諺語等。

使得這個文字深入到苗族社會生活，真正成為本土化，成為本民族自己的語言了。借助老苗文，學習漢文、學習科學知識就不再像從前那麼困難，雲貴川邊境苗區許多苗族人能通讀《貧民夜讀課本》，據文獻記載，烏蒙山區三分之二的苗族當時就由此掃盲。[6]

4.2.2.3. 開辦光華小學 創立苗漢雙語教學

從石門坎教會的經歷改變，我們發現無論從那個方面去梳理，從世俗去尋根原，或從神學上找根據，都有一個避不開共同點；地荒寂，人貧窮。要將一個信仰植入人的內心，使他們懂得神是唯一的拯救，對於苗族人來說，講道理不如給一個及時見效的好處更能被折服。所以早期的宣教士和柏格理他們，在與四位苗族人第一次見面時就知道他們急切想要的是什麼，他們渴求命運的改變。苗族人自己也從識字這件事上懂得了知識是改變困境的途徑之一。正是看到了這點，早期宣教士和柏格理將教育、建立學校作為宣教的另一策略。

當石門坎教會建立的同時，石門坎光華小學同時開學了。它也是當時威寧地區唯一一所正規學校。學校推行新式教育使用國家規定教材。男女均收，同校授課。它是

---

[5]紅 沈, 石門坎文化百年興衰 (瀋陽, 中國: 萬卷出版公司, 2006), 131-132.

[6] Ibid.

> 我國近代最早男女合校的學校。
> 1913年第一屆學生畢業，到後來畢業的學生又回到石門坎教書，使得石門坎有了第一批苗族人自己的教師。
>
> 光華小學到1943年擴建成為中學，稱為“西南邊疆威甯石門坎初級中學”，也是西南苗區第一所中學。[7]

柏格理的口號是，“那裡有教堂，那裡就有學校”。宣教和辦學推動了鄉村建設，不斷成長壯大為鄉村教育體系，影響並輻射到周圍滇黔川三省交界地區近二十來個縣。在方圓七八百里的地區分設支堂和分校。到 1950 年前後，這些地區共有教堂 50 餘座，學校百餘所。從石門學校畢業了四千多名小學生，數百名高初中及中專生，30 多名大學畢業生，兩位博士（吳性純、張超倫）。

在教學上，除了採用國家規定的教材外，也同時用苗文進行教學。石門坎由此稱為中國第一個宣導和實踐雙語教學的學校。一百多年前，在石門坎用自己民族的文字，傳播福音和文化和科學知識，堪稱創舉。1908 年，由張道惠牧師主持，先後舉辦了兩期苗文訓練班，也兼學漢文，受訓人數多達四百餘人。以後苗文課正式進入學校的課程設置，直到解放前為止。

4.2.2.4. 注重少數民族人才的培養

與內地會不同，循道公會在辦學的思想觀念比較開放。為了宣教事業和教育在石門坎後繼有人，他們在自己學校的學生中擇優選拔，送到高等學院培養，並成

---

[7]紅 沈, 石門坎文化百年興衰 (瀋陽, 中國: 萬卷出版公司, 2006), 126, 129.

為教育規劃的組成部分，堅持長期付諸行動。在《未知的中國》中，王樹德有對這個方面工作的記錄：

> 1914年，從保證我們的苗族籍教師能受到良好訓練的觀點出發，柏格理送出苗族學生到四川省會成都的一所第一流水平的中學就讀。後來又派出2名青年，目的是讓他們接受西方醫學體系的培訓；1911年選派3名優秀學生去北京清華中學讀書（後因學校停辦，只得返回）；1913年又選送7名學生往成都華西中學就讀，4年後全部返回，成為教會的忠心同工。其中楊苒惠與王鳳鳴就留在石門坎光華小學任教。1916以後，先後選送了16名學生到昭通宣道中學讀書。[8]

其中吳性純中學畢業後被選送到成都華西協和大學深造。1929 年獲美國紐約州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成為了石門坎第一位醫學博士。後回到石門坎創辦醫院，並兼任光華小學第一任校長；朱煥章也就讀成都華西大學的教育系。學成回鄉，任光華小學校長。後創辦了石門坎邊疆民族中學，任校長。

> 石門坎小學和中學成為了當時循道公會在西南教區苗族教育的中心。幾十年培養了不少苗族知識份子。據不完全統計，到1949年止，由光華小學畢業的學生有數千人之眾。到石門坎中學和其它中學的有數百人，由這些學校畢業出來的學生，升入華西大學、雲南大學、中央政治大學、南京金陵神學院、蒙藏學校等大專院校的學生約30多人。[9]

4.2.3. 深入民間，瞭解民情，融入民俗

在哥林多前書 9:22 保羅說：“像什麼樣的人，我就做什麼樣的人。”保羅在面對猶太人和外邦人時，他總是前後一致強調“信”的必要性。目的是“為了福音的緣故。”（林前 9:23）也就是說保羅所採取的是更開通的宣教策略。他的本意

---

[8]人達 東, 滇黔川邊基督教傳播研究 (北京, 中國: 人民出版社, 2004), 276.

[9]貴州省地方誌編撰委員會編, ed., 貴州省志.民族志（上冊） (貴陽, 中國: 貴州民族出版社, 2002), 80.

旨在宣教的工作中，為了能讓外邦人更容易接受福音，儘量地不要求人行律法。[10] 我們從柏格理和早期宣教士的做法上，也是像保羅宣教一樣，根據當地人的習俗，只要不是違背真理原則的，他們都接納並融入到苗族人好的傳統生活中，用現在人的說法是更“接地氣”。目的是為了更加緊密的與苗族群眾打成一片，使得福音事工能快而順利的開展。

為了開拓石門坎教會及周邊教會的建立和福音事工，以柏格理為首及其它開拓者們，與他一道，親自深入到苗區和苗族人民家中，說他們的話，穿苗族人的衣衫，同吃一鍋飯，同蓋一張被。在深入調查民情中，柏格理和宣教士們尊重當地苗民的傳統習俗，並親自參與其中。他們同時在走村串戶中，親自為當地苗族人醫治病人，為他們所遇到的各種生活的問題排憂解難，也為他們精神的需要，最終帶領他們認識真正拯救他們生命的救主，從而歸給祂。因此柏格理深得苗族人民的信任和愛戴。當時苗族人和中國教會人士稱他為 “苗族人的救星。”[11]

4.2.4. 殷勤傳道，巡迴佈道，建立佈道團

在石門坎教會之前，長期駐守在昭通的柏格理已經意識到了宣教工作需要轉移方向。只是上帝還沒有為其開路。他們住在中國西南邊疆的烏蒙山區，宣教對象卻只是限於漢人中。而在這個地區的周圍，生活最多人則是少數民族的彝族和苗族

---

[10]俊蘭 董, 保羅的宣教策略 (臺北, 中華民國: 信福出版社出版, 1995), 139-140.

[11]人達 東, 滇黔川邊基督教傳播研究 (北京, 中國: 人民出版社, 2004), 53.

人。只是因為他們的歷史背景及生存狀態，遠離文明社會，被“邊緣化”。作為外國差會，循道公會因對中國國情並不十分瞭解，所以欠考慮，在宣教的策略上有脫離實際的局限。出於一種階級與民族性的本能反應，柏格理感知到了（柏格理自己也是屬英國的少數族群）。從這個時候起，柏格理對當時昭通地區的彝族開始感興趣，不斷的瞭解他們。他有意的學習彝語。為了與涼山彝族朋友處好關係，柏格理還專門雇了一個懂漢語的彝族人常住在他家，幫助他補習彝語。

> 1902年10至12月，柏格理跟漢族傳教員一起，三次沿金沙江旅行佈道。這其中的經歷可說是與死神擦肩而過。在一次渡江進入四川的涼山時，當地權勢因害怕傳教的工作，準備好了在伯格理渡江時將其殺害。但神的手一直保守著他們，因著彝族同道龍勇泉等的保護，脫離了險情，並順利的進到了四川涼山會理佈道和考察。12

在涼山的考察中，柏格理得到了涼山土目的認可，並願意賜官職讓他留在彝族人中間。這對於一個長年在等待中尋求機會事奉的柏格理來說，無疑是一次難得的機會。但是柏格理在禱告中感到，這種以利益摻雜其中的邀約上帝未必喜悅。他最終還是放棄了，等待上帝預備的時機。就如保羅二次宣教旅行一樣，“到了亞西亞的邊界，他們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穌的靈卻不許。他們就越過每西亞，下到特羅亞去。”（徒 16:7-8）才有了後來“馬其頓的呼聲”，保羅的宣教由此擴展到了歐洲更遠的地方。從保羅對聖靈所保持的敏感，也不難看出柏格理同樣對神帶領和對聖靈有著很敏感的提醒。確實我們也看到了後來神對他更好的帶領。

> 石門坎教會建立前後，為向更多苗族人宣傳福音。柏格理本人及團隊同時啟動了苗族佈道工作，更是殷勤下到周圍各鄉各村，巡迴佈道。年復一年地將時間投入到不

[12]人達 東, 滇黔川邊基督教傳播研究 (北京, 中國: 人民出版社, 2004), 202.

> 斷的巡迴佈道中。“他不是利用某一季節突擊或只在乾燥的季節進行此項工作。一年四季他都出去，走完這趟又是那一趟。”13

而且在石門坎教會，佈道始終是工作重心之一。開始是採取依靠當地漢人傳教員打開局面。隨之培訓當地苗族信徒，讓苗族佈道員在本民族中宣講福音並承擔管理教會的責任，效果很好，信教苗族人數增加極快。因為使用了苗族自己的佈道員，語言上、感情上更加契合，佈道的效率更高，信教人數更加增多。

到20世紀30年代，石門坎培養的本地苗族佈道員，不僅在自己家門口傳道，也在傳教士的幫助下，組成佈道團成為向彝族、水苗人傳福音的傳教士。

> 40年代，已經在水苗人佈道工廠建起了20座教堂和一些學校。在以後的幾十年中，後來的傳教士繼續這種宣教策略，相繼培養佈道員，組成佈道團，輪流換崗在各佈道點活動，最多時有四十多個佈道員。大大加快了教會工作的發展。到解放前，循道公會在滇東北、滇北、黔西北、川南苗族、彝族等地區形成了完整的體系，信教群眾達六萬餘人。教會隨著也進入了興盛時期。[14]

4.2.5. 推行公益、慈善、福利工作

在宣教的策略上，教會的健康發展離不開“傳福音與社會責任（或為文化使命）”兩大使命。然而，從“大使命”的觀點來看，傳福音、領人歸主，成為門徒是每位信徒不可推卸的使命。從我們福音派的觀點，在宣教策略上，應以“雙重使命”比較平衡的觀點去作。對於一個整全的福音，應該是代表基督徒對世人身、心、靈三方面的顧念。因此我們不應該忽視個人或社會的物質及心理上的需要。在石門

---

[13]人達 東, 滇黔川邊基督教傳播研究 (北京, 中國: 人民出版社, 2004), 217.

[14]人達 東, 滇黔川邊基督教傳播研究 (北京, 中國: 人民出版社, 2004), 221.

坎的宣教策略中，從柏格理開始，就非常重視這方面的運用，而且非常成功的結合在滿足信徒信仰上的需求。

4.2.5.1. 宣導文明生活方式，破除舊習，構築豐富多彩的群眾體育運動

在基督教的傳播過程中，宣教士與當地同工並成長起來的第一代知識份子，在石門坎大力提倡社會改良和文明生活習俗。這項工作還是由柏格理開始發起。柏格理是一個對生活充滿熱情，並且有聰慧頭腦的人，他特別有創新精神，勇於開拓。最先從破除落後舊習為首。教會規定男 20 歲、女 18 歲合理婚齡，並一夫一妻制，終止了過去遺留的走“耍花山、宿寨房”的亂性舊俗，避免了早婚和離婚等現象；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教導平等權益的思想。講究衛生，養成一種健康的生活習慣。由他親自組織建起了石門坎游泳池，幫助他們懂得講究衛生、避免疾病的好處。苗族人不再對奴隸主、封建領主必須俯首順從，對自然界一切的物性也不須磕頭跪拜。更不能敬鬼求神。教導他們只要信一位上帝就好了。如此一來，減輕了苗族人長久以來精神和物質上的負擔。

在推廣新型社會文化生活方面，柏格理發揮他熱愛運動的天賦、智慧和能力。除了在石門坎建起了游泳池，還建立起了一支苗族人的足球隊，這也是中國少數民族第一支足球隊。另外柏格理還有一個成功的創舉，就是將新的文體活動，納入苗族的傳統節慶端陽節，將學校和教堂作為集會的場所，給苗族人帶來一種新的生活。由此，以教會牽頭，組織每年一度石門坎大型傳統運動會，並將苗族傳統的一些舞

蹈、樂器、山歌等納入比賽中。周圍數百里的苗族人都踴躍參加，最多一次人數記載達萬人之多。

4.2.5.2. 建立苗族人自己的醫院

石門坎藥房是教會最早建立的慈善事業機構之一。柏格理進入石門坎苗族人中間後，發現因為生活環境惡劣，苗族人生病後無法問醫。柏格理懷著一顆博大的愛心，不久和太太就在自己居住的“五磅小房”建起了一個簡易藥房，兼給苗民看病拿藥。這極大方便了苗民，特別是婦女們的需求。因為這樣，苗族中生病可以得到及時的醫治，其它疾病也隨著柏格理她們平時對他們防病治病常識的講解，得病的機率大大減少。如此一來，參加做禮拜的人也增加了，而祭鬼請巫的人也大大減少。石門坎藥房在當時為當地群眾提供了相對先進的醫療條件，並逐漸改變著以往苗族人不講究衛生、有病求神的不良習俗。

> 到了1926年，吳性純畢業後回到石門坎，便將藥房擴建成為“石門坎平民醫院”。醫院的護理人員全部由苗族信徒自己擔任。他們大多畢業於昭通福清護士技術學校，有一定的護理知識。平民醫院的建立，標誌著苗族“病症延醫”可怕歷史的結束，也標誌著苗族人能夠運用科學觀念的手段，自己同疾病作鬥爭的進步。同時對教會的發展和苗族信徒的信心起到了促進作用。[15]

4.2.5.3. 麻風病的滅絕，貧病救濟

前三章在陳述歷史部分時，對於石門坎的麻風病有所提及。柏格理時期，他就開始關注和用行動對這群人進行幫扶。這是一種當時流行於當地和周邊可怕的傳

---

[15]坦 張, 窄門前的石門坎 (貴陽, 中國: 貴州大學出版社, 2009), 216.

染疾病。為了引起國際上對此事的關注，柏格理在國際刊物上發表評論，請求援助。因此也得到世界麻風病總會的回應，匯專款到石門坎教會委託教會救濟患者，並建立麻風醫院。但是因為在選址問題上的被阻，遲遲沒有建成。於是遂將這筆款項購買物品，發放給麻風病患者。在救濟的同時，也對他們開展管理：不允許麻風病人到處乞討，以免病源傳播。

> 直到1919年，由英籍宣教士張道惠，漢族教師鐘煥然、苗族佈道員楊雅各等繼續強烈呼籲，為完成柏格理生前願望而努力。最後終於購買到一塊荒地，於1920年開始動工修建，當即就接收了55位病人入院。準確的說，在當時的條件下，那裡只是一個麻風病人的收容所。1923年，麻風病院又得以擴建，並且在院內還建立起一座小教堂，供信徒禮拜使用。使得麻風病當時得到了控制，避免了病源的擴大和傳染。參與其中工作的有苗族、英國醫護人員。他們對待這些病人，學習耶穌基督愛人的質素，認真負責，絲毫沒有嫌棄之意，讓病人非常感動。[16]

到五十年代初，由人民政府接管。今天麻風病已經滅絕，現在還有個別那時患病還健在年老病人生活在那裡。去年當我們親自到那裡探訪一位麻風病老人時，當我們為他禱告時，他口裡還不時發出“感謝耶穌”的誠信話語。

4.2.6. 小結

以上各點，從宣教的立場看，是宣教士們在石門坎和周邊地區開展宣教事工的一些具體策略和方法。從宣教神學上說，我們認定：神是宣教的主宰；基於神的本性，父神的救贖計畫，是包涵所有種族和世代中。新約聖經是借著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死而復活，將神的救贖計畫顯明，要如何實現在全人類身上。祂的恩典和慈愛始終伴隨在宣教的每一個環節；最後，使徒行傳及其它書信中，強調聖靈如何

---

[16]人達 東, 滇黔川邊基督教傳播研究 (北京, 中國: 人民出版社, 2004), 289.

在世上運行，使神的救贖成就在個人、家庭及各民族人群中。這也是“三一神宣教學”的觀點。

在具體的人、地域中的處境，宣教中的策略，我們需要根據宣教學正確地分析石門坎教會的宣教。石門坎教會歷史的進程，柏格理和他後來的宣教士們，整個宣教思想和行動方向、操作和應用上，總體路線是正確的。因此才有了在清末，石門坎苗族迎來了幾十年福音的復興。這一切緣於基督教的傳入，宣教士的生命付出及苗族同胞的齊心協力。但我們也要注意到，基督教在不同的文化中，能夠切實地被傳開甚至被接受，一般來說，處境化的應用有神學上和文化上的不同層次。所以在本章中就是本著這個思路去進行的。

但是我們不能忘記，畢竟靈魂得救更是悠關每個人生命的大事，我們決不能本末倒置，只顧及人在物質及心理上的解放，而忽視了他更深、更基本的需要。所以，說千道萬，“福音宣教”才是目的，是收割的工作；“文化宣教”則是鬆土、培土、撒種的工作。正因如此，從整個石門坎教會歷史和宣教工作上，也有問題的癥結，在下章中會涉及論述。

4.3. 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的共同成全

石門坎教會最興盛的時期，從海外來的信件和郵件，只要寫上“中國石門坎”，就能在當時清末還沒設郵局的情況下，在西南苗疆石門坎即可收取到。從這件事上，就能看到石門坎教會當時的興盛狀況，它被稱為當時“基督教文化及西南

少數民族文化聖地”、“中國西南的耶路撒冷”。這是上帝在大花苗族人中間所施行的神跡和奇事，並透過宣教士們在神的親自帶領下來完成。

任何學科都承認教育和文化對社會和人文的改變，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文化在每一個地域的特質又有不同的自身表現。所以對文化的定義不同的學術領域也有不同的解釋。無論何種解釋，如果沒有解決生命的問題，任何文化背後的實踐都不能使社會變革和人達到一個最高境界的認識。這就是科學也不能企及的有限性、局限性。而任何科學和人類的進步最終目的要解決的就是人回歸到那裡的問題，所以往往探討從這方面觸及時，探討就止步了，也不能探討得清楚。基督教信仰就是要解決這個命題。所以；

> 在洛桑世界福音大會的Willowbank的報告上，則對文化提供了一個綜合性的定義：“文化是一個整合性的信念（對神或終極意義）、價值觀（對於真理、好壞、美醜）、習俗（如諺語、行為、服裝、工作等）及組織（如政府、法庭、學校、教堂等），這些因素能將社會結合在一起，並賦予它尊嚴、安全感、定位及延續性。”[17]

石門坎教會的建立和發展，在前幾章的歷史回顧中，已經很清楚地看到，柏格理包括後來接力的宣教士在福音使命的宣教策略上，從開始到被迫撤離中國前的幾十年中，至始至終都是採取“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並行的宣教策略。

4.3.1. 文化使命的內涵

現代一位改革宗神學院院長，教授、神學教育家這樣說：“ 神的主權彰顯在宇宙空間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個時刻；神是超越時空的。並且神對任何時代、任何

[17]祖鯤 莊, 宣教與文化 (Paradise, PA: 基督使者協會, 2004), 7.

文化領域，包括政治、經濟、教育、宗教、藝術都有說話，這就是文化使命的內涵。”按照這個定義，可以說 “文化使命”是生活的使命。而基督徒又是活在這個世界上，所以石門坎一百多年前，神藉著柏格理及其他宣教士，行駛祂的主權。文化使命的重點在“治理”這一觀念上，創 1:28 說，要“治理這地”。而終極目標“文化使命”要帶出的是“福音使命”的果效。在“治理”過程中，必須以文化的形式來表達，因為文化是傳遞福音的工具，福音需要從一個文化傳到另一個文化，這種傳遞的過程就稱為“處境化”或叫“本土化”。從文化入手，也是最切實、最容易打動人心的方式，進而達到傳講福音，帶人信主的目的。如果柏格理及其他宣教士沒有這個看見，在傳揚基督教福音時，只是按照西方基督教全盤照搬，“移植”到石門坎宣教的文化中，不僅行不通，也會“水土不服”。石門坎教會正是在“文化使命”處境化的運用上，很好地將苗族人傳統文化優良的部分進行更新、繼承、或重新改造後，並生活化地融進當地社會、苗族人最直接的日常事務中。同時也摒棄苗族人傳統中行巫術、拜鬼神及其他惡習和陋習等。從文化認同中找到與信仰價值觀相同的東西，提高了人的認知能力，思想意識的轉變，讓人懂得是非曲直，讓人有尊嚴，重拾人的自由。而循道公會一貫的宣教理念，就是重視信徒的世俗生活和社會實踐。這也是石門坎教會當時成功的原因之一。

特別拿石門坎辦教育這件事來說，首先從柏格理和他的宣教團隊，一切工作的重心是為著福音使命，傳播信仰，改變人的價值觀念。在這個基礎上第二才是文化知識的學習，這是一種途徑和方法。我們說，要得著一個人，首先要把他變成一個人，成為一個有文化、有道德的文明人，這個轉變的基礎是信仰。如果一個人沒

有信仰，沒有道德，沒有人格底線，可想而知，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他一定要嗎是一個社會的破壞者，要嗎是一個被文明社會淘汰的“垃圾人”，都是社會負面的隱患。如果柏格理和他們的宣教團隊不是以“大使命”為先，將教育理解為只是單純地傳授知識，忽略信仰與品德的養成，那只能將教育變成製造社會破壞力量和勢力的生產線。但是柏格理他們所做的世人有目共睹。

4.3.2. 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的關聯

直到今天，“福音使命”與“文化使命”，這兩大使命孰先孰後，神學界依然在爭論不休。今天華人教會中，很多神學界學者或牧者、信徒認為，華人教會是沒有文化使命觀念的。即使有提到，也是觀念很淡薄。有學者分析說這與早期受倪柝聲屬靈觀的影響分不開。這種觀念的主要思想認為：世界跟神的國、神跟撒旦是對立的（聽起來好像沒有錯），這只是暫時的，也是神許可的。所以他認為今天的世代並不重要，重要專注在靈性的操練。就是把人扣守在教會裡，與世界完全脫節。太 5：13 說：“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基督徒一定要進入世界發揮光和鹽的作用。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在差派宣教士上，海外機構、教會比華人教會做得好。他們向世界各地差派宣教士將福音擴展到未得之民、未得之地。柏格理他們就是當時被差派來到中國的宣教士。在宣教策略上，他們倡導“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並重原則，在當時成為一種“宣教”模式，在西南邊疆得以推廣。時至今日，“雙重使命”已經成為宣教的重要內容。其實，就“整全福音”

是代表上帝對世人身、心、靈三方面的全人關懷和教育而言，我們決不能漠視個人或整體社會的物質及心理上的需要，所以文化使命是必須的。

“文化使命”的目的，就是要帶出“福音使命”的果效。“福音使命”是生命的使命；“文化使命”是生活的使命。因此必須先有“福音使命”，帶出信仰的生命；生命又一定要帶出生活，這兩者是息息相關的。這麼說，“文化使命”是“治標”，“福音使命”才是“治本”。然而我們從宣教歷史分析，兩者必須“標本兼治”。就如雅各書 1:14、17 說：“我的弟兄們，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心，卻沒有行為，有什麼益處呢？這信心能救他嗎？這樣，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如此，生命與生活是一致的，這兩個使命是合一的循環的整體，是不可分割的。有一則現實比喻對“福音使命、文化使命”的關聯闡釋的非常貼切：“正如為車禍受傷的人進行急救時，止血只是治標的手段，真正治本的是要開刀或接骨等。但是救護車來的時候，總是先做止血及綁繃帶等的工作。因為不這樣，病人可能在上手術台之前已經就沒救了。”

4.3.3. 石門坎教會信仰根基

“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太 16:18-19）信仰的根基建築在教會是否上帝親自設立、基督耶穌是否教會的元首上。“教會”這個字在希臘文的意思是“被召出來”，從字面上理解，“教會”其實是一群人，但不是一群普通人，而是為了敬拜上帝從世界中呼

召出來，也是從撒旦手下救出來，成為在基督裡的人。他們有新的生命；這群人也包括古往今來一切信主耶穌的人。由於這樣的特別身份，這群人的生活應與未信的人有所不同。然而，教會又分有形教會和無形教會。有形教會就是看得見的人在教會聚會，但不是每個進入教會聚會的人都得救；無形教會卻是包括所有真正得救的基督徒，有過去的、現在的、將來的。而且真正相信上帝的人，是不可能從救恩中失落的。

石門坎教會建立之前，大花苗族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他們也從來沒有想到，有一天，他們的生命會跟教會連在一起、跟永恆連在一起。柏格理和他的宣教團隊給石門坎帶去了兩樣最寶貴的東西：一個是基督教的信仰；一個是現代文明的文化教育體系。通過信仰的傳播不僅使大花苗族從最貧困處境中解放出來，更重要的是他們得到了永生生命的福音。而將文化教育在石門坎系統化的佈局，著實有更長遠的宣教理念。至於柏格理及其他宣教士們，從他們的經歷和生命的人格表現上，對信仰的持守和堅定，看到的是他們身上有耶穌基督在他們裡面活著。所以他們所傳講的是耶穌基督福音的真信仰。

大花苗族人在信仰的追尋中，有著不同的人生階段和經歷。這與他們民族的歷史背景和生存環境有關。在基督教傳入之前，滇黔川苗族信仰自然原始宗教。其崇拜的對像是自然神，主要的宗教活動為驅鬼辟邪、祭神跳魂等。又因為苗民傳統生活中靠農耕、狩獵等維持生存，所以他們敬天地，敬自然為神也就不足為奇。男性、女性巫師在他們的社會生活中相當普遍，也相當活躍。苗族人的思想觀念中，認為“萬物都有靈。”所以要他們只相信這世界上只有一位獨一真神，是一件不容

易的事。但是藉著神的手在中間奇妙的作為，在很短的時候，基督教就在石門坎及周邊地區迅猛地發展和復興，這是上帝特別地眷顧。然而都是通過人手所做實踐出來，不免也有失誤的地方，在策略上和方法上總還是有他們的問題。

> 比如說有的苗族人，是為了自己的好處加入教會。當最後發現《聖經》並不是醫治他們所有苦難的萬靈藥，一些人對基督教便產生了懷疑和失望；有些地方教會在社會變革中，苗族一些傳統的活動被廢止，一些人認識不清，懷念往日的生活，也對信仰產生抵觸；總之不是每一個人在接受基督教的動機上都是一樣的，特別像石門坎這樣一種環境的苗族群體，在信仰認識上有不同目的的摻雜，也難免。到了後來石門坎教會隨著宣教士們，再很少有像柏格理等宣教士那樣常住石門坎，與群眾接觸也不多了，宣教士與苗族人之間也沒有以前一樣的深厚感情了，這些也是造成信徒的信心減弱的因素之一。教會是有責任的。[18]

然而新中國成立後，因政府的幹預和打壓，特別是解放後歷次的政治運動，使得石門坎人、教會都受到了極大的沖擊。很長一段時間教會完全癱瘓，沒有任何的教會生活，由於“擊打牧人，羊就分散”（亞 13:7）。信徒因此更多的離開了信仰，也有個別教會轉入地下。但是神的工作並沒有停止，在那個黑暗的年代，我們仍然看到為捍衛真理和信仰的苗族信徒，為所信的甘願受苦遭害。而正是他們對後人的激勵，為神保存下了一批精英分子，預備了福音種子。

4.3.4. 小結

石門坎教會非常清楚並看重耶穌基督所賜下的“福音使命”（太 28:16-20），這也是宣教的最終目的。“福音使命”所結出的果子是基督徒，是生命的使命。神的工作沒有難成的事。宣教士們通過在宣教策略上的運用和調整，克服一切外在因

---

[18] 人達 東, 滇黔川邊基督教傳播研究 (北京, 中國: 人民出版社, 2004), 234.

素的阻擾，以“文化宣教”開路，而達到“福音使命”得以在石門坎大花苗族人中間落實。所以，筆者個人認為石門坎的意義在於：以信仰為核心的傳播，通過“雙重使命”並行的宣教策略，把人從“巫文化”中解放出來，最終歸到基督教獨一真神的信仰之中。整個宣教有計劃，有坐標，以文化建設、鄉村建設為出發點，構建紮實的信仰基礎。從此改變人們思想觀念，將信仰深深紮根在這片土地，並苗族人民心中。

4.4. 宣教事工的威脅

新中國建立後，一切機構和組織歸入政府的管理權之下。宗教組織和團體同樣成為政權改造的對象。這段時間（1950-1979）到改革開放前的近三十年中，中國教會經歷了不平凡的歲月。歷次的運動，一次比一次更強的逼迫，基督教被扣上“外來文化的侵略”， 基督徒被扣上“帝國主義的走狗”等的頭銜，加以遏制 。而本來就經濟薄弱，人才缺乏的苗族教會漸漸走入低谷，走向蕭條。特別是“三反、五反”，以及“文化大革命”的肆意衝擊，使石門坎這個在“搖籃”中新生的嬰兒悄無聲息的夭折了。

> 這一階段，許多苗族人背教、叛教、反教、傳道人被抓乃至被殘殺。以石門坎為中心的循道公會幾乎銷聲匿跡了。如此這般，其中原因是什麼呢？為什麼石門坎經歷了從文化邊緣一躍上升到文化中心的歷史，也因為它又從文化中心跌落到文化邊緣的現實，人們眾說紛紜。經濟學者觀點是：經濟貧困導致教育的落後。另外一種說法是，政府重視不夠，石門坎教育發展滯後，這是政府部門的思路。[19]

[19]紅 沈, 石門坎文化百年興衰 (瀋陽, 中國: 萬卷出版公司, 2006), 92.

如果說導致教育文化低落的主要因素是經濟貧窮，那麼石門坎宣教士去到前經濟也很貧窮，但窮人求學的渴望、窮人辦學的積極，石門坎文化成就就是在這種貧困地經濟基礎上取得的；如果說是政府重視程度是教育發展的關鍵，20 世紀 50 年代以前石門坎學校一直也不是公辦學校，政府投入無從談起。那石門坎興盛和蕭條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沈紅在她的《石門坎文化百年興衰》中的總結就是最好的答案。她說：

> 宗教（基督教）的群眾基礎，在於它能夠使得苗民切實感受到有利於自己掌握本民族文化。由於有了這個基礎，基督教才能夠在環境艱苦的烏蒙山區紮根，現代教育才能夠嵌入貧困社區，苗民的主體要求才是外來文化的生長點。[20]

而失去了這個基礎，就如“多米諾”骨牌效應一般，被層層推倒。

4.4.1. 內在威脅

從國民黨當政時的 30-40 年代起，石門坎教會因成績斐然，在當時得以揚名。原本對邊遠少數民族少有過問並疏於管理的國民黨政府，開始對其進行管理。因為基督教的建立和在苗區工作所帶出來好的社會風氣和人文的進步，以致官府也只是形式上過問，教會和福音的工作還是繼續運轉。新政權的進入，一切都不一樣了。

> 我們的工作業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對於將來可能發生的事情則無法予以描述。在今天的苗地，有將近四十個有組織的教會，擁有8300名教徒和詢問教義者，開設學校三十餘所，享受津貼的在校生1400名……今後五年時間的目標是，發展2500名新教徒，使基督教社團增至5000個。作為規劃的一個部分，要實現每天晚上有每兩家人合為一體進行祈禱，使每一戶都有一部《新約全書》與讚美詩詩篇。計劃使我們

[20] 紅 沈, 石門坎文化百年興衰 (瀋陽, 中國: 萬卷出版公司, 2006), 161.

> 學校的在校生達到3000人。要使更多的漢族人與諾蘇人（彝族）聽到對福音的宣講，計劃還包括建立若干有護士負責的石門坎小醫院下屬的醫藥分點。[21]

危難關頭，人人受到考驗。教會也一樣，在相對平穩的環境中，推行一項工作或計劃較為可行。但是，當外在的形勢處於強勢，又產生威脅時，教會和信徒要如何應對，就能成為檢驗教會是否成熟的試金石。或許代價很大，但是神通過祂自己的方式要顯出祂的聖潔。

4.4.1.1. 宣道士離境 後繼無人

從 40 年代末，宣教士們就看到形勢的嚴峻。當時內戰頻頻，人心不穩，社會動蕩。石門坎又處於偏遠山區，經常土匪出沒攔路搶劫。加之這時候宣教策略較前已經有一些的改變和調整。而對於信仰的追求，人們也因為局勢的不定，對教會不再熱心和投入。加之新來的宣教士不像老一代那樣能說苗語，也不常在石門坎住，與信徒脫離親密關係，感情也就與苗族人淡化，苗族人對宣教士的信任度與信心都大為減小。到了新政權的成立，政府首先將宣教士遣返離境，直到 1952 年，宣教士全部被迫離開中國。

因為宣教士的離開，石門坎當地所培養起來的苗族佈道員，先後也紛紛離職，使得石門坎教會沒有人接替管理和繼續牧養責任的領頭人。從這裡看，石門坎教會

[21]格理 柏 et al., 在未知的中國, trans. 人達 東 and 旻 東 (昆明, 中國: 雲南民族出版社, 2002), 435-436.

在應對情況變故、政治環境和突發性事件等的發生上面，有他們疏忽的地方和要承擔的責任。

教會就信徒生命的關懷缺乏瞭解和真切的關懷。雖然傳講的是神的道，但是每個人的成長，是根據每個人接受的認識程度不同長大的。特別當環境變化時，教會更因對信徒個人的生命和生活關懷，使他們在困難時，教會成為他們屬靈的幫助。

宣教士離開中國後，宣教應該沒有離開。然而石門坎教會卻整個事工團隊隨之離去。這裡看不到教會繼續發展的道路上，有什麼具體的計劃、策略，觀念上也沒有跟上而缺乏。我們不知道當時為什麼這些當地的佈道員要離開（文獻未查到），但是這件事的發生，教會一定有責任。一個健全的教會，對於牧養和教會各項事工都有整套的安排和部署。而佈道員也應該是一支在屬靈生命成熟的基督徒隊伍，所以石門坎教會在事奉團隊的管理上是需要反省的。因為他們的離開，成為教會很大的虧損，因為教會的群羊無人牧養。在當時一種政治環境中，信徒多麼需要牧者去堅固信心，給予力量。

4.4.1.2. 信仰的的動搖

石門坎教會的信徒絕大多數是苗族本地本族人。建國以前，大花苗族幾乎都信了主。但是從建國後到改革開放前，資料和文獻反饋，苗族信徒的比例都在下滑，其中不乏為名義上的基督徒。可見，人是有問題的，教會更應該知道問題的關鍵在教會。分析其中原因發現：一百多年前，當柏格理將福音帶到石門坎時，一個從來沒有被人尊重的民族，千百年來背負著屈辱，突然來了一個愛他們、尊重他們、並

為他們排憂解難的外國人，又因為他的信仰，改變了他們的生存境況，所以當柏格理將福音傳講給苗族人時，他們其中可能有很多是出於感謝柏格理這個人，而相信了耶穌。他們就是將柏格理當作“救星”，所以他們或許不是相信上帝，而是相信柏格理這個人。在《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區的傳播史》一書中就這樣記載：“柏格理被譽為‘苗族救星’、‘苗族之父’或‘拉蒙’（苗王）等，受到信徒的頂禮膜拜。”[22] 苗族人將柏格理當作“上帝”來跟從了。所以當柏格理在石門坎去世後，他們信仰的支撐仿佛頃刻倒塌。所以，這其中或許會影響到信仰是否堅定等等；柏格理及他的宣教團隊在石門坎教會的建立和發展階段，開始的幾年，主要的宣教路線放在擴展教會和周邊苗區的福音事工上。對要求成為基督徒的苗族人，也不是隨便就能給以施洗的。《在未知的中國》中有這樣一段話：

> 從願意成為基督徒的上千群眾中選出100個人，他們是100個最為正直與誠實的人，當然還需當眾通過審查。……我依次向他們突出兩個問題：‘你希望被施洗嗎？你願意成為上帝的孩子嗎？’他們回答得都很清晰。當我們完成老者們的程式後，就把他們帶到講臺上，每個要求行洗的取得候選人資格的人，在洗禮前都要接受他們的審查。[23]

所以，石門坎教會是注重人的內在生命的。但是後面的宣教士是否對信徒在信仰根基的教導上面有更多的要求，從我們知道的歷史，看來有放鬆的成分。後來就是作為牧者自己都有所鬆懈，加上後來形勢越來越對基督教不利，教會內部在對信徒的要求上也有所妥協。新中國成立以後，形勢對基督教越來越收緊，殘酷的打壓，特別是教會很長一段時間不得不停止所有活動，信徒的信心更是受到不同程度

---

[22]和平 秦, 基督宗教在西南少數民族中的傳播史 (成都, 中國: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3), 168.

[23]格理 柏 et al., 在未知的中國, trans. 人達 東 and 旻 東 (昆明, 中國: 雲南民族出版社, 2002), 550.

的影響。石門坎，就連以前由教會親自培養的一些老師、信徒等，都不再信基督教了。

4.4.1.3. 團契的崩潰

教會最重要的特點之一，就是基督徒的“團契生活”。石門坎教會興盛時期，毫不誇張地說，在基督福音的感召下，主日都有成百上千人聚集在石門坎做禮拜。並且兩天一次的禱告聚會也成為苗族信徒喜愛的一種生活方式。因為主耶穌應許我們，“因為無論在哪裡，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太 18:20）一個基督徒，必須有正常的團契生活。我們的屬靈生命需要在團契成長，通過信徒彼此的交通，在主裡彼此相愛，彼此勸勉；在真理上分享神的話語，在信心上建立與神與人親密的關係。我們從有限的文獻記載中，找不到更多有關石門坎教會信徒們教會生活，特別是團契生活的記錄。但是當社會發生變革時，當教會內部人員受外界幹擾，而引發突變時，石門坎教會在有效的應對上有很大的缺乏，從另一個角度上就可看出石門坎教會的組織管理和教會信徒生活都存在問題。

一個成熟的教會，在任何環境中，都有應對局面的措施，有神的帶領。如果教會失去了它應有的功能，發生在柏格理後，石門坎教會開始產生問題，首先從牧者到其他的佈道員紛紛離開石門坎，凝聚力慢慢消失，就是必然發生的結果。

4.4.2. 外在威脅

追溯到柏格理來中國前，都離不開內外個因或阻力的影響。而他的決斷，最後並不受外在因素的影響。不是沒有思考和內心爭戰，最後在選擇神還是選擇世界，他用行動作出了決定。所以環境不是問題，信仰的力量才是他心中發動的主因。因此柏格理和他的宣教團隊在石門坎的成功是必然的，因為這是上帝所開的路，不論曲崎，險阻，總能促成。但是在過程中，不同的人，不同的教會有選擇，這就是人的有限。所以才有了教會在各種環境中的狀態，興起、不前、失敗、再站立……

4.4.2.1. 世態、政局的改變

20 世紀開始，到新中國成立前的近半個世紀中，中國社會、政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王朝壽終正寢，孫中山發起的辛亥革命建立起了中華民國。這期間，內戰不斷，軍閥割據，百姓生活塗炭；加之天災人禍，人民生存環境更是雪上加霜。又由於在此期間，外國勢力的擴張，特別是日本的入侵，民不聊生。中國人期盼政權的改變。而深處邊遠的石門坎教會，也正處在這樣的時段中。教會必然會受到衝擊，是難逃幹係的。

1915 年柏格理去世，1926 年張道惠夫婦因患風濕病回國，這意味著石門坎一個時代的過去。石門坎老一代宣教士，可以使用漢語、苗語佈道，用苗語與苗族群群眾交流。幾位宣教士長期與他們生活在一起。到了 30-40 年代，情況明顯改變。教會再也不能恢復到柏格理時期的盛況。好在這個時期仍然有宣教士在石門坎事奉，

雖然不如前面的宣教士們那樣的獻身，但他們所處環境，比起柏格理時期，是更加複雜和艱辛。在這種情況下，教會還在繼續運作，並在緩慢中前進，實屬難得。

從教會增長的觀念來看，有外部的客觀局限，而自身沒有突破的創新也是原因之一。我們從石門坎教會可以看到這樣的一種情形。30—40 年代，社會已經發生了變化，石門坎也發生了變化。苗族人因為接受了文化、接受了信仰，他們的需求也與以前不一樣了，他們思想需要更新。教會在提高信徒的生命的長進和生活的需求上也有不同方式的帶領。還有牧者們各自的恩賜也不一樣，教會在整個管理上都須有一個調整。這也許是我們對石門坎教會當時的看見。

而時局的改變，也對教會工作的是一個新的課題，需要對原有的管理模式進行修正。柏格理後面的團隊在這方面的工作，從文獻上看不到很清楚的表述，這也可能是石門坎教會發展緩慢因素之一吧。

4.4.2.2. 新中國成立後到現今，宗教管制下的石門坎教會

對中國基督教來說，從新中國成立到現在，是處在一個既特殊又尷尬的時期，更多時候中國的基督教信徒是在狹縫中生存。這種情況顯然不正常。歷來政府對宗教信仰就有明確的條文。寫於憲法的三十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國處在一個與外界完全隔絕、封閉的環境中，“愚民”政策生效。國人竟然對黑白顛倒的事實，堅信不渝，實在可怕和可憐。今天隨著中

國向世界開放，一件一件的歷史真相正浮出水面，雖然還有很多我們不知道的事例，然而真相是已經用生命寫入歷史的，任何人無法篡改，也不能隱藏，因為上帝知道。終有一天，上帝作為最終審判的“大法官”，祂會公正實行審判！

4.4.2.2.1. 文革前歷次運動

> 隨著土地改革運動和肅反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烏蒙山的苗族也被這股風吹入隨行，而政府對宗教政策的一貫不倡導，石門坎教會逐漸走向蕭條。到1954年，原石門坎聯區範圍內苗族信徒人數比1951年下降了一千多人。從此這種“滑坡”再也沒有停止。到1956年，原該聯區相同範圍內苗族信徒又降為5028人。[24]

特別在肅反運動中，石門坎自己培養出來的教育家朱煥章，這位曾任光華小學校長、石門坎邊疆民族中學校長，多次拒絕在國民政府任職的苗族虔誠基督徒，因為不願害人害己，在被懷疑心存反叛的情況下，1955 年 12 月 12 日，在省城的黔靈山，果斷地辭謝了世人。[25] 還有仍然在石門坎教書的張文明等也在運動中受衝擊、迫害。這些的運動使得苗族信徒看不到上帝的愛在那裡，失望、離開，教會也不再有人進入。從這個時候起，苗族人有的不再信仰基督教。

到了“人民公社”及“大躍進”運動，對農村的打擊更大，信徒人數更是直線下降。到了六十年代，先後又有許多支堂因參加教會活動的人太少，教會開不起來，乾脆停止了教會主日敬拜。而 1964 年左右，石門坎中心教堂也因為人數太少，有組織的教會活動終於完全停止。隨著老的本地傳教士和老信徒的自然死亡，現今在烏蒙山區苗族村寨，再難找到一個堅持信仰循道公會的信徒。

---

[24]坦 張, 窄門前的石門坎 (貴陽, 中國: 貴州大學出版社, 2009), 234.

[25] 禮柯 藏, “石門坎公僕朱煥章,” http://www.shimenkan.org/book/, July, 2005, accessed July 5, 2017, http://www.shimenkan.org/book/rice/zlk/.

4.4.2.2.2. 文化大革命運動

當文化大革命以席捲之勢開始時，中國一切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都遭到徹底的否定。教會和信徒經歷了從未有過的打擊和迫害，從上至下如滾地毯般地不留死角。石門坎也成為當時“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重點進行肅剿。其實經過了前面幾十年的各種政治運動，基督教在石門坎已經“消失”了。然而上帝已經在石門坎動了善工，祂的工作就不會停止。從教會歷史上看，每次的宗教逼迫，就會出現一批為捍衛真理而戰的精英分子，堅守信仰，等候那時辰的到來！就像路加福音 8:15 在解釋撒種的比喻時說的：“那落在好土裡的，就是人聽了道，持守在誠實、善良的心裡，並且忍耐著結實。”所以我們看到以王志明為代表的苗族基督徒，為了堅持信仰，捨下了生命，成為後來更多基督徒的激勵。

> 1974年7月28日，威寧興隆公社牛角井苗族信徒在山洞中秘密聚會敬拜，被武裝民兵發現後包圍，發生了流血事件。事件引發一種“反彈效應”，激發了苗族民族情緒和宗教情感的爆發。特別在葛布苗區，出現了你越不准信教，我就越湧向教會；你霸佔教堂，我就在山洞裡敬拜；你沒收《聖經》，我就有心靈和誠實敬拜。越打壓，基督教反而在秘密、分散的狀態下在那個地區得到發展。在石門坎也同樣有蘇科寨教會敬虔的信徒轉入地下教會活動。上帝通過這樣的方式，預備屬祂的子民，在時候滿足的日子。[26]

在保羅的宣教中，他常常提醒我們：“不要認為宣告基督得勝，我們就可以逃避苦難、軟弱和死亡。連保羅自己雖然很有恩賜，但是也做見證說：

> 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林後12章）保羅對自己有深刻的認識，他知道在事奉上常常靠主得勝的秘訣。[27]

---

[26]坦 張, 窄門前的石門坎 (貴陽, 中國: 貴州大學出版社, 2009), 239.

[27] 祖鯤 莊, 宣教神學 (Paradise, PA: 基督使者協會, 2004), 79.

所以他還說："我們有著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著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至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到了，卻不至死亡；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林後 4:7-10）

4.4.2.2.3.改革開放後的石門坎

石門坎真正開放是從 1995 年後。柏格理及宣教士的後人回到石門坎祭奠和緬懷他們父輩，由此，石門坎才得以正式向外界開放。這個階段，政府重申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所以石門坎和下面村寨開始恢復了教會的活動。但絕大多數教會還是經過政府批准的"三自教會"。2004 年 3 月，由澳門一福音機構出資，重新建起了石門坎中心教堂。到 2005 年 11 月完工。現在每到週日，石門坎教堂就聚集了周圍村寨的 200 多信徒前來聚會。據瞭解，二十多年來，雖然教會有了，海外和國內一些福音機構和愛心人士也不斷有對石門坎教會經濟、物質，以及人員的支持，但是這些幫助還是沒有帶來實質上的改變。而教會也看不到屬靈的復興。

但是從這些樸實的苗族信徒的眼神裡，我們看到一種虔誠。只是他們需要有人在真道上的餵養。今天這些信徒大多是後來跟隨前輩信主的，不是像當年柏格理時代是按照循道公會所遵行的教義去要求信徒的。所以對於所信的，在真理上的認識還需要再教導，這不僅是石門坎教會信徒所缺乏的，這也是整個中國信徒屬靈生命的渴求。

看起來，外部環境已經鬆動，然而對於中國政府在政策上的執行和理解，這個國家對宗教上實際的態度，中國教會和牧者需要有智慧地去開展牧養的工作。對於中國教會，包括石門坎教會任重而道遠。

4.4.3. 小結

以上分析，石門坎教會在興盛了近五十年的後，逐漸走下坡路，到最後完全沉寂，外部的影響當然是很重要的因素。在一個極權的政治環境中要生存，非常難行。我們已經從為信仰獻身、殉道者們的身上看到世界的殘酷。所以石門坎教會走到今天的光景，也是有它自己的原因。也許有人會感到可惜，今昔的天壤之別，何必當初！然而，筆者不這樣看，上帝的門，“開了就不能關。”這其中神到底要我們學習什麼？石門坎教會是神親自打開的福音大門，這道門祂從來就沒有關，只是你我還沒有準備好。但是我們從朱煥章、王志明等其他敬虔基督徒身上，看到為信仰而活、而死的一種盼望，更感一種使命在身。而當下我們要做的，就是要從這些經驗和失敗中，從聖經中更明白神的心意。多一些敬虔、執著、勇敢和擔當，然後踏進去，繼續柏格理、宣教士們及為主殉道他們所走的路。

第五章

結論

本文起於筆者對鄉懷的情結，在偶然的機遇中，親臨走訪了貴州石門坎。這看似偶然一次的旅行，但每件事都串連在一起時，筆者恍然大悟，石門坎這個地方，從聽說、知道、走訪到現在作筆時，其實都是神早就安排的一段屬靈生命旅程。深信這段旅程將會繼續下去，直到神的完全意旨成全。

在筆者即將要結束旅美學習神學之際，特蒙書寫論文期間，神開啟了石門坎的事蹟經過，讓筆者受到極大的震撼和啟示，這也是石門坎教會作為論文課題寫作的主導原因。

就在完成學習之際以及本課題研究的尾聲時，筆者心靈受到的震撼，言語難於形容。看到神竟然在極度荒毀、被人遺忘的鄉土，邊陲野地，在大花苗族人身上作了一件如此輝煌的大事。世移人遷，變動無常，在魔鬼和黑暗勢力長期倡狂擄掠下，石門坎竟然在有意無意中，從千年沉睡中被發現，唯一的解釋，只有一個可取的註解，就是聖經所言："凡事都有定時。"（傳 3:1） 其實從最初四位大花苗族捕獲獵物，從被漢人搶奪欺淩，偶遇宣教士党居仁，路見不平，出手相助，給他們寫訟狀，使他們得以平反。 這事挑起苗族人渴求党居仁教文學字，接著推薦他們求助柏格理。 這一切看似偶然，其實都是神在苗人和柏格理及宣教士之間搭起的一座福音橋樑，都是圍繞神永恆的計畫推進。當時滇黔教區領導正因為十七年耕

耘未見有果效，為宣教士的去留憂疑。柏格理也在彷徨之中，卻依然以神的心為心，渴求神的引導。就在這危難時，神竟率先給他如此機遇，真是奇妙。他因此前往苗族境界，此後他長居苗族烏蒙山區，獻身苗族。設教、建校、創制苗文，開發苗地教育、福利、醫療、環保……全然投入。在清末民初期間，經過數年辛勞，殷勤耕耘，十一年終見黎明，創造了人間奇跡。接下來的幾十年間，他的宣教團隊繼續追隨神帶領的足跡，在那裡為福音工作，苗地竟然成了“人間天堂”，為中國帶來了無限的福祉。苗人這段歷史成為中國眾民族的榜樣和希望。在這裡，基督教事工無論在經濟、文化、教育、民族傳統、政界等，都有相當的貢獻，這一切讓屬神的人，處處看見神的手細膩帶領，真叫人拍案叫絕。

在結束本文前，從回憶第一個來華的基督新教英國宣教士馬禮遜（1807 年）開始，中國基督教 200 多年來的歷史發展過程中，跌宕起伏，經歷了無數次血與火的洗禮。從 1814 年蔡高成為中國第一位基督徒，發展到今天，資料評估，中國境內基督教信徒，可能人數在八千萬到一億多人。當初有人以輕視的口吻對馬禮遜說：“你以為靠你一個人，就可以改變中國過去五千年來對於偶像的崇拜嗎？” 馬禮遜有一句名言回答道：“我不能，但我相信神能。”

結合中國教會，在經歷了逼迫、試煉的幾十年中，正在覺醒和成長。如今中國基督徒已經集合成了一股力量，正在中國這片廣闊的大地上，繼續著傳福音得著失喪靈魂的拯救工作。作為被拯救的蒙恩罪人，因著神對自己諸般的恩典，有機會來到“國際神學研究院”裝備，為的是準備有一天回應神國的呼召。這一切都是在

回應一個聲音：“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我說‘我在這裡，請差遣我！”（賽 6:8）

作為這個時代的基督徒，深思信仰在人和世界之間，我當何為？理當敞開心懷，接納神的託付、神的呼召。

筆者通過對石門坎教會的歷史回顧，並從第四章所提述的研究，得出了一個結論：

“石門坎現象”絕不是偶然發生的，一切都在神永恆計劃中。在神的時間裡，看到神的手，並在祂親自的安排中，藉著以柏格理為代表的宣教團隊叩開了石門坎福音的大門。雖經歷風雨，石門坎教會今天那“魂魄回歸”的腳步已經再次啟程。

神以祂的全能，借著在地屬天的忠心門徒，在中國播種、培育、收割。 在此筆者本著這個結論，同時結合中國基督教發展形勢及石門坎教會現狀，對石門坎教會作出一個回應的提案：

5.1. 重振石門坎教會的提案

5.1.1. 重新樹立信徒信仰根基，構建石門坎教會

石門坎教會今天的狀況，直接受到了大環境影響。上世紀改革開放後，石門坎教會是恢復了聚會，信徒也開始參加敬拜，但由於在“三自”的體制下，教會功能難以發揮。首先是真理教導的缺乏，其次是教會管理的鬆散。如果教會裡，基督不是中心，沒有神的道，聖靈不作工，信徒生活缺少美好見證，就不是一個健全的教會。教會要發展增長，就要使信徒在所信上有根有基，教會自身必須有其不能逾

越的原則。教會既然是神的子民，是基督的身體，是聖靈的團契，就要發揮身體的功用，所以一定要先有眾肢體的合一。石門坎教會雖然有過非常輝煌的歷史，必然有神保存了的餘種，但是解放前柏格理時期的教會模式已經完全棄除，而今天教會又處在一個特殊的管理體制下，要重現當年石門坎教會的興盛境況，沒有一支好的帶領隊伍，沒有勇於擔當的牧者，要開拓何談容易。石門坎教會這時需要牧者和信徒用智慧來管理教會，制定發展規劃。筆者感到，石門坎教會當務之急是建立信徒的生命根基，完善教會管理機制等。

5.1.2. 跨越文化的溝通，有效的傳遞福音

“福音處境化” 在宣教神學中從來就是重要且有效的策略之一。柏格理及續他而來的宣教團隊，當初在石門坎就是從苗族人最薄弱，且最需要的文化教育入手，他們找到了一條適合福音傳播的切入點和通途。文化差異會影響資訊的傳遞，因為每一個社會都是透過自己的語言及文化來看世界。而每一種文化都有不足和偏見。因此跨越文化的傳達和溝通，絕不是容易的。[1] 何況石門坎苗族本身有著他們民族延續下來的傳統。雖然一百多年前，宣教士們在這塊土地上對他們一些陳規陋習進行了改造和棄除。但從五十年代到後來幾十年的政治運動中，一些舊傳統又死灰復燃。

---

[1] 祖鯤 莊, 宣教與文化 (Paradise, PA: 基督使者協會, 2004), 127.

信仰是關乎價值觀的問題，也是文化中最深層的部分。在一個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環境和人文下，在他們的世界觀中，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介紹這位獨一的“三一真神”。 要使石門坎的福音從苗族人心中重新“活過來”，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應該有一批宣教人，無論是長期或短期願意投身石門坎服事的宣教人，不能僅靠愛靈魂的熱情，乃是要將根紮下去，對宣教有深刻的瞭解。深入體察民情，從民族性的角度向苗族人比較其中的差別，在科學與信仰的衝突中，找到有力的論證，並用最淺顯的方式，戳穿偶像和“偽科學”的神話，使他們直觀地明白真理。站在苗族人民的生活習慣上思考，如何用他們聽得懂、看得明白的方式進行信仰的傳輸。苗族人天性單純、熱情，中國人一貫強調人際關係。宣教人可以在這個方面敞開胸懷，就如當年柏格理一樣，與他們建立“魚水情”般的關係，使苗族人能有一種認同感、親密感。從而在傳福音中可以彼此信任，產生共鳴。

從保羅的宣教策略中，可以發現他非常關注宣教與當地文化的結合。但真理的載體，“文化”，卻是相對的。唯有聖經是神的話，作為宣教的主導思想，當是絲毫不打折扣不能妥協的，那是一條絕對不能改變的道路。體現在保羅所說的：“在猶太人中，他尊重割禮及猶太宗教傳統。但在外邦人中，他甘願做外邦人，為要得著更多人。”他這麼做的目的無非是要帶領外邦人從黑暗中歸向光明。但保羅是永把對文化的效忠，服在基督福音的使命之下。這也是石門坎教會在宣教中必須守住的真理前提。

從當前的大環境來說，中國政府對基督教的的態度不是很明朗，但是從整個發展態勢和發展空間來看，只要教會按著聖經教導，謹慎處理，教會還是必有發展前途的。

今天的中國教會若能將這個積累了很多經驗的石門坎教會重新組成一支強大的隊伍，果效是不可測量的， 是當今石門坎教會的一個千載難逢的時機。我們必須盡快利用國內這種政策的優勢。外部有資源、有能力，也不乏有一些需要總動員願意參與建設石門坎教會的熱情和動力，這就像"萬事具備，只欠東風"一般 。石門坎教會、包括所有牧者、信徒要有這種洞見，變被動為主動，積極回應各方來的支持和援助。

其實，從整個情況分析，問題所在還是石門坎教會自己本身。終究還是整個信仰體系沒有被建立。這也是二十多年來，不斷有機構、公益項目在石門坎開展，進行，卻沒有形成合力，沒有總動員，成效不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5.1.3. 組織信徒查經班、靈修生活

石門坎教會初建時，由於信徒普遍初信，靈命幼稚。所以信徒自身生命的建造成為當時教會的首要事工。這一模式的關鍵作用，是使教會在已經趨於穩定，信徒的靈命有了根基，才是將力量再投入到福音的傳播上，完成神所託付的大使命中。柏格理時期對聖經神的話重視，同樣對今天的信徒非常重要。今天也應該作為教會整個管理中的重中之重。而從今天石門坎教會信徒的行為舉止，生活步調，教會生活等方面所呈現的，信徒在靈命上的追求，確實有待提高。筆者走訪所到之教會，

大多沒有固定的查經班，也沒有小組的查經活動。一些村寨的團契聚會主要形式是唱歌的形式，或有帶領者讀聖經，而信徒多數連聖經都不帶，更沒有針對聖經問題的分享。（或許筆者走訪的時間、地方的有限，不一定準確）

神的話是“腳前的燈，路上的光。”（詩 119:105） 在信徒的生活中，時常要面對仇敵撒旦的攻擊、世界的誘惑和困難，還有自己的軟弱等等。什麼是基督徒出奇制勝的辦法？神的話。如果沒有神的話，人還是不辨是非，在受試探時，就容易跌倒；另一方面，也需要聖靈的內住，提醒和幫助我們，可以讓我們有警醒的靈，所以靈修生活同樣重要。建立一種與神親密的關係。在筆者看來，這項工作在石門坎要做起來，並不是難事，苗族信徒很單純，他們有時間，也願意參加各種教會活動，只是苦於現在缺乏有靈命、有能力的組織者和帶領者。

5.1.4. 集合一切資源

石門坎教會目前最大的優勢在於對外開放後，不斷有福音機構和公益組織在物質和人力資源等方面提供的贊助和支援。教會應該藉著這股力量，結合今天中國基督徒的覺醒，充分利用自己現有優勢，使每一項投入都用於教會的教育和基礎建設上。具體做法應是：

第一、應配合海內外福音機構或教會，整合各方資源，使外部對教會人力、物質上的投入，真正用於在進行門徒訓練，培養本地同工等事工上去。特別要在門徒訓練上加大力度，有計劃地培養。採取請進來，走出去的方式，也是可行性的方法。中國基督教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有了在任何環境中生存的經驗，石門坎教會可

以選派信徒有選擇性的到中國其他教會短期或階段性的培訓；鼓勵有志青年信徒到中國基督教神學院進行系統學習等等。對外，可以主動邀請國內外福音機構或有負擔的信徒，短期或長期在石門坎進行培訓、教導，將信仰真正紮根在苗族人的心中。按照大使命指出的，教會事奉任務的目標是，“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組織和建立一支有生命力的同工隊伍。利用鄉村優勢、民族優勢，使同工活躍在信徒當中，傳遞真理，讓真理在信徒心中成為動力。最終成為生命和生活中隨時的幫助。

其次，要集合一切力量，　系統化應用。　俗雲：他山之石，方可釗玉。　從 1995 年石門坎開始對外開放，這對於石門坎人、石門坎教會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它的再度引起關注，教會重新恢復敬拜，都說明神的眷顧和不改變的屬性。在這樣一種相對寬鬆的環境中，石門坎教會要整合一切力量，特別是基督教的力量，重新打造石門坎教會生活。目前海外教會、機構、國內教會，包括一些公益組織已經行動起來，他們是有心在石門坎教會有所作為的。這些資源如何能最有效地分派到教會，今天的石門坎教會，其中有因體制的作難，很多的資源經過了政府的手轉移，大多數並沒有直接用於教會建設上。這個工作確實需要透過其他管道來建立。當前這對石門坎教會確實是一場智慧的挑戰。所以為什麼筆者要強調先要有信徒生命的提升，教會要有一個系統的管理制度，要知道任何資源的利用，在沒有建立起一個相互信任的關係，就不可能有後續的合作。因為石門坎教會需要的不是錦上添花，不是蜻蜓點水，而是細水長流。這也是石門坎教會可以去嘗試去努力的方向。關鍵有沒有這樣當擔的人。

5.1.5. 建立愛的團契，生命的分享

當信徒的信仰有了基礎，教會整個氣氛就會得以改變，這種改變是內在力量的推動。一個成熟的教會，要具備幾大要素，其中“愛的團契，生命的見證”是使信徒生命成長的另一個重要因素之一。這也是石門坎教會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對於一個正常的基督徒，除了有委身的教會，還要參加到一個團契中，這很重要。團契是信徒的家，在團契中通過對聖經的學習、查考等，對疑難問題的解答，再結合生活中遇到的實際問題，彼此分享，彼此分擔，互相鼓勵，增強信心。讓信徒們在團契中感受到基督耶穌的愛。成為愛的團契，真正成為福音流通的管道。雖然現代化的風也吹進到苗區，但相對城市，石門坎還是相對的落後。文化生活的缺乏，團契更能增加肢體間的連接，拉近弟兄姐妹之間愛的關係。在團契中，可以親身經歷到神是愛。也通過團契，讓非信徒看到信仰的力量，以此幫助更多的慕道友，通過團契，認識神。在使徒行傳 2:44-47，我們看到信徒恆心遵守師徒的教訓，彼此交通、擘餅、祈禱。他們天天同心合一同用飯、敬拜。由於基督徒這種靈裡的相交，以及在基督裡所表現愛的吸引，使得救的人數天天加增。成為外人看得見的美好見證。這也是團契成為教會健全和成長的主要原因。

5.1.6. 改變現有貧困狀況，從教育開始

中國的苗族多聚居在偏遠山區，地理位置的邊緣化，也導致了其他方面，包括政治、文化、經濟等的邊緣化，以致造成人民生活的貧困和知識的愚昧。但是當福音的門開了，整個苗地和苗民的環境和生命被翻轉。所以這也證實了聖經中所說：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路 19:10） 這種拯救是全備的，包括生命和生活。100 多年前，石門坎苗族人自己見證了上帝話語的真實和可靠。其中最成功的方法之一，就是進行文化教育的滲透。常言道：“知識改變命運。” 首先從人的觀念開始轉變，人的思想觀念帶來知識的進步，知識使人明白真理。知識又將進步的技術、生產引入，帶動生活上的轉變。石門坎今天的貧困現象，正是在中國特殊國情，強制“高壓”下，社會重新關閉自守，人們與外界處於一種隔絕境況，自然會使生活回到原初。落後就是貧困的根源，如果不解決貧困，談信仰就是一句空話。石門坎教會要恢復，要發展，必須從教育或文化下筆，廣開管道，知識能開啟認識真理之門。這也是一場石門坎教會跨越文化、超越文化的主要宣教事工。這也是今天石門坎教會的主要工作。

5.2. 對日後研究的提案

石門坎教會的歷史雖然被埋沒了多年，近年才被發現，喚起了很多人思考和研究，本論文就是其中之一。不可否認，本論文中，還有很多不完善之處和缺憾的地方，為此必會有更多研究石門坎歷史文獻需要有待考證。下列是作者認為應該注意的事，作為日後研究本提案當注意的的幾件事。

應該詳細的查考、論證、記錄有關石門坎教會的各項事跡，加以證實考據。

盡力收集、考據柏格理及其他宣教士行蹤證道手稿或文稿，將其視為重要資料。

世事遷移，白雲蒼狗，若能實際採訪大花苗尚存的老人，實錄那些口傳經歷實為再好不過。隨著時間的流失，尚存者越來越少，因此這項工作刻不容緩。

基督教百年遺留石門坎，其現存遺址、遺物等，應緊急呼籲收集保存，設立專門博物館，作為激勵後人的見證。使基督教在石門坎的教義，一直留存並成為幫助後代“以史為鑒”的寶貴財富。

5.3. 結語

曾任國家主席的胡錦濤，1985 年在擔任貴州省委書記期間，曾三次深入威寧，並發現了一百年前就在國際上具有影響力的石門坎，在一次威寧幹部大會上他留下了一段情深意重的重要講話：

> 1904年，柏格裡來到貴州省威寧縣的石門坎，開始他的傳教生涯。在吸引一批苗族信徒以後，柏格裡利用教會的投資，在這裡蓋了教堂、修了學校，自己先學會了當地的苗族語言，又教教徒學英語。其後，他和自己的教徒一道創制了苗族文字，並用這套苗文翻譯了聖經《新約全書》，編寫了小學課本。幾年時間裡，將一個無人問津的荒僻苗鄉變成了國內外知名的中國內地教區。柏格裡憑自己的執著做到了別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使外部的新鮮事物在荒僻的苗鄉紮下了根。在柏格裡的引導和支持下，世世代代沒有讀過書的苗族子弟後來有兩人獲得了博士學位，20多人成為學者、教師、醫生……然而，柏格裡卻沒有看到這一天，1915年9月，石門坎地區爆發傷寒，許多群眾遷出了石門坎，柏格裡卻留下來照看染病的教徒和學生，自己也被傳染上了傷寒，死在自己的牧師任上。信徒們將柏格裡的骸骨安葬在了石門坎，將他的名字銘刻在心裡。[2]

上帝的普世恩典讓人人都有一把衡量真理的尺子，這與權利、地位無關。從中國領導層的話中，可以充分證明，神的愛是惠及眾生的期盼，只可惜中國制度將

[2]俊洪 包, “時代的記憶（上）: 畢節試驗區創建的歷史回顧,” http://www.people.com.cn/, January 12, 2009, accessed July 5, 2017,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49154/49155/8660962.html.

權利和信仰混淆而論。然而制度終究有改變的一天，唯有上帝為世人預備的福分永不落空。柏格理包括所有曾經為中國福音來華的宣教士們，為中國所播下的福音種子，沒有白白勞作而消失，他們在土裡醞釀，今天已經破繭而出，正在生長。“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籽粒來。”（約12:24）儘管文革中柏格理、高志華的墓碑被搗毀，他們的骸骨被拋屍墳地，這絕不能說是苗族人的過錯，而是在那種年代那些故意誤導者的罪過。人們重點要看到，正是他們的犧牲，喚醒和激勵著更多人的靈魂。從石門坎教會的歷史回顧中，無處不透射出神在其中的掌權。當筆者和每一個受感動的朝聖者站在那重新建造的柏格理、高志華的墓碑前，無不心生盼望，神救贖世人的心意從來沒有停息，因為站在這裡的每個人都是祂最好的見證。他們在先輩面前擦乾眼淚，重拾信心，重新立志，為迎接神國復興更大收割，歡喜快樂而投入全力！

願神祝福這樣神聖的工作！

BIBLIOGRAPHY

Bavinck, Herman. 基督教神學. Translated by 中輝 趙. 臺北, 中華民國: 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 2002.

Boettner, Loraine. 基督教預定論. Translated by 中輝 趙. 臺北, 中華民國: 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 2000.

Bosch, David J. 更新變化的宣教: 宣教神學的典範變遷. Translated by 陳毓華 白. 臺北, 中華民國: 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 2004.

Grenz, Stanley J., and Roger E. Olson. 二十世紀神學評論: God and the World in a Transi. Translated by 良淑 劉 and 孝琦 任. 臺北, 中華民國: 校園書房出版社, 1998.

Klotsche, E. H. 基督教教義史. Translated by 加恩 胡. 臺北, 中華民國: 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 2002.

Kuiper, Rienk Bouke 歷史的軌跡: 二千年教會史. Translated by 林靜芝 李. 臺北, 中華民國: 校園書房出版社, 1986.

Kuiper, Rienk Bouke. 基督榮耀的身體. Translated by 中輝 趙. 臺北, 中華民國: 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 1994.

McGavran, Donald A. 教會增長. Translated by 本實 李. 臺北, 中華民國: 浸宣出版社, 1985.

McGrath, Alister E. 基督教神學手冊. Translated by 良淑 劉 and 瑞琦 王. 臺北, 中華民國: 校園書房出版社, 1998.

Qualben, Lars P. 教會歷史. Translated by 少蘭 李. 臺北, 中華民國: 道聲出版社, 2000.

Wright, Christopher J H. 上帝子民的宣教使命: 關於教會宣教使命的聖經神學. Translated by 元尉 鄧 and 遇 祈. 新北市, 中華民國: 橄欖出版有限公司, 2011.

阿, 信. 用生命愛中國. 鄭州, 中國: 大象出版社, 2009.

包, 俊洪. “時代的記憶(上): 畢節試驗區創建的歷史回顧.” http://www.people.com.cn/. January 12, 2009. Accessed July 5, 2017.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49154/49155/8660962.html.

柏, 格理, 慕廉 邰, 樹德 王, 鐸理 甘, 紹喬 張, and 繼喬 張. 在未知的中國. Translated by 人達 東 and 旻 東. 昆明, 中國: 雲南民族出版社, 2002.

蔡, 麗貞. 我信聖而公之教會. 臺北, 中華民國: 校園書房出版社, 2004.

藏, 禮柯. “石門坎公僕朱煥章.” http://www.shimenkan.org/book/. July, 2005. Accessed July 5, 2017. http://www.shimenkan.org/book/rice/zlk/.

陳, 鈺. “20世紀初循道公會在石門坎的傳教活動.” 黑河學院學報 no. 3 (2014): 0. 10.3969/j.issn.1674-9499.2014.03.030.

陳，浩武. “石門坎給今天中國教會和社會帶來什麼啟發？.” September 8, 2015. Accessed July 1, 2017. http://www.chinaaid.net/2015/09/blog-post_92.html.

戴, 紹曾. 從使徒行傳看宣道與差傳. 臺北, 中華民國: 校園書房出版社, 1988.

東, 人達. “循道公會在黔滇川傳播的背景分析.” 渝西學院學報 21, no. 1 (2002): 0. 10.3969/j.issn.1673-8004.2002.01.004.

東, 人達. 滇黔川邊基督教傳播研究. 北京, 中國: 人民出版社, 2004.

董, 俊蘭. 保羅的宣教策略. 臺北, 中華民國: 信福出版社出版, 1995.

貴州省地方誌編撰委員會編, ed. 貴州省志.民族志（上冊）. 貴陽, 中國: 貴州民族出版社, 2002.

李，元龍. “朝 聖 石 門 坎.” http://www.3miao.net/. October 2, 2011. Accessed July 5, 2017. http://bbs.3miao.net/thread-90248-1-1.html.

林，安國. 華人教會普世宣教的橋樑. 香港，中國：宣道出版社，1985.

林，政傑. 新世紀宣教運動策略. 臺北，中華民國：林政傑出版道聲出版社經銷，2005.

劉，豐，啟偉 葉，and 勝利 高. “海外天國走出來的醫學博士.” http://www.shimenkan.org/. Accessed July 5, 2017. http://www.shimenkan.org/book/zcl/.

馬，玉華. 區域文化與社會變遷. 合肥，中國：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15.

麥克基西，史蒂芬. 健康的教會. 臺北，中華民國：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2004.

龐, 君華. “從衛理宗的連結觀（connectionalism）反省當前開拓的事工.” https://bible.fhl.net/. October 12, 2003. Accessed July 1, 2017. http://bible.fhl.net/gbdoc/wf/wf5.html.

錢, 寧. 基督教與少數民族社會文化變遷. 昆明, 中國: 雲南大學出版社, 1998.

秦, 和平. 基督宗教在西南少數民族中的傳播史. 成都, 中國: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3.

邵, 慶彰. 教會事工面面觀. 臺北, 中華民國: 校園書房出版社, 1989.

沈, 紅. 石門坎文化百年興衰. 瀋陽, 中國: 萬卷出版公司, 2006.

唐, 崇懷. 信仰的再思與重整. 臺北, 中華民國: 天恩出版社, 1999.

唐, 崇懷. “基督教歸正神學講義.” Lecture, 真道學苑 萬隆福音神學院, 萬隆, 印尼, 2000.

田，兵，ed. 苗族古歌. 貴陽，中國：貴州人民出版社，1985.

王，大為. 尋找那些靈魂. 2nd ed. 香港，中國：香港文匯出版社，2008.

王，治心. 中國基督教史綱. 臺北，中華民國：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59.

楊，大德. 中國石門坎. 北京，中國：人民日報出版社，2005. Accessed July 4, 2017. http://www.shimenkan.org/book/c/.

遊，建西. 近代貴州苗族社會的文化變遷. 貴陽，中國：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

餘，貽澤. 清代苗民問題. 臺北，中華民國：臺灣學生書局，0000.

遠，志明，and 上宇 陳. 宣教士. 香港，中國：神州傳播協會，2016.

章，力生. 人本與神本：對於人文主義的神學反思. Richmond Hill, ON: 加拿大福音證主協會，1998.

章，力生. 教會論. 香港，中國：宣道出版社，1991.

張， 慧真. “教育與民族認同：貴州石門坎苗族基督教族群的個案研究.” PhD diss., 香港中文大學, 1999. Accessed July 11, 2017. http://docsplayer.com/28700231-Umi-number-copyright-1999-by-cheung-wai-chun-allrfqhtsreserved-u-m-t-umi-microform-copyright-2000-by-bell-howe-information-and-lea.html.

張， 坦. “基督教內地會和循道公會在黔西北苗彝地區傳播的比較研究.” 貴州社會科學 no. 6 (1991): 1.

張，坦. 窄門前的石門坎. 貴陽，中國：貴州大學出版社，2009.

趙， 文娟. “清末民初基督教傳教士在西南民族地區的宣教活動：以循道公會傳教士柏格理為個案.” 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 1 (2008): 0. 10.3969/j.issn.1674-6627.2008.01.019.

莊，祖鯤. 宣教與文化. Paradise, PA：基督使者協會，2004.

莊，祖鯤．宣教神學．Paradise，PA：基督使者協會，2004.